

目 次

評陶希聖所謂“流寇之發展及其前途”……………	劉光宇
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嚴靈峯
辯證唯物論的宇宙觀與近代自然科學之發展……………	
……………昂格思著……………	畏之譯
論資本論……………	李 季
蘇聯關於價值學說的爭論……………	彭葦秋
馬克思價值說的基	礎)
……………	…代青譯
世界股票行情假	說…高峯
關於所謂“左翼	…洛斯基
托爾斯太——俄	
……………	……何畏譯
現代土耳其的經濟狀況……………	丹齊各
皮袍子引起的話……………	獨 清

大學及專門學校教科參考書類

四國政治學綱要

高一涵著

寶價 平裝一元五角 精裝二元二角

高一涵先生曾在北京大學，北京中國大學。及近在上海中國公學，法政大學教授政治學有年。本書乃高先生幾經修改之作。內容極其豐富；凡關於國家主權，國權範圍，民權種類，議會制度，以及創制制，複決制，罷免制，內閣制，總統制，委員制，監察制，考試制等均徵引中外名家著作，詳細討論，洵為各大學最好教本，并為研究或教授政治學者之最好參考書。

再政治制度淺說

張慰慈著

寶價 平裝一元四角 精裝二元

本書完全以敘述各國的實際政治為主，即有理論也是從實際的政治制度中抽出來的理論。絕不是不談理論的著作，也不是專談理論的著作。在近來國人傾向理論，忽略實際的當中，這本書實在最重要的。胡適之先生和高一涵先生看過這本書後，都認為最有價值的一本。高先生在本書的序文中，還有愛不忍釋的話，用為大學校及專門學校的教本或參考書，這是沒有更好的了。

國際政治概論

周鯨生著

寶價 平裝一元 精裝一元五角

國際政治是歐戰後各國大學新的科學，是現代國民應有的政治常識。在周鯨生先生這本概論裏面，所有關於近數十年國際政局的變遷。歐戰後國際政治的新發展，國際社會的新組織，如：國際聯盟，國際法庭等，及強制仲裁，國際裁軍，祕密外交，國際主義等項題目，日常見諸報章而不得要領者，都有系統的說明和批判。不獨大學專科可採為教本，凡是留心世界政治的，均不可不讀。

中外貨幣政策

彭學沛著

寶價一元五角

專就政策方面來考察貨幣問題的理論和實際，這是世界最初的嘗試。這書上卷敘述并批評戰前戰後的貨幣政策理論，并時時拿中國情形來比較參照。中卷歷述英，美，德，法，蘇俄各國的貨幣政策。下卷把中國貨幣政策沿革，貨幣制度現狀，加以極明晰的分析和解釋，并推論到中國貨幣政策的前途。關於貨幣政策，祇要一讀這本書，便可以得到基本的確實的知識。

評陶希聖所謂 「流寇之發展及其前途」

劉 光 宇

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之商品經濟不但撞開了中國的門戶逐漸統治了各大城市，而且深入了鄉村，在全國的經濟生活中，取得了主要的支配地位。這一經濟變化的結果，使手工業者和農民不能不日益破產，不能不逐漸離開生產而形成廣大的失業羣衆。再加以歷年的軍閥混戰，使農村經濟愈陷於停滯與破壞之境，因而更加速農民脫離生產的過程，這乃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這些失業羣衆，除掉很小的一部分被消納於新式的各種產業之中變爲工銀勞動者及一部分流落到國外去充當僑工以外，大部分是找不着出路可以謀生的，現今各大城市之廣大的流氓無產者，和廣大的雇傭軍隊之兵士，以及普遍全中國的土匪，便以此社

會基礎爲其來源。這一廣大的游民無產者羣衆，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下，已成爲一種不可侮的社會勢力，也就是一個十分難解決的問題：他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可以成爲革命前進的障礙物，但在某種條件之下亦可以成爲革命運動中的助力。誰要完全不理會他，誰便不能很順利的進行中國的革命。因此，目前中國的游民無產者的問題，雖然他比不上真正的無產階級那樣值得注意，並且比不上農民問題那樣值得注意，然而不是可以完全忽視的問題。但是，陶希聖在新生命雜誌第三卷第七號中發表的所謂“流寇之發展及其前途”一文，則恰恰取了相反的態度。他那篇論文的全部精神，以極端輕視與侮蔑的態度，完全否認了目前中國的廣大游民無產階級羣衆，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所可能發生的作用。所以他說“從這些材料上，有人寄寓他的幽遠的理想；然而材料的本質每到了暴露自己的時機，這種理想便成幻影。不了解這本質的人，對於這幻影遂追慕，甚至於陷入悲哀。”又說“流氓散兵決不是無產者農民革命的同盟者。”本來，這些話出之於陶希聖之口是很自然的，因爲他所代表的是支配者階級的利益，當然不會看見一般被壓迫的勞苦羣衆的痛苦，也當然不能了解成千萬被迫而脫離生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所以發生的作用和意義。不過他在這篇論文中，引用了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大戰以前的考茨基也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

者)的話來改換面目作為他的立場,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附會,我們在此地應該特別指明出來。

* * *

陶希聖一向就好利用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來掩護他自己的說教,他自以為是懂得歷史的唯物主義的,其實則只是曲解和利用,並不知道歷史的唯物主義是甚麼。即如他在所謂“流寇之發展及其前途”這篇文章裏,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觀點,是要在歷史上去找教訓,所以他說“造成中國歷史的材料值得我們細細的查勘。”“所以我們對於過去中國歷史加以研究的時候,對於革命失敗之中的反革命的成功,不應從個人活動着手,而必須從歷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質着手。這種研究不是徒然的。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之研究,使我們對於現在的事實,獲得明確的觀察的方法。”陶希聖便利用這樣的方法和觀點,歷述歷史上許多農民戰爭都失敗了,都“由革命轉變為剝削”,因而斷定在今日的中國革命中,這些游民無產者是絕對不占地位的,也絕沒有起任何作用的可能。不錯,歷史的唯物主義者把歷史當做最重要的科學,馬克思為要說明歷史的重要,甚至於說歷史以外沒有科學。歷史的唯物主義者分析一切問題都要根據歷史的眼光去分析,而絕不憑空的懸想。一切事變以至觀念形態都有歷史的因果規律,過去的歷史有支配和決定

現在的一切的權威，一切現階段的事變之發展絕不是憑空而來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根據歷史的遺教不但可以作了解和決定現在的問題的指南，並且可以預見未來的發展。但是歷史是變化的發展的，牠在每一運動發展的過程中，便從舊的上面添加了新的因素，每一新的因素增加的結果便改變了歷史的原因之性質，所以從運動的觀點去觀察歷史的各階段，牠構成的原因就不完全是一樣的，時時發生新的原因，而每一結果也就是新的。歷史就因為這樣絕沒有完全相同的事變，歷史事件是不能機械的依樣重演的，歷史的唯物主義者與機械論者之觀察問題的主要差別就在這點。

但是，陶希聖之觀察“流寇發展及其前途”，其所採用的方法就根本與此相反。他的觀察方法與觀點不是歷史的唯物主義的，正是機械的歷史主義者的。他把發展的歷史看做死的東西，他只抓住歷史上所曾表演過了的現象作為純經驗的論證工具，抹殺了在發展中存在的歷史的新因素，機械的完全以過去的事變來比擬現階段的現象，認為歷史是要完全照舊重演那些事變的，這是如何的荒謬笨拙！

誠然，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次數的游民無產者與農民革命都失敗了，不是被反動的地主階級所征服，便是因領導他的流氓無產者背叛了他們而“由革命轉變為剝削”。但是這只能說明過去歷史，不能說明現代的社會現象之必然絕

對相同，其結果也必然完全一樣。因為游民無產者與農民階級的本身缺乏政治的自覺，而在其經濟的生活條件之下更有很深的私有觀念，帶着有天然的保守性，所以他是不能獨力領導革命的，這如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農民本質也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之不能獨力領導革命一樣。游民無產者與農民之在革命運動中，其能成為革命的勢力與否，必須要看領導他的社會勢力如何才能決定。就是說，如果他為破落的貴族分子所領導，可以成為極反動的一種社會勢力，他為資產階級所領導則可以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他如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亦可以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助力。

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要決定游民無產者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與其地位，決不能把他在某一歷史階級中所表現的狀態來命定他的永遠的前途，更不能把一定階段的歷史法則拿來概括了一般的歷史發展形式。在過去的歷史（資本主義時代前期的歷史）時代中，在社會階級的分野中，還沒有近代（資本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游民無產者的羣衆以至於農民，只能接受那些破落的貴族分子，破落的地主，商人等等的領導，所以便必然的在革命鬥爭中供他們的領導者的利用，使革命失敗，結果落到由革命轉變為反動，廣大的羣衆終於沒有出路。可是歷史發展到了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中，帶來了廣大的革命的無產階級，他為社會中最革命最

最壞的同盟者。”而陶希聖則說“社會主義者對於這種分子，並沒有寄與何等的希望。他們對於流氓無產者如游民及散兵，不獨沒有希望，並且有如上的嚴厲的指摘。”“流氓散兵決不是無產者農民革命的同盟者。”恩格斯說“每個工人的領袖，如使用這些游民無產者做衛軍（如目前中國的所謂紅軍——作者）或支柱（主力——作者），即此已證明他是出賣工人運動的叛徒。”而陶希聖則纂改為“每個工人的領袖，如使用這些游民無產者做護衛或助力，即此已證明他自己是革命的叛徒。”這很顯然，恩格斯並不是認為游民無產者完全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完全不能與他結革命的同盟。反之，恩格斯認游民無產者亦是無產階級的可以聯盟的同盟者，只是每一個工人領袖要認清楚，無產階級最好的同盟者是鄉村的貧農和其他勞苦羣衆，游民無產者在這些同盟者中要算最壞的了。因此無產階級在進行他的革命時，絕不能把他們當做工人階級的主要支柱，過分的依靠他們的力量來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力是建立在無產階級自身上面的，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可以成為助力中之主要的助力，而游民無產者只能盡其副的作用而已。

爲甚麼游民無產者不能作為無產階級的好的同盟者呢？因爲“游民無產者是從一切階級破落下來的渣滓”（恩格斯），他們已脫離了一定的生產階級，脫離了生產過程中之

一定地位，因此在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利益的直接衝突的利害關係，對他們說來都是不相關的，並且根本就不懂得，而其一定的階級意識和鬥爭情緒便自然模糊起來，所以恩格斯說“他們是絕對易被人收買，絕對銅臭的隊伍”。他們很易于為敵人誘惑，不時走向反動方面而對自己的友軍進攻，這是他們的主要弱點。但是我們是不是因為他有這些弱點，便完全否認他有接受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走向革命的可能呢？這在他們的廣大羣衆與其生活困苦上說，仍是不能否認這種可能的。因為一般的說來，游民無產者是從社會的各社會層被排斥出來的，他不能在社會的生產上占一定的地位，差不多完全是沒有生活出路的。所以他們之間，不是受着政治的嚴重壓迫，便是遭遇着經濟的極端窮困，他們的廣大羣衆，並常常在這兩種壓迫之下受困窮。比如土匪，雖然在他們生意好的時候可以暫時過着比較舒服的生活，然而也只是暫時的，並不能在經濟生活上有固定的保證，但在政治方面，則是絕對的遭受壓迫。又如兵士，雖然他冒着生命危險取得了一時的社會的寄生生活地位，但在軍餉的低微與長官的剋扣，使他們在經濟上仍受着剝削，在政治上則統治者的軍紀的壓迫，使他們完全失掉了意志與身體的自由，完全成爲木偶。所以在游民無產者的地位上說來，雖然他那投機貪污的特性很深。然而能從這種特性發揮而找

得出路的，至多只是少數首領的幸運，大多數的羣衆始終是沒有出路的。所以雖然他們缺乏階級的自覺和階級鬥爭的情緒薄弱，但因為爲其經濟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所決定的結果，其與當前的統治者的社會秩序相矛盾及其反抗的自然傾向的條件，也是與他那易受利用去危害與自己處相同的地位之勞苦羣衆的條件並存的。因為如此，所以游民無產者在前者的條件下是沒有完全消滅他在革命中之可能盡其作用的作用，無產階級能以正確的策略去領導他，他亦可以成爲恩格斯所說的“可以聯盟中”之“同盟者”，但在後者的條件之下，他不是很有階級覺悟很能革命的一個羣衆，只能有成爲無產階級的助力的可能，只能如恩格斯所估量的成爲“聯盟者中之最壞的同盟者”。

可是現在對於游民無產者的估量，在機會主義盲動主義者的史大林派，他們認爲“軍閥崩潰的基點”就靠“兵變”，“這副好身手就爲毀滅軍閥制度的主要武器”，所以他們以兵變爲“革命高潮的象徵”，以“全國廣大無比的災民，半農半匪的武裝以及土匪 神兵紅槍會大刀會等農民羣衆組織，……是必然會走上游擊戰爭的道路而生長成紅軍的。”這無異公然的宣佈不管城市的無產階級起來不起來，中國的“軍閥崩潰的基點”是“兵變”，游民無產者可以作“毀滅軍閥制度的主要武器”的；不但革命高潮不以工人的鬥爭形式來決

定，而以兵變來決定，並且無產階從武裝鬥爭的主力的紅軍也不必要無產階級在革命中自己組織起來，而只要由“災民，半農半匪的武裝以及土匪神兵紅槍會大刀會等……生長”起來就夠了。如此機會主義盲動主義者自然是犯了恩格斯所說的“使用這些游民無產者做衛軍或支柱，即此證明他是出賣工人運動的叛徒。”的罪惡。但如陶希聖完全否認游民無產者之革命的那部分可能性，完全否認他在無產階級正確領之下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者（雖然是很壞的）和助力，這是害怕無產階級去找得更廣大的同盟友軍，加強了他的力量來顛覆現社會，是現社會秩序的擁護者。這兩種見解，雖然都利用馬克思主義為立論的掩護，然而都是實際的與理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惡劣企圖，都不曾運用辯證的觀點去估量游民無產者在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過分估量這部分勢力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觀點，一味否認這部分勢力之可能發生的作用是取消主義的觀點。

*

*

*

陶希聖為甚麼要否認游民無產者在革命中所可能發生的作用呢？這有他的很深的用意的，這一用意就是否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他的所謂“流寇之發展及其前途”這篇論文，首先就引用了革命與反革命一書的話來作掩護，而自己作結論式的說“所以我們對於過去中國歷史加以研究

的時候，對於革命失敗之中的反革命成功，不應從個人活動的事實著手，而必須從歷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質着手。”他這裏所指的“材料的本質”自然是叫我們去看看游民無產者的本質。其次他以歷史的敘述說歷史上“游民革命集團之轉化”，而證明了屢次都是失敗，即證明了這種材料的本質是絕對不能使用的。他在歷史的敘述游民革命集團之轉化過程，引用了考茨基一段話之後又結論式的說道“這一段話仿佛是描寫今日中國的！這正是封建制度破壞而資本主義沒有發達的現象。”這種用意是說中國還是封建社會，因此沒有可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現在中國所能憑藉的力量，只是封建制度破壞中所造成的游民；憑借這種力量來革命是不會成功的，所以他所得到的革命教訓是不能用游民無產者來“解放無產者即工業勞動階級”。總之，他是要說中國目前只有游民無產者的勢力，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中國革命的失敗，就失敗在於這種社會基礎的不成熟上，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此客觀條件的缺乏所命定的，而與個人的活動沒有關係，中國根本上就說不上無產階級革命。

陶希聖這樣的系統的理論，是值得注意的。他以歷史的死板的公式來證明在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歷史上的游民無產者與農民革命失敗了，而斷定新的歷史時代之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發生的今日，游民無產者仍然沒有革命的可能。關

于游民無產者在其本質上是否完全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的問題，前面已說過了。現在我們應該來檢討中國是否封建社會才開始崩潰，資本主義未發達，革命的羣衆仍只是些破落戶的流氓無產者而沒有無產階級，與中國近年的革命是否就完全失敗在這點，更是否可以根據此點來否認中國社會革命的客觀條件完全不存在等問題。

中國的封建社會，從戰國時開始了商業資本的發展，已經促成其逐漸崩潰了，所以如陶希聖所列舉的歷史上的農民革命與游民無產者的革命，自秦以後就不斷的發生。這些農民與游民無產者的暴動之產生，是由于歷來官僚貴族，地主，商業資本剝削的結果。一方面因為這些暴動不時對於商業資本的積累加以破壞，再加上中國的地理的環境和歷史的原因種種，使中國工業資本主義未能發達起來，沒有產生一個領導他們的階級，遂使這些暴動歷次失敗。但他一方也就從這些農民與游民無產者的暴動的產生，證明中國的封建社會早已在那裏崩壞了。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游民無產者的確是從封建制度的解體一個來源來的。可是歷史的條件不是一成不變的，現代中國的遍地災民，土匪，廣大雇傭軍隊，他的來源就不完全相同了，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身亦可以產生游民無產者。因為資本主義的毀滅作用，並不止於在打破封建特權而使封建制度解體，同

時一樣依於自由競爭的法則而毀滅他自己營壘中的小資產階級，依於商品經濟的侵略而毀滅自由農民，這些毀滅，我們不能把他當做資本主義破壞封建制度一樣看待。資本主義的這種毀滅，在初期雖然可以把那失業者容納到工廠中來，但亦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最高度的工業發展，他所毀滅的能力超過了他所能容納的能力以上，便發生了勞動力過剩的現象，城市的工業需要不能解決鄉村甚至都市的人口過剩的問題，而廣大的產業後備軍便出現了。這一廣大的產業後備軍中，一部分雖能再回到生產組織以內去，但一部分亦可轉變為游民無產者。所以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游民無產者不但不能根本消滅，並且還仍然繼續存在，並在某一一定的時期甚至還要擴大。所以無論資本主義怎樣發達，資產階級的組織怎樣完備，他不能根本消滅盜匪，乞丐等等，就是這個原因。在近代的中國，遍地的土匪，災民和廣大的雇傭軍隊，雖然我們並不否認其來源之中有封建制度更利害的崩潰之結果這一原因存在，但不能如陶希聖所說只是“封建制度破壞而資本主義沒有發達的現象。”固然我們承認中國本國的資本主義尚在幼稚時期，但即令中國本國資本主義發達了，他也不能完全消滅游民無產者的。中國近年的土匪，兵士，災民之有增無已，倒是世界資本主義和中國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因為帝國主義的商品侵掠，與本國資

本主義之無情的剝削，都是使農村經濟破壞與農民及手工業者加速破壞的原因。不過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的是國際資本的勢力在中國迅速的增加，而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地位，所以本國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箝制與卵翼之下，其發展是較為緩慢的，因而對於破產的農民與手工業者的收容力更小，遂造成了廣大的游民無產者羣衆。在中國這種特殊情形之下，游民無產者的增加不但不能說是因為資本主義不發達的結果，倒可以說是國際的和中國本國的資本主義之總匯的發展的結果。中國的畸形的資本主義愈往下發展，而游民無產者的數量將愈益增加，這我們可以從民國以來的現象得着證明：在這一二十年中，我們不能說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資本勢力與中國本國的資本主義沒有發展進步，然而游民無產者不但不因有這種發展而減少，並且還日益增加，便是顯明的證據。陶希聖所結論的中國游民無產者的增加，只是封建制度的破壞，而資本主義未發達是不合理論與事實的。

中國的資本主義之不斷的發展，一方產生廣大的游民無產者，他方面也必然產生廣大的無產階級。中國現在已有幾百萬的無產階級，散佈于中國各大城市和礦山，鐵路線上，是沒有人能否認的。雖然這一數目在全國人口的數量中尚占少數，然而他在全國經濟生活的地位上，因而在革命的

地位與作用，都是異常重要的，這可從“二七”與“五卅”的反帝反帝國主義的大罷工中，從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的大革命中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就說中國的資本主義並不是沒有發展，他不特造成了廣大的無產階級，並且這一階級還有偉大革命力量與領導作用。陶希聖認為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中國的歷史所造成的材料，即革命的社會基礎之廣大的羣衆，還只是些不成材的材料——如散兵土匪等游民無產階級——這是企圖否認中國無產階級的存在及其領導革命的作用，否認游民無產者可以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參加革命的可能。一句話，陶希聖是在那裏否認中國有社會革命的社會基礎存在，所以過去的中國革命失敗了，今後仍然是要失敗的。

不錯，對於革命的失敗我們不能簡單的歸之于個人，而是有他的社會的原因的，但是社會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其中自然有革命羣衆之階級成分與本質的問題，即陶希聖所謂材料問題，但亦有階級鬥爭的經驗問題，這裏面連那戰鬥的階級之領導者的幼稚與否都包含在內。如果在革命的階級之本質上有弱點，革命自然有失敗的可能，但革命的階級在本質上本很精良，而因戰鬥經驗之缺乏與領導機關的政策錯誤，亦能使革命失敗。我們不能說德國無產階級之本質不如俄國的無產階級，然而德國革命便因領導者的錯誤失敗

下去了，俄國則在列寧領導之下成了功，這不是顯然的證明嗎？中國前次的大革命，絕不是在革命的羣衆的本質上沒有成功的可能，而機會主義的領導政策是要負責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的中國革命在陶希聖的眼光看來，大概是本質上要不得，陶希聖把他看做與歷來游民無產者的本質一樣，這些材料在歷史上是屢次表演過失敗的，所以那種失敗是歷史決定了的，是必然的走歸舊路。但我們要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在上海，廣州，天津，武漢的廣大工人羣衆之領導革命，廣東，兩湖，江西的廣大農民羣衆的參加革命這一事實，能加以否認而認為是游民無產者的革命嗎？這些都是立在生產組織以內的羣衆，絕不是陶希聖所說的游民無產者，並且在那次革命裏游民無產階級並沒有公開的表現出他的作用出來。因此不能說那一革命是命定的應該失敗的。陶希聖只機械的了解馬克思所說的研究反革命成功的原因，不可只從個人背叛革命去了解問題這一理論，遂認中國革命歷來的失敗，都完全是由於革命的羣衆的本質之不堪革命的結果，這是絕大的錯誤。其實馬克思既並未因為要我們不可只從個人背叛革命去了解反革命成功的原因，就同時指示過我們絕對不要信仰羣衆。並且他曾明明白白的說“假如一個政黨，他的政治本領，只在于認識某甲之不可信賴的孤零的事實，牠的遭際又是如何的可憐呢？”這就指明了對於

在城市的廣大工人羣衆並未起來，而只糾合那種以散兵土匪爲多數的力量來進行革命，這是以游民無產者領導農民工人，以鄉村領導城市，不但會遭不可設想的慘敗，並且會養成農民工人的依賴心理，而防礙了正真的無產階級運動之發展，這是我們必須了解的。

但是，游民無產者是否絕對不能成爲革命的羣衆呢？這在廣大的羣衆之受經濟的政治的壓迫條件上，在他的生活條件之與現存的社會秩序相矛盾上，是不能完全抹殺的。他在革命中有盡其革命的作用之可能，只是要有很好的領導力量來領導他。過去歷史的時代尚未產生這一領導的階級，所以造成了歷史上累次的農民革命與游民無產者的暴動，不是完全失敗，便是反爲他的領導者領導這些革命轉化爲反革命，使羣衆的犧牲沒有顯著的代價這類事實。然而歷史是發展的轉變的，近代的歷史與過去不是完全相同的，近代的資本主義已產生了無產階級，中國的無產階級不但已有廣大的數量存在，而且已充分的能表現他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他有領導農民與游民無產者走上革命道路的能力，因之游民無產者在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有盡其革命的歷史作用的可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之失敗，不但不能以歷史上的簡單的農民與游民無產者的革命目之，而是工人階級領導他們所造成的革命，並且不能以其失敗的原

因機械的與歷史上過去的失敗相提並論，認為是由于這一革命羣衆的本質與過去的純粹農民與游民無產者的本質相同，所以其失敗也是一樣。這一大革命的失敗雖然不能歸之個人背叛革命，然而我們不能委過於羣衆，抹殺了國際以至中國領導機關的政策錯誤爲其最主要原因之一。因爲這次革命在客觀上不是沒有勝利的可能，正是領導機關的政策壓抑革命向前發展的結果。固然，如果以游民無產者的武裝爲推翻革命的主力，如果以游民無產者或農民的革命來解放工人，以游民無產者或農民來領導工人，替工人階級代庖奪取城市政權，甚至代庖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則這農鬥爭的影響和意義縱然不會與歷史上的游民無產者及農民革命相同，而其結果將終至于成爲空幻，成爲悲劇，與歷史上走同一失敗的道路。然而在歷史所達到的現階段，即產生了能領導游民無產者及農民的無產階級之現階段，在歷史決定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以至領導廣大貧民羣衆之可能的時候，游民無產者，尤其是其中的兵士是能在革命中，盡其可能的作用的。陶希聖不願意了解歷史的新的轉變，不願意承認新興階級在歷史的現階段對於一般被壓迫羣衆的領導作用之可能，所以就機械的以歷史的死公式運用來作爲中國革命的永久的鐵律和教條，否認了游民無產者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否認資本主義之發展，由此以否認歷史的現階

段之廣大革命羣衆成分與歷史上過去的游民無產者那一材料本質間的極大差別，而達到否認中國有社會革命前途的可能，這是再錯再機械甚至再毒辣沒有的機械論者。

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嚴 靈 峯

一

作者在本誌前期業已發表過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意見，並且對於新思潮雜誌第五期“中國經濟研究專號”也有過簡略的批評。但是，還不充分。因為，中國社會經濟的分析，為活量革命前途和政策最基本的出發點。因此，不厭重複對於此問題作更進一步的說明，同時并指摘一切反馬克思主義之曲解及其反動性！

歷史是前進的，前進的人們不要與歷史背道而馳啊！

二

研究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濟問題，假使不將牠和整個世

界經濟相聯繫起來，那便證明沒有辯證法的觀點。因為。我們必需把關聯於帝國主義的世界經濟之主要的許多事實，當作一個總體，當作最高發展的資本主義之一定階段來探討。尤其是半殖民地的中國，一切經濟的，政治的實權大部操諸外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之手。難道我們可以把中國和國際的經濟生活分開嗎？可以把中國的資本家和外國的資本家看成兩個不同的階級嗎？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牠是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向着國際範圍擴大再生產的結果。其主要的特徵：

- 1, 資本與生產的集中，發展到最高度，變成壟斷而操縱全世界經濟的生命；
- 2, 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鎔合，變成世界財政資本，在這個財政資本的基礎上，造出財政的寡頭政治；
- 3, 商品輸出之外，又輸出资本，資本輸出已成為極端重要的事；
- 4, 國際資本壟斷的形成，分割了全世界的地域，并且全世界的地域已被列強分割淨盡。

把這些特徵括起來說，便是，帝國主義時代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從輸出商品進到輸出资本，并且輸出资本又是“帝國主義的根本上經濟基礎之一”。固然此時帝國主義更需要商品市場和原料出產地，但統治世

界的并不是工業資本，却是財政資本。確切些說，財政的寡頭政治已經在整個世界經濟生活中起支配的作用。這種支配是由少數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全世界地域中表現最為透澈。

因此，後進國的經濟與先進國的經濟，殖民地的經濟與宗主國的經濟都是脈絡貫通，窒息相關的密切聯繫着。帝國主義列強領土和勢力範圍的擴充便是反映其經濟密網伸張的結果。所以，財政資本觸鬚所到的地方，同時也是金融寡頭政治統治所能達到的地方。於是殖民地和宗主國不但國際市場的交換關係上表示自然分工和社會分工，并且經濟發展的強弱程度表示彼此間之支配和隸屬的關係。在帝國主義世界自身的特點看來，自然主要的還是在境內已經具有財政資本權威的國家佔取宗主國的地位，而殖民地縱然可以在某種順利的條件之下發展資本義的工業，所謂殖民地工業化，終亦不能隨便擺脫殖民地的運命，因為宗主國的壟斷業已經形成，而殖民地纔從事於自由競爭。因此，殖民地的民族工業始終不能與宗主國的工業對抗，最後，只得屈服隸屬罷了。在這樣的進化過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的便是宗主國在自己國內和殖民地境內的銀行。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銀行的基本任務業已改變，即“從多數小媒介機關向少數壟斷者手中的移轉；”構成了從資本主義轉變為資本主義

的帝國主義之根本的要素”。簡截說一句，銀行發展最後的旨趣便是壟斷。於是，宗主國的少數壟斷者可以利用銀行的關係及熟悉流水賬項和金融業務之狀況，先能正確地計核孤立的資本家的財政狀況，而後用縮小信用或擴大信用而統制孤立的資本家！最後，決定孤立的資本家的運命，決定他們的資本應該怎樣；他們的資本可以任其隨意增減。自然，在殖民地境內稚弱的民族工業資本家，更經不起帝國主義銀行的操縱和蹂躪。所以，在他們羽毛未豐的時代便遇着萬能的財政魔王，於是，由於外國大銀行的操縱借款，參與，收買，終至使殖民地的民族工業直接或間接歸於帝國主義的宗主國支配之下。然而，這還不是說殖民地完全不會發生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祇是說，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要新陳代謝的一步一步的投到帝國主義的懷抱裏去成為他們的買辦或半買辦纔能夠勉強生存。因此，殖民地民族工業縱然經不起外來財政勢力的傾軋吞併，但是，民族的輕重工業仍是此起彼伏的發生，不過他們的獨立性要看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對之迫害到若何程度而定。這就是說，後進國殖民地化過程之緊張由於帝國主義財政資本勢力的擴張來決定，也就是說，國際托拉斯間對於世界分割愈迫切，則後進國的殖民地化過程便愈迅速；其經濟生活之隸屬於宗主國的經濟構造也就愈密切。然這始終不是說，因為殖民地化了便不

能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

有一個中國著名的政論家李立三其人者，自命為無產階級政黨底“理論中心”(?)他說：

“殖民地是世界帝國主義發展的有機的組成的一部份，如果殖民地經濟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場與原料的供給，便是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根本動搖。……尤其是不會直接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

這位“理論中心”的政論家，說出如此這般的一段不完整的概念之後，我們以為他的“理論”業已失去了“中心”！或可說抓不着“中心”！

他懂得“殖民地是世界帝國主義發展的有機組成的一部份”；他也懂得“如果殖民地經濟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場和原料的供給”。但他又說“尤其是不會直接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

自然，鬼也不會去相信帝國主義有這樣寬宏大度樂善好施來直接幫助殖民地民族工業的發展，使殖民地走上獨立的道路脫離他們的束縛以養虎遺患；然而，難道在不獨立的，走向殖民地化的條件下，帝國主義也不可以推動殖民地工業發展嗎？

機械論者根本的邏輯便是：“是——是，否——否”；用

簡單言語表示就等於說：“不是這樣，便是那樣”。他既承認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經濟爲“有機組成”；但同時又用“主觀”的方法把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關係分工起來。好像帝國主義只管奪取原料，專門製造商品出賣給殖民地，而殖民地只是供給帝國主義的原料并購買牠的商品。以爲殖民地一發展資本主義馬上便離開宗主國而獨立，或是宗主國的商品便不能在殖民地銷售或得不到原料；這種見解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這僅是以“自由競爭”時代的眼光來觀察二十世紀帝國主義宗主國對於殖民地的關係。他忘記了一宗很重要的事，就是，帝國主義時代主要的特徵乃是財政資本的壟斷。他以爲帝國主義還是以“自由競爭”爲主要的方法來對付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他忘記了在先進國家中“資本過剩”這麼一回可驚而重要的事實！他又忘記了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根本的出發點，不是“原料”，也不是“出賣商品”，而是取得“更多的剩餘價值”；“更高的利潤”！

不曾自詡過爲“理論中心”的列甯說：

“但是資本主義若去發展農業和提高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程度就不成爲資本主義了。（這是指發展帝國主義自己境內的農業和提高境內人民生活而言——作者）爲什麼呢？因爲發展的不平衡與大多數人民的貧困狀態是這種生產的根本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國家中，當

資本主義仍舊存在，過剩資本亦不能停止而使大多數人生活的程度向上，這樣雖必減少資本家的利潤，然而資本家亦可將資本向其他後進國輸出，藉以增加利潤。在後進國中，利潤大概是比較很高，這是因為資本缺乏，地價便宜，工錢低廉以及原料的賤價種種關係。而資本輸出且可造成了許多後進國也踏進了國際資本主義的領域中去；在後進國中，最重要的鐵道都已敷設或在敷設中，工業發展的根本的諸條件都已經確立而存在了”。（圈點是我加的——作者）

這裏可歸結成三個要點來說：

第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甯願自己境內農業落在工業後面，甯願使境內大多數人民生活陷於貧困和饑餓狀態，爲要增加自己的利潤把過剩的資本投到後進國去；

第二，因爲後進國資本的缺乏，地價的便宜，工錢的低廉以及原料的賤價種種關係可得較高的利潤，即是說，後進國正是先進國過剩資本的消納場；也就是說便於先進國的投資開展資本主義的生產；

第三，資本輸出的結果，使許多後進國也踏進了國際資本主義的領域，確立了工業發展的根本諸條件。

由於資本大量輸出的結果，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後進國工業更有發展的可能，更促使半殖民地從“過渡形態”

漸漸變爲殖民地。

我們且引列甯所舉的數目字來證明帝國主義資本之輸出於殖民地不但十分可能，而且很利害的。

如下表(以十億佛郎爲單位)：

	英國	法國	德國	總計
歐洲	4	23	18	45
美洲	37	4	10	51
亞,非,澳,三洲	29	8	7	44
合計	70	35	35	144

投到亞,非,澳,美四洲的資本已佔三分之二以上,因爲這些地方大都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後進國居多。列甯特別地指明說：“就英國而論,縱使僅計算美洲方面(加拿大)而不及亞洲與其他各國,則殖民地總佔第一位。由此可知資本的大量輸出與殖民地的佔領實有很密切的關係”。(帝國主義)至於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從輸入資本變爲輸出资本的国家,其到處找投資的孔隙這是盡人皆知,此地不須多說的了。

其次,資本輸出不但可以在殖民地得到更高的利潤,并且更促進了商品的輸出,因爲帝國主義時代,生產的基礎仍是建立在商品生產之上的。如殖民地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必定引起宗主國機器和種種進步技術,鐵軌,火車頭,等等的

輸出。這不但如列寧所說：“資本輸出實成爲激勵商品輸出之法門”，並且還有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所發生的交換，各國間不只是質量不同的生產品才行交換；即同質量的生產品也要進行交換。例如，某一國可以輸出於某幾國的，不單是這幾國所不生長的；或且生產極微的貨物，而且可以輸出其商品與外國的生產品進行競爭的。不但後進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供給先進的宗主國以原料，並且宗主國也時常供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的。而在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支配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但不會完全把原料只留給本國工業部門的自己使用，而且將從前用落後的技術所製造的原料變成用進步技術來製造原料以供帝國主義的需要和操縱。機械論者的觀點唯一的特徵，便是一切都是固定不變的。他們不了解時代的特性；與現象的具體聯繫。他們以爲假使殖民一旦地和半殖民經濟發展，好像馬上便脫離帝國主義的宗主國而獨立似的，所以極端來否認殖民地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資本主義經濟可以發展的一回事。他們以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一發展，馬上便使帝國主義失去商品和原料市場似的，因此，便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可以在殖民地發展和起領導作用這一回事。他們既已承認了殖民地是帝國主義經濟的有機組成部份；他們又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固定為容納商品和供給原料的限界以內，這裏很顯然地，把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投資輕輕地放過不談。

再則，資本輸出的結果，使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已成為馬克思主義不可否認的重要理論之一！誰個再來無恥的狡辯，以為生產原料的工廠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或在帝國主義壟斷之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廠，礦山，鐵道，運輸等等企業，不算為殖民地經濟組成中的資本主義因素，把民族工業和帝國主義工業截然分開（截然分開與“有機組成”是不兩立的！），我們只得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與庸俗化，而嗤之以鼻！

三

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牠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經濟的發展一般的趨勢當然與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發展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差別。至於某些特殊情形也只能以馬克思主義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發展一般的法則來說明，而不能以特殊情形來否認一般的法則！因此，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和特徵的認識與不肖門徒的認識，主要的分野就在這裏！

我們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探究，不管李立三，或與他同一鼻孔出氣的“新思潮派”的長篇巨製的大文中，在前提和

分析上如何的自相矛盾，但我們只是將他們重要的結論拿來作批評的對象，以免濫費筆墨。

王學文君在新思潮雜誌第五期上關於“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一文內，很勇敢地做了如下的結論說：

“由這看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這種狀態壓迫之下，不能向上發展，如果想向上發展，非先打破三重束縛不可”。(P.26)

這三重束縛是什麼呢？當然，在整個“新思潮派”的思想中心都是堅決的認定：

- 1, 帝國主義；
- 2, 封建勢力；

實際上從他們的一貫的觀點看來，這兩種束縛，只是結成一塊的一種束縛罷了。因為他們唯一的結論便是：“帝國主義維持中國封建勢力”！但是我們對於上述這兩種力量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影響如何，應預先明白地指出，然後再作詳細說明，以免紊亂讀者的注意力。

我們承認帝國主義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影響是這樣：

- a, 在整個方面是推動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前進；

b, 相對的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發展。

封建制度又怎樣呢？

a, 相對地阻礙(但這種阻礙只是消極的反抗作用,并到阻礙不住還要投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b, 牠的經濟基礎是不斷地受帝國主義破壞,不是受帝國主義維持。

至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兩種束縛對於未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纔起同一的作用。若說,中國能夠排除這兩種束縛之後,還是向着資本主義發展,這樣的經濟“向上”,如王學文君所說:“這是中國整個經濟的前途,也同時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前途”。這只有馬克思主義最無恥的叛徒纔說得出來。

帝國主義推動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的發展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輸入資本和機器。

我們試舉從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一年,帝國主義輸入中國機器的增加,便是證明他們不但沒有方法阻止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加緊向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反而輸入進步的資本主義技術來促成這個過程的。

機械輸入表:(註一)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一年
紡績機器	643,000兩	5,109,000兩

農業機器	113,000兩	2,192,000兩
其他機器	3,700,000兩	26,732,000兩
附屬機械	50,000兩	931,000兩
合計	4,506,000兩	34,964,000兩

僅在八年之中，機器輸入的價目增加七倍以上。可見中國在帝國主義影響之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是往前發展的。

至於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方面，第一步便是在中國用借債的形式投到敷設鐵道方面，確立了中國工業發展一個基本條件。這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事實，更不能說，帝國主義在中國敷設鐵道只是便於交通，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素。或者更不能用滑稽的文句來說，敷設鐵道可以維持封建勢力！

茲舉列強在中國鐵道借款的數目於下：

國別	鐵路數目	款項
英國	8	29,900
法國	1	600
俄國	1	40

(註一)本表係摘自日本伊藤武雄氏著的現代支那社會研究；與作者在本誌前期所引的機器進口表，在價格的數目上略有出入，然而，其證明機械輸入增加的急速總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中國目前還沒有精密的統計，只得東抄西竊，這是很可憾的！

14	動	力
比國	2	335
美國	1	1,120
日本	2	30,000

上列諸項外，還有幾條鐵路是幾個帝國主義共同投資辦的：一為英德合辦；一為美法合辦；一為四國銀行團合辦的。（註二）

帝國主義這樣的向中國開闢交通，難道也是為着維持封建勢力，造成分區割據的條件嗎？恰恰相反，這正是給分區割據者的保守派的領主們之閉關主義的企圖以致命的打擊！

帝國主義投入中國電話電報的資本：

國別	經營的數目	款項
日本	4	45,092
英國	3	210,548
德國	2	47

這種電話電報的建設很顯然係適應於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銀行要需的。（註三）

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經營的礦業：

（註二）上表款項，英國以千鎊為單位，俄國法國均以千佛郎為單位，美日以千元為單位。俄國在戰前乃是帝國主義。

（註三）上表款項，日本以千元為單位，英、德以千鎊為單位。

國別	產地	所出產之礦素
日本	撫順	煤
日本	管城子	煤
日本	煙台	煤
英國	四川區域	各種都有
英國	新疆	煤油
英國	廣東	煤
英國	山西	煤與煤油

此外帝國主義和中國合辦的煤礦約有三十餘處。

帝國主義在中國關於重工業的工廠：

工廠種類	數目
船渠造船	22
蒸汽機關	22
鋼鐵及鋼鐵細工	9

此外有許多輕工業工廠未曾列入。

至於紡紗業日本的投資為200,000,000元，英國為20,000,000鎊。

假使上列這許多企業還不能算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領域——亦即世界經濟一個部門——之內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發展，那末，我們將不知把這些部門歸納到那一類的經濟中去。

此外，帝國主義足以操縱中國經濟命脈的就是資本主義式的銀行。現在中國總共有一百四十一個，其中十九個為中外合辦銀行，四十二個為外國銀行。在十九個中外合辦銀行中的資本共有24,000,000中洋；4,500,000兩；50,000,000佛郎；60,275,000日金。

外國銀行的確實資本，有50,000,000美金；11,000,000金鎊；13,000,000兩；182,000,000戈爾登；543,000,000日金。

其中重要的許多銀行的總行都是在倫敦，香港，巴黎，紐約，橫濱，台灣，大阪，東京。這都證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銀行，乃代本國財政寡頭政治盡仲介統治的作用。此外，還有四國，五國，六國銀行團的組織專門為的宰制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生活。這種宰制的作用，我們並不是像不肖門徒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以為可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不能發展；乃是說，使中國的經濟更隸屬於帝國主義，更和資本主義的勢力密切起來。

我們再看中國從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二〇年止，十八年間銀行的發展情形怎樣：

年份	銀行數目	分行數目	名義資本	已付資本
1902	1	—	2,000	—
1904	3	1	2,314	610

1906	4	6	6,702	1,314
1908	7	15	13,219	3,189
1910	10	23	35,000	8,596
1912	23	69	35,000	18,159
1914	34	119	58,970	20,839
1916	39	161	72,770	38,094
1918	48	178	100,150	59,985
1920	58	277	188,890	86,676

由上表看來，銀行資本的增加，每隔兩年約增30%並且有增無減，於此更可見資本主義勢力統治範圍之逐漸擴大的了。假使這還不足證明，那末，世界上將沒有更好的事實！（註四）

此外，還有兩種事證明中國經濟之向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工業和農業公司逐年資本的增加。

工業公司

年份	公司數目	資本總額(元為單位)
1912	531	54,808,202
1913	565	49,875,160
1914	641	62,108,218
1915	644	106,901,214

（註四）上表以金盧布為單位。

18	動	力
1916	685	132,779,808
1917	557	128,243,723
1918	533	108,902,811
1919	425	129,221,247
農業公司		
年份	公司數目	資本總額(元爲單位)
1912	171	6,351,672
1913	142	6,009,962
1914	129	4,960,269
1915	129	6,241,075
1916	133	9,791,489
1917	132	10,663,456
1918	191	9,498,309
1919	102	12,468,804

若說中國民族工業能夠痛快的發展，使中國達到完全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這當然完全是一種幻想！因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不但操縱一切財政機關，並且在政治上得了許多優越地位，尤其使中國關稅不能自主。況且當現在二十世紀帝國主義已到了壟斷的地步，而中國民族工業尚在幼稚時期，不管在任何形式之下的競爭終於遭帝國主義最後的打擊。但也不能說中國民族工業一些也沒有發展的可能。更

不能說帝國主義不許中國發展重工業。因為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某時期內某些國家經濟停滯而某些國家却順利發展；某些國家資本主義已發展到登峯造極，而某些後進國尚在發展的初期。我們不能像機械論者們以為某些國家在經濟停滯的時期，或緩慢發展，便認為資本主義不能發展。尤其是以中國重工業不能有重大的發展，便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們不理解這種現象便是“不平衡”，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絕對的公律”！至於中國民族重工業之不能發展，主要的原因還不在帝國主義的主觀意志之恩准與否，而在乎中國民族資本原始積累的薄弱，與本國大部份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多靠外國供給。所以，在輕工業方面的發展，正表現這種民族工業的特性與經濟力。

我們試拿中國紡績業的發展中與外國在華的紡績業比較一下，便可發見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就是證明帝國主義只能相對的阻礙中國的民族工業。

所有者	年份	工廠數	資本	錠數	織機
英國	1915	4	—	195	924
	1925	4	12	295	2,348
日本	1915	3	—	166	7,205
	1925	45	270	1,326	—
中國	1915	7	—	259	—
	1925	69	130	1,882	16,350

從這表可看出，在十年中不管外國和中國的紡績業都是向上發展。若說帝國主義只讓中國人發展輕工業，何以英國，日本，也在發展這類輕工業呢？難道中國人的紡績業的發展不會打擾他們的生意嗎？在紡織業中中國與帝國主義有平行發展的趨勢，就是表現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工業只是起相對的破壞作用，不能消滅中國整個民族工業，因為，第一，帝國主義在某種限度內不得不代表資本主義的共同利益，第二，有些中國民族工業有時被帝國主義傾軋，吞併，但還可更迭交替的發生。這種現象便表現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掙扎。

最主要的上表中表現了日本和中國的紡績業是平行并進的狀況，這個給與機械論者以歐戰和排貨作基本的原因來解釋中國民族輕工業的發展以迎頭痛擊！他們不了解戰爭和排貨固然可以影響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不能專以戰爭和排貨來說明！不然，必定會結論說，帝國主義不戰爭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便不能發展；或中國不排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便不能發展。不肖門徒必然會得到這樣謊誕的結論。因為，他們具體的意見就是帝國主義不發展時，中國就發展，帝國主義發展時中國便不發展。所以，遇到上表的事實時他們便無法解釋。他們根本不了解戰爭，排貨乃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所發生的現象，反而把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國內紡織廠的統計

	廠數		紗錠		布機		錠錠	
	17年	18年	17年	18年	17年	18年	17年	18年
華商上海	24	27	776,388	878,098	7,398	6,338	43,108	43,688
江蘇	19	19	433,496	450,696	3,426	3,192	6,320	6,320
河北	9	9	282,460	284,460	1,860	1,860	7,296	7,296
湖北	5	5	265,096	276,014	2,878	3,015	3,240	3,240
其他	15	17	344,088	367,604	1,225	1,550	8,388	8,376
計	72	77	2,098,528	2,256,872	16,787	15,955	68,352	68,920
英商上海	3	3	153,320	153,320	1,900	1,900
日商上海	32	30	1,010,000	1,054,344	8,356	8,900	117,544	161,744
其他	12	13	387,272	435,016	2,540	2,547	1,020
計	47	46	1,550,592	1,642,630	10,896	13,637	117,544	162,764
總計	120	124	3,649,120	3,899,552	27,683	29,322	185,986	222,684

這些現象來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運命！我們再舉一個今年在申報上六月十日所發表的一個統計來說一說罷。這個統計由資產階級報紙的說明也是說由於濟案發生抵制日貨，全國統一而起，實際濟案發生後，各地排日運動多受政府干涉，並且所謂統一的去年，同時也是到處混戰的一年。自然，資產階級只有這樣說明纔能引起人家去排貨，去幫助他們統一。

由上表看，中國紡績工廠在去年一年中增加了五個，紗錠和線錠都是增加的，日本紡績工廠雖減少一個，但紗錠和線錠仍然還是有增加。可見在去年那種可憐的狀況之下，紡績業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發展的趨勢。抵制日貨的結果，日本的紗錠和線錠也都增加起來。排英運動在去年是沒有的，並且去年李濟還扎紗塞慘案的紀念碑拆毀以保證中英的“友誼(?)關係”，但英國的紡績業在中國境內還沒有多大起色。排貨運動的解釋可說是最皮毛的解釋了。我們以為假使申報大主筆先生也曾看到李先生等的大著之後，定會首案自喜說：“吾道不孤了”！

申報內接着一個統計，謂本年內還可以開工的紡績廠如下：

廠名	地點	紗錠	布機
申新八廠	上海	40,000	——

濟生	上海	未詳	
益豐	太倉	未詳	
華昌	紹興	10,000	——
宜昌	宜昌	20,000	——
普益	山西	10,000	150
雍裕	山西	10,000	
遼營	營口	10,000	96
沙市	沙市	20,000	

上面屬於華商的。

廠名	址點	紗錠	布機
上海第五	上海	30,000	1,000
大康	上海	30,000	——
公大第三	上海	30,000	1,000
豐田第二	上海	40,000	1,000
裕豐第二	上海	30,000	——

上面屬於日本的。

由我們看來輕工業的發展在半殖民地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發展中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因為這可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擴充，家內紡績業的破產，貸銀勞動者的增加，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等等事實。但是，若由李立三們看來，這不過是輕工業，算不得什麼資本主義，因為這是供給

帝國主義的“原料”！

其實在今日世界經濟密切聯繫中，帝國主義固然要到處奪取原料和商品市場，但並不是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專為供給原料和消納帝國主義的商品。所謂殖民地化的意義，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不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發展，而是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雖然發展，終不能脫離帝國主義宗主國的統治。更不能說沒有重工業的發展便算不得資本主義發展。到底要多少重工業和多少輕工業的配合發展纔算得資本主義的發展呢？這個問題就是那些喜歡講數量的不肖門徒們也是不能答覆這個數量的！殊不知正因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經濟有有機的組成，於是殖民地可不需急速的發展重工業，能夠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這也是由於帝國主義輸入商品——特殊的商品，即重工業所生產的進步之資本主義技術——的結果。

實際上在帝國主義時代，不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供給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原料；並且帝國主義也有供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

帝國主義輸入中國的原料：

原料種類	年代		
	1913年	1921年	1922年
燐寸材料	495,000	2,281,000	2,857,000兩

棉花	3,017,000	35,967,000	41,956,000兩
合計	3,513,000	38,248,000	44,813,000兩

這表證明所謂只要中國原料的帝國主義在九年中也不斷地增加輸入原料到中國來，并且所增加的價目在九年中竟達到十五倍。

現在再就去年七月至十二月各國對華輸入的棉紗看看：

	1928年(7月至12月)	1927年(同時期)	增或減
日本	10,154,517疋	11,838,132疋	減15%
英國	2,452,455		增75%
美國	33,003		增39%
德國	93,119		增48%

帝國主義這樣地供給原料來幫助中國輕工業發展，這又使機械論者摸不着頭腦！然而，他們唯一的回答便是：這無非是帝國主義輸入的商品！

於是不肖門徒恍然大悟說：原來原料就是商品，商品中也有原料！

這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掠過程中，只有向兩方面——即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擴大交換的領域，擴大商品的生產，擴大剩餘價值的剝削範圍。也就是說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更趨於資本主

義道路的發展。至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獨立與否，是不能破壞和代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法則的！所以，不管中國成爲帝國主義怎樣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但無論如何不能說中國社會可因帝國主義的統治而逸出資本主義發展的公律！或如經濟學家的王學文先生所新發明的：“中國經濟實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個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經濟”！

（新思潮No5, P.23）我們只懂得列寧所說的：“資本輸出影響輸入資本的國家的資本主義之發達很大，且能促使其非常發展。所以，資本輸出的國家的發展雖被阻於某種限度，但仍能使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之擴大與尖銳化”。

我們只懂中國是輸入過資本的；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有時雖被阻於某種限度；但中國畢竟還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之擴大與尖銳化”的一部分！

潘東周說：“所以，帝國主義經濟必然成爲中國資本主義的關係發展的障礙，這并不矛盾，這正是馬克思辯證法的基本原則”。（社會科學講座第一卷 P.288）這正像李立三先生所解釋：“不要故意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一語乃是辯證法的觀點一樣有趣的無恥！

“辯證法”是個矛盾邏輯，“錯誤”是最矛盾的事，因此在形式主義者的思考領域內一切“錯誤”都可成爲“辯證法”；於是他們把一切“錯誤”的思想都要找“辯證法”做護符！所

以，市僧，文氓，不肖門徒，機械論者，都可以在“不矛盾”掩蔽之下，站在一邊貼着“辯證法”的商標到處招搖撞騙；世界上之侮辱馬克思主義還有比此更甚的嗎！？

四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通常先在城市中發展，首先在工業領域內發展。而農業經濟大部分長留在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上，至於已經受着工業影響之下的農業經濟的生產便會帶着另一性質。

中世紀的農民家庭幾乎完全就是自給經濟的公社，他們不僅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生產手段，並且自己建築住宅，家具，織布，縫衣等等。他們固然也到市場上去，但所出賣的只是他所生產多餘的東西，所購買的除生鐵以外大都是奢侈品，並不是他們生存主要的對象。

城市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便把農民的手工藝排擠了。因為城市工業發達，便採用了進步的技術製造許多農民所需要的生存對象。於是農民漸漸把自己許多生存手段依賴於市場的供給，便漸漸失去了過去一切手工藝的技能，自是農民家庭也失了獨立的可能性，就是說，若不和市場上發生交換便不能生存。更確切些說：“不出賣不生存”！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愈發展，則農民的原始家內產業便愈崩潰，愈使農民

對於貨幣的需要。他們現在對於貨幣的需要不僅爲購買次要的對象或奢侈品，並且爲着購買最必要的東西。沒有貨幣他不能從事經營自己的經濟，再也不能生存。農民取得貨幣唯一的方法，便是把自己的生產物變成商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兇年饑饉的結果，他們得不到貨幣時便出於借貸，於是便把自己的土地抵押於高利盤剝者；漸瀕於破產，結果使他們轉變爲無產者而與土地分離。

中國農村也和一切社會一樣，也要學着歷史發展一般公律所支配的；不過中國農村階級分化的過程，其促成的主要因素不在於本國城市工業，而在於歷史上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長期侵蝕與夫價廉物美而有射擊力的帝國主義商品。然而，在閉關時代以前商業和高利貸就已蠶食自給經濟的基礎，在中外通商開始之後，帝國主義商品之侵入農村正是蒸蒸日上無可遏止；這樣便不斷地引起農民對於貨幣的需要之增加；同時發展了農村的交換關係；農民家庭手工藝技能漸漸因一切必要日常用品靠市場的供給日漸消失，這樣生活之依賴於市場不得不將自己的生產物變爲商品向市場出賣取得貨幣，購買日常所必的東西。從前自給經濟時代，他們一切生產爲滿足自己家族的需要，現在他們要滿足自己必須先去滿足別人，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把自己所創造的生產物出賣之後，得到貨幣再向市場交換日常所必

需的用品；這樣，農業經濟再生產的行程必須依賴於城市的交換。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貨幣的需要亦不斷地增加，於是農民沒有貨幣便不能夠生存。天災，水旱，賦稅，遺產分割，等等都是使農民逐漸依賴於高利貸者。中國農村中的高利貸者則多半係帝國主義的經紀人，商業家，一部份鄉村富農。農民迫於窮困而借債，結果不得不把家財和土地抵押，而這些經紀人，商業家，等等更因自己資本蓄積的微弱，城市中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浩大，只得逃到農村中用少量的資本投到土地上或借債以剝奪農民。農民既在高利貸資本宰制之下，要挽救自己的最後危亡的運命，只有用盡自己一切的勞動；然而，終竟得不償失，流於破產，土地漸為債主所有，而自己便投入鄉村無產階級的隊伍中，或作雇農，或向地主佃地耕種，或流為兵匪。於是農村中階級分化和對立的過程便漸趨顯著。一方面便是農村中的新式地主，高利貸者，富農，另一方面，便是佃農，半佃農，雇工等等。我們現在試舉一個統計來證明中國農村階級分化的事實：

中國農民分量表：

有土地的農民(地主亦在內)	150,000,000人
無地的僱農	30,000,000人
佃農	136,000,000人
游民兵匪等	20,000,000人

總計	336,000,000人
----	--------------

上表有土地的農民150,000,000人中便包含了所有
的地主,富農,自耕農,和半自耕農;那末,我們從這裏約略可
看出,在地主和富農剝奪之下的佃農和僱農有166,000,000
人了。再加上20,000,000人的兵匪游民,失去土地的人口計
有186,000,000。就是證明在中國農民中有半數以上的農民
沒有土地。

然而,在有土地的農民中(當然照上表包括一切地主計
算)的土地又怎樣分配呢。

	戶口數的 百分比	佔有土地面 積百分比
貧農(1—10畝)	44%	6%
中農(10—30畝)	24%	13%
富農(30—50畝)	16%	17%
中,小地主(50—100畝)	9%	19%
大地主(100畝以上)	5%	43%

這樣我們可得出一個結論:全農業人口中有土地的佔
45%,無土地的佔55%,只有五千萬的地主和富農,便佔有
81%的土地,這裏無論如何都要證明兩個在資本主義制度
影響之下的事實:

- 1, 土地的集中;
- 2, 農民向兩極分化。

任他李立三和新思潮先生們怎樣的爭辯說，這樣結果係帝國主義侵略所致，而不是中國本身民族工業發展的影響；那最少限度也不能說，這是封建關係統治的結果使然罷！恰恰相反，農民的破產墮落，與土地集中到執有貨幣的地主手裏去，更是表現封建領主經濟基礎的崩潰與向着新興的地主讓位的。我們固然可以在一般的言語上可說“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我們不能在經濟學的研究上隨便的說有“地主皆封建”！因為地主不但在封建社會內部有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也有的。可是這兩種地主在本質上業已不同了。因此，我們必須研究在封建時代地主怎樣地佔有土地；今日中國農村中的地主怎樣的佔有土地。其所處的條件與中世紀時代有什麼不同。

五

在封建時代，人民對於領主的經濟從屬之最普遍狀態，便是把封建領主看做人民所賴以生存的全體土地的所有者，如孟子所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形一樣。因為當時農業在社會的生產生活中演了最重要的作用，封建領主當然也要完全支配土地，同時亦就支配人民。所以，封建領主佔有土地的形式完全靠政治上的特權，并非由什麼自由買賣的方式購買來。領主的土地既直接由權力佔有而來，

於是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便也取着公開露骨的形式。領主對農民的剝削關係並不是隱存在交換和欺騙掩庇之下的。農民不能隨便離開土地，而要拘束在土地上面以供領主的榨取，這種榨取的主要的形式：第一是強制勞動；第二是付納租稅；這些剝削完全是對領主統治下的“義務”性質。至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農民乃是租借地主土地而支付地租。這時代的特徵還是封建主常保持有“超經濟的強制力”。

在中國土地關係上雖然還存留着許多封建制度的殘跡；但在土地佔有的關係上很普遍地是以貨幣購買土地的新式地主佔絕對優越的地位。可是這種地主絕不同於封建時代的領主。他們佔有土地并非從自己政治上的特權而佔來的，而是由於中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條件之下，他們用貨幣購來的。我們不管這些地主貨幣的來源如何，（或由商業中積蓄的利潤，或因重利盤剝的結果，或從作了貪官污吏軍閥等搜括來的，或從帝國主義供給的等等）但他們要取得土地必須向農民購買的。而農民向這種地主出賣和租佃土地多半帶“自願”的性質。地主也不能強制農民去租佃他們的田地。建立在這樣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上的土地佔有形式；地主自身不是把自己當做政治上特權者來剝削農民，而最藉其在經濟上握有萬能的貨幣向農民進行榨取的。這一類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單純的地主或兼工商業資本家，高利貸

者，富農等等。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不外把地租當作投資的利潤和利息來看待的。所以，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貨幣）剝削的程度如何（50%或70%）其本質不外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罷了。若在富農直接僱用之下的僱工其受資本主義方法的剝削更無疑義的了。

至於中國土地上剝削形式的複雜和剝削程度的利害則完全受舊時代的歷史和社會所遺留下來的殘跡所影響，但也僅是表現形式上的特異，而不能表現中國地主對於農民剝削之經濟上的實質與內容。

中國農業經濟中能夠代表時代的特徵的便是交換和地域分工的發展，這樣就充分地表現了農業經濟的生產很廣泛地都是為市場而生產，也就是說農業生產都是普遍的建立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的。這種商品生產決不同於商品發達初期的偶然交換，或把多餘的生產品提到市場去交換，而是以交換為出發點的去進行生產以適應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要求。

當着封建時代領主固然因為要滿足自己的精練欲求，有時也會利用交換，但交換總是例外的事，他的大部分必需品還是從農民身上取得來的。自然品貢稅本來就是表示這時代的特徵，因為領主的必需消費品係直接由農民供給的。所以，這時領主對農民剝削的主要目的是在“使用價

值’。而不是“交換價值”！中國今日的地主們，對於農民的剝削主要的目的却不在於農民直接供給他們一切必需的消費品，——實際上農民已經沒有可能直接製造近代地主所消費的一切必需品了——而是要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納給地主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最流行而時髦的商品——生產物或貨幣——至於這種地租由地主看來，是他的耗費購買土地的資本上應有的利息；由農民看來就是他自己勞動所創造的一部分剩餘生產物，不過這種剩餘生產物是他自己之社會必需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罷了。

中國農村中階級分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商業地主，佃農和流民無產階級之平行的增加；這些現象最主要的原因係中國海禁未開以前獨立發達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已有長期的在農村中被壞封建經濟的基礎，造成農村中農民破產的普遍現象。於是鄉村人口過剩，農業危機，戰爭搖動等等在一方延續農業經濟的衰落和停滯狀況，另一方面又不能使生產方法自身很快地過渡到資本主義方面去，使無處容納這廣大的破產農民。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商品侵入農村更急劇地促使廣大的農民破產，農民破產的結果脫離土地，農村生產更趨衰落，於是乎使舊時靠着剝削農民爲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領主，貴族，官僚，也因此站腳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經濟侵掠的結果之貧困的農民

要出賣自己的田地，即舊式的望族，宗室也要將自己的土地整批出賣的。其次，城市的資本主義工業雖然已開始發展，但大部分還是操在帝國主義手中，民族工業以資本積累的薄弱，不能與帝國主義工業對抗，於是擁有小數貨幣的民族資本家，商人，高利貸者，便趁土地上投資輕本厚利的機會出買其土地來了。這是新式地主發生的重要原因；農民破產的急速，使城市新式資本主義工廠無法盡數容納，於是一部分流為農業經濟中的雇用工人之外，另外的破產農民則移於海外，如到南洋星加坡，菲律賓等處，最後則流為兵匪，造成了軍閥制度強固的基本部隊。這些都表現着中國資本主義之工業發達還不能適應封建勢力急劇崩潰的需要。最後大多數的就出租地耕種以維持自己垂亡的運命。於是佃租制度便成為中國農業經濟中最廣佈的現象。這種佃租制度完全建立在新式的——即資本主義的——佔有形式的基礎上面，與封建領主的“賜地”是截然不同的。中世紀領主對於農奴的關係，主要的乃政治上特權者對於奴屬的關係，而土地的佔有形式主要的還是靠政治權勢來維持（固然有時農民因借債而成為農奴）；因此，領主對農奴的剝削是取公開的形式，農奴不能自由離開土地而中國佃農對於新式地主的關係主要的還是貨幣的關係，佃農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則任何地主絕沒有強迫農民佃地的可能，這種佃農與新式地

主之間無論如何在名義上和法律上是平等，是以雙方同意爲前提，這種佃地關係亦如城市工人把自己的勞力出賣給資本家一樣，不管資本家把工人的工作延長二十小時也好，極端進步的合理化也好，支付極低微的工資也好，在工廠內隨便打罵工人也好；但在法律上雙方都應有名義上的平等，是以交換爲原則的。所以，新式地主對於佃農也是在地租的形式掩蔽之下掠奪了一部分剩餘價值。

所以，在中世紀的農民解放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在廢除封建領主的特權，使自己排除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縛（如一切“超經濟的強制力”等等）變成爲自由生產者，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使自己變爲資產階級；中國農民最主要的并非土地私有制不自由而是大多數缺乏土地，也就是農業經濟中的生產者最重要的一個生產工具——土地——的缺乏。因此，要解決中國農業上的根本問題，就要剷除現存的佔有制度，而佔有中國廣大土地的，又不是維持舊時代殘存下來的貴族，宗室，而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資本家；總之，佔有大部分土地的只是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工業家，買辦，商業家，高利貸者，富農。中國不但沒有與城市工業資產階級絕對對立的地主，而大部分的資產階級又是直接間接作了帝國主義剝削中國農村的忠實經紀人。因此，中國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城市和農村的資產階級的經濟

基礎，并且也要推翻帝國主義之政治上和經濟上一切特權！

六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後，不但推進了中國國民經濟中城市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斷的發展，并且也推動農業經濟階進資本主義的領域。我們從上面農業經濟生產技術進口之不斷的增加，和佔有農業全人口十分之一的三千萬雇農，和佔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一萬三千萬的佃農；便證明農業經濟中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以及農村資產階級勢力與數量的增加；換言之，即農村中資本主義關係之不斷的擴大。

我們上面業已說過，帝國時代的基本特徵便向外投資造成壟斷。所以各帝國主義輸入中國的資本對於中國殖民地和資本主義化都具一樣重大的意義。國際帝國主義直接的投資如建築鐵路，海關政策，外國銀行的兌換等等；間接借款，就是戰爭的賠款等等加重了中國國債的擔負與一般經濟的和政治的不獨立。幾乎全部的重心都架到農民身上。強迫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為帝國主義剝奪的對象。農民家庭工業的破產，使農業經濟的結構根本起了變更；就是長久的發展以交換為目的農業生產。

在交換經濟統治中國農村的條件之下，中國農業經濟

大別可分如下數種：

- 1, 手工業式的農業生產；
- 2, 爲販賣商人而經營的農業生產；
- 3, 純粹資本主義式的農業生產。

第一種經濟的特點，就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直接有交換的關係，此種經濟多爲近於城市之小農經濟，這些小農經濟把自己的生產品如荳類，蔬菜等等供給城市。這些經濟普通不用僱傭勞動，以自己家庭勞動爲主體而工作。城市愈發達，城市居民增加愈快，此種手工業式的農業經濟亦發展得愈快；這種農業經濟在中國農村中最普遍的現象。

第二，爲販賣商人經營的農業生產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這種經濟也和手工業式的農業一樣，包含大批小農，他們生產表面上似乎是完全獨立的，而實際上却完全依賴於商業資本，這些商業資本家大部分是帝國主義間接的買辦或經紀人向這類農民收集大批的原料；所以他們的生產主要的爲供給外部市場，經過販賣商人的仲介把生產品傳達給各地消費者或出口，在實際上，他們只是在自己家內爲商業資本家生產利潤的家庭工人。這種經濟好像城市中家庭手工業者在家內爲大工廠部門制造某部分半製品，或如裝訂圖書，粘貼商標，製造匣子等等，由工廠主或經紀人供給原料；在形式上好像還是獨立，而實際就是坐在家裏爲資本

家做工。這種經濟得以普遍，其基礎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大了內外市場，又使小生產者沒有與市場直接發生關係；另外，農村生產者的數目較城市工業生產者為多，生產品超過於內部市場實際上的消費能力，在這種情形之下，又加以生產品大批出口，於是便造成了販買商人的壟斷。這種農業經濟在中國的發展，與其說是生產品超過市場的需要，無甯說是因為貨幣關係的發展和農民的破產，致不得不將生產品出賣的。

第三，就是純粹資本主義性的農業生產；他是以資本主義形式生產和以資本主義形式出賣的。這種經濟是依照資本主義企業的原則組織的，牠包含了資本主義生產各個根本的現象，如僱傭勞動，投資，為利潤而生產等等。關於這種農業經濟的例證泰羅爾曾給我們許多的材料，他明白地說，農民是在起分化，一方面形成富農；另一方面形成破產的農民，脫離自己的經濟，出賣自己的勞力以維持生活。於是一方面發生無地或極少土地的僱農，另一面發生剝削僱傭勞動的富農。泰氏說到中國農村中資產階級的形成還有一段很重要的話，他說：一部分農民因商品經濟的發展漸漸變成鄉村的小資本家，這種小資本家一方面租種土地，剝削僱傭勞動，另一方面經營商業，取得額外利潤。佃農本來是農民中最痛苦最受剝削的份子，因為他們是藉納租而生活的勞

動者，但蕪湖佃農却與此相反。那裏的佃農，一方面是租地生產的農民！另一方面又是僱傭勞動的剝削者，而在剝削勞動以取得過度的利潤，中國農村資產階級一部分就是這樣形成。

這些事實不但證明資本主義關係可以在農村中長足的發展，並且關於蕪湖的佃農更足證明他們與地主的關係絕不是領主和農奴的關係了。假使這種事不限於蕪湖一處，那麼中國土地關係的問題上，我們就敢斷定已是十分正確的了。

至於中國農業經濟中很多地方都採用了新式的灌溉，例如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已實用蒸汽甚至電氣摩托與電抽水機來灌溉了。在常州一帶，用電力灌溉的在一九二六年約有稻田四萬餘畝。

安徽省另有通行的抽水機，即以煤油和石油為發動力的抽水機。此種抽水機在五年前已開始試用，一九二六年僅在滬甯路一帶已有一千具以上。上海有幾個工廠差不多完全為此種抽水機而生產的。

此外農業企業亦日漸發展，舂米機器多係英國產的，在揚子江一帶尤為推行。產棉區的榨油廠日益發展，產茶區製茶企業之普遍。沿海一帶罐頭和煙草企業之日漸發達，都是不可置辯的事實。

如販賣商人經營農業的經濟，在產米區最爲發達；蕪湖一縣爲中國米糧出入最豐富的區域，那裏有幾十個代辦的商號，在任何鄉村內都有販米商人的足跡。在蕪湖城內的穀物交易所內，有米多種，又有一定的價格，與上海及其他各地互通聲氣。秋收時候，春米公司以新式機器舂米，運往上海，芝罘，甯波，廣州各地轉爲銷售。

最後，荳，棉花，絲，茶，桐油等等銷售尤廣，大部都供應國際市場。

中國農業經濟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形式便是外國資本參加中國農產品的製造。如山東英美煙公司的經營，便是用這種形式投資於農業經濟。此外中國資本直接投於農業生產的事情我們也常可看見。廣東的米廠和糖廠，中國中部等處的棉田，都是例證。雖然年來政局不靖（如內戰，土匪等等）這些企業還是發展的。農業中的大資本主義經濟在其他地方，如察哈爾也有。固然山西北部每年有大批農民來到這裏開荒，但此地沒有開闢出來的土地還很多。農民春季來到這裏工作，秋收後便回去。農具耕牛，種子，居屋等等都是地主供給，甚至一部分食糧也是向地主借來的。在其他省內，我們也可找出大的農業企業。特別是滿州里地方純粹的資本主義大企業最爲普遍。

總之，不管中國農業經濟中土地雖然多集中於小地主

手裏，但資本主義式的大地主也必然會隨經濟的發展而繼續發生和增加的。但不管怎樣，目前中國農村中主要的統治者無疑的是，鄉村的資產階級；即列寧所謂“農業經濟中三位一體”兼作地主的高利貸者，商人與富農。

七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并非現存社會中唯一的生產形式。與這種生產方法同時并存的還可以遇見（保持到現在）資本主義前期生產方法的殘跡；從另一方面在國家經濟或公社經濟與協作團體的某些形式中業已可能發現新的，更高的生產方法。所以，資本家階級與僱傭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不是現代社會唯一的矛盾；與這兩個階級同時并存在於兩者之間還有許多社會的中間，上層和渣滓的其他階級：一方面就是貴族與宗室，另一方面便是各種的浪人；他們一部分是資本主義前期社會形式的產物，一部分也由於資本主義自身的需要而發生，或最低限度說，由於他們維持自己的發長的形態。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利益和運命始終是在現社會基本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生死決鬥來決定；但同時也，能忽視這些舊時代的遺物在政治和經濟的生活中的作用與影響。這就是我們不允許人們否認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同樣也不允許人們否認中國還存留

有資本主義前期一切的殘餘。不過我們要確定那一種經濟勢力是居於支配的地位罷了。

我們假使深入中國農村中看一看，我們必定可以發現許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陳跡。我們不但可以找到最原始的族長社會，純封建式的地主，並且還可以遇見中世紀的人口買賣，大家族之蓄婢養奴；此種制度不僅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殘跡，並且有由於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以及帝國主義商品掃蕩了農村之後，使農民趨於極端貧困，不但要出賣自己的田宅，家具財產，最後為償完債務或履行宗族祭祀還要出賣子女妻兒。許多地方不但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特權慣例，而今日軍閥制度的存在，苛捐雜稅，拉夫，勒餉更是不可掩蔽的封建遺孽。鄉村中之一切風俗習慣，賽會迎神，械鬥，私刑，以至於雞租，脚米，入事，斛面，包三担等等無疑地都是封建時代的殘餘。僧，尼，道士，巫，覡，神君，地保，鄉長，祭司，廟祝，舉，貢，生員，翰林，進士，隨處可以找到。然而，這些都不過證實歷史進化過程中遺留下來的一些殘餘，而不能在現時中國經濟生活中佔最重要的地位。固然，這些複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殘餘渣滓足以阻礙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但也不過障礙罷了。這種障礙的作用并非積極地征服資本主義生產的意義，而是日暮途窮向不可克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勢力作最後頑強的抗爭。總而言之，起

消極的反抗作用罷了。這種反抗正如城市手工業行會制度之抵制資本主義產業一樣，結果一敗塗地。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社會是發生在封建社會的母胎內，同時資本主義制度又是在封建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因此，我們不怕承認中國有封建和半封建的殘餘存在；但我們承認舊制度的殘餘，並不否認新制度已經發展而且發展到了有支配舊制度所殘留的一切勢力的程度了。

在歷史上具體的事件中，過去的成份（如專制，農奴制度，君主，特權等等）與現在的成份（如，私有財產制，僱傭勞動等等）以及將來的成份（社會主義，財產共有等等）自然不會不有怎樣絕對的分明；都是前前，後後，交互錯綜的。我們要理論切合於實際，便不得不顧慮到歷史的具體事實，並且不得不根據這些事實來證明我們的理論。同時，我們要真正確切地了解歷史的具體事實，便不得不以這些事實作為研究的資料而從事於抽象的理論之研究。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因此，我們不得不最後進而討論一些關於不肖門徒們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和分析中之方法問題；我們就在下面開始罷。

八

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第一步的變節企圖便是拋棄

辯證法；因此，他們一開始便向機械論和形式主義投降！因此他們第一步進行反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便是以數學運動的說明來代了替物理運動的說明。

1, 帝國主義與中國國民經濟和民族工業。

不肖門徒們根本不了解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與中國國民經濟的關係是有機的不可分離的構成部分，於是便發展了機械與孤立的結論。如潘東周則以爲：“帝國主義經濟必然成爲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障礙”。王學文則以爲：“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這種狀態壓迫之下，無論如得不到發展的條件”。如李立三則以爲：“帝國主義要維持中國做他的純粹的商品市場，極力阻礙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

我們上面已曾舉出了許多事實證明中國整個國民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勢力的發展是毫不置疑的了。現在只是指出他們方法的錯誤罷了。

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最後的一階段，也可說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發達展到最完備的系統。在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的發展，所以，資本主義經濟本身便是國際的性質，帝國主義不過把這種生產之最後的擴大範圍罷了。因此，在世界經濟領域內在邏輯上各個國民經濟只是世界經濟一個單位，一個部門，這好像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各單個企業成爲國民經濟的一個單

位，而企業內部的各部門又是該企業的一個單位。但無論如何是有機的構成和存在自然和社會的分工。若把各國民經濟，各企業，各部門隔絕起來不生關係，那末，整個世界經濟再生產便無法進行；換句話說，資本主義世界的商品生產便無法進行。所以，資本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正如各企業，各部門營業的先後隆替一樣。但無論如何都是要擴大商品的生產。在先進國的境內每多是發展重工業，在後進國發展輕工業，這種現象很類似各個國民經濟中某一企業生產生產工具，另一企業生產生存方法的現象一樣。我們不能說，生產機器的部門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和要素；生產日常生活品的部門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他一樣要擴大生產商品和剩餘價值的行程。所以，殖民地雖然偏重於輕工業方面的發展，但仍是資本主義關係的向前發展。

不成器的馬克思主義門徒李立三們，最可笑便是不懂國民經濟的本質是什麼？他們以為中國境內的帝國主義一切工廠，礦山，銀行，鐵道等等都不是屬於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以內，所以不得不將中國的民族工業和國民經濟一概念含混起來。因此，一見某部分民族工業受打擊或發展緩慢，於是便結論說：中國國民經濟不能夠發展，甚至說受帝國主義的束縛不能發展？！他們不了解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帝國主義企業和民族企業就像各分立企業的相互關

係。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排擠民族企業，正如他自己國內各企業間之互相排擠一樣。某些企業有時因資本力量的薄弱被大企業排擠而倒閉，但佔優勢的企業還是發達的，這樣排擠作用并不是證明國民經濟不能發展，反而更趨發展，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排擠中國民族工業，一樣不能證明帝國是完全破壞整個中國國民經濟，而是要想在整個中國國民經濟領域內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破壞別的企業。所以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中，帝國主義資本和民族資本好像在世界經濟一個部門內合股經營；不過資本家內部不一致，大資本家想吞併整個企業傾軋小資本家一樣，資本家的傾軋固然可以影響於營業方面，但主要的目的還是要這個部門營業可以發達，要使小股東受大股東支配罷了。實際上，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他們也沒有自由意志能夠限制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中國資本主義成分經濟的發展是受資本主義發展客觀法則支配的。資本家時常要多取利潤改良技術，結果技術提高不變資本增加，可變資本減少利潤下降，最後違反他的目的。只有從機械唯物論轉到唯心論的墮落的不肖門徒，才會結論說：帝國主義“只許”中國怎樣，“不許”中國那樣，等等鬼話；他們完全走到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營壘中去了。

2. 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

不肖門徒們最反動的理論便是武斷地斷定帝國主義在中國維持封建勢力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能發展，甚至說最近中國封建勢力完全復活起來。王學文很大膽地說：“這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內的交互作用進行不已，遂使中國經濟因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常處於二大壓力之下，日益被其壓迫與破壞。”這裏不但說帝國主義維持封建勢力，不但中國境內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能發展，而且整個國民經濟還要日趨於破壞！這樣看來，好像帝國主義在中國完全代表封建社會的利益的！？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資本主義勢力，他對於封建的經濟制度完全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固然，在一個社會內部因經濟層次的複雜，在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方而強大的資本主義勢力重大發展，有力的破壞了封建制度；同時在某些落後區域還有新生的微弱封建勢力。但是這裏重要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之中，封建勢力只是起了消極的抵抗作用，而日趨於衰落，並不是取積極作用日漸擴大。比如說在中國農村中貨幣經濟的急激發展，固然一方面也可以使鄉村中繼續發生人口買賣，奴婢童養媳，姬妾等等，甚至一般先進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常常因促農民加重高利貸的剝削。但是，在整個方面看來，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是發展資本主義呢？還是維持資本主義

以前的一切封建和半封建的勢力呢？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常常保持舊時代的一切殘存制度來保持資本主義自身的利益，但我們決不能說資本主義因此反要去維持封建勢力使自身不能發展。歷史上的事實可以數見不鮮，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利用一切破產貴族來推翻舊制度，即在現時進步的資產階級國家如英國，意大利，日本尚利用皇帝的統治形式來代表資本主義的利益。我們固然要承認皇帝制度的存在是封建時代的遺物，但我們不能說，英國，日本，意大利的資產階級的要維持封建勢力，所以，英國，日本，意大利，受此資產階級所維持的封建遺制的阻礙，資本主義便不能發展。最明顯宗教制度是十足的中世紀封建制度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當資產階級向宗教作激烈的鬥爭之後，便感覺到利用宗教對於他們是很有利的，於是便允許信教自由，扶植基督教勢力的發展，我們能夠說，資產階級是保衛封建勢力嗎？主要的這時宗教的形式雖仍舊存在，而內容業已改變，牠不是代表封建社會的利益而是代表資本主義社會的利益了。

中國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軍閥制度，不但帝國主義盡量想利用去統治中國擴充自己經濟的勢力即資本主義的勢力，而中國資產階級不管是獨立的，買辦的，半買辦的也都想利用軍閥來擴張自己的經濟利益，然而，結果，不管帝

國主義佔取全部統治也好，中國資產階級在刻苦可憐的掙扎中僥倖發展也好，總是使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勢力擴大，封建和半封建的基礎崩潰愈速，軍閥愈失去封建制度的根據而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利益，爲他們所充分的役使；實際上，中國今日軍閥制度已經失去經濟基礎，所以，不依賴帝國主義，便依賴於買辦工商業者和鄉村的新式地主。機械論的觀點，往往只是直覺的，他們看到了樹木便不見森林，一見了森林，便頭暈腦亂他把構成森林的樹木忘記了。

事實上又怎樣呢？中國自辛亥以來，沒有一個軍閥不勾結帝國主義，然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地向前發展，不但帝國主義的工業發展，即民族資產階級的工業也是發展。日本在東三省維持可說最得力，然而，東三省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更是擊破了不肖門徒冥頑不靈的腦袋！但他們無言可說之後，又用他們機械論最重要的法寶——形式邏輯中的“例外”作救星，說“這是他的特殊原因”！（李立三）

所以，這種思想不但是馬克思主義之淺薄而庸俗化的曲解，而且簡直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他們不但不把資產階級的統治看做中國目前主要的力量，并且根本否認了有資產階級統治的存在，一切罪惡歸到封建身上，替資產階級掩飾迴護。這正是近來陳公博譚平山鄧演達一班人所

努力的工作，然而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最得力的還是我們“理論中心”的李立三先生！他公開同中國工人階級說：“總之無論是誰，除掉他是佔領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局部江浙以外，他都必然要把主要的基礎放在封建剝削方式——封建生產方法上；因爲在生產落後，農村經濟佔優勢的地方，決不能從海外找資產階級的基礎，從天上掉下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權來的”。他在別處還舉許多事實證明南京都要恢復到封建秩序去。這很顯然地說，除江浙以外中國是沒有資產階級的，並且資產階級要去海外去找，他們現在沒有政權，因爲還要等着天上掉下來！這樣將得出什麼結論呢？中國廣大的區域內不但資產階級沒有政權而且還沒有資產階級本身！？即使有了資階級的存在大概他們還要一度進行奪取封建政權的鬥爭！假使，這種鬥爭發生時候我們不曉得這位李先生站在那一邊？！我們這裏要再說一下，我們說資產階級統治，並不是說不要與封建和半封建的一切殘餘鬥爭！我們把李先生這段最標本的欺騙工人階級的謊言介紹一下，想覺悟的讀者一定會理解他的反動性到若何程度！

3. 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封建經濟，資本主義經濟。

新思潮們把商業資本在封建經濟中“獨立”和“優勢”的發展與商業資本不獨立的在資本經濟中的發展完全混亂起來；所以到處發生矛盾的論調。如潘東周一方面說：若有人

以爲長期的商業資本主義發展，便可以剝弱封建的關係，這便完全是反科學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另一方面又說：“……商業資本主義，一方面固然破壞了粹純的封建制度……”他們根本把破壞純粹的封建制度的“破壞”還不算得“剝弱”是什麼呢？另一方面他們把中國的商業資本已經不是從前那樣全部都是“獨立”和“優勢”發展時候的與生產分離的商業資本一樣看待。中國現在有許多商業資本都是帶着買辦的性質，而不是專門從事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高額利潤，而是一方面的城市大商店爲帝國主義或民族工業部門銷售商品，這種商業利潤只是從工業部中分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取買辦形式專門爲帝國主義即直接屬於外國資本家的買辦或本國工業資本家代買由生產部門中抽取一部分資本向農村購買原料；這些都是直接或間接隸屬於生產部門的商業資本，這種商業資本自身業已失去自身的“獨立”和“優勢”了。還有許多省份中有這樣的商業資本，如各大商店的商業仲介人與經紀人等等，對於家庭手工業的生產，逐漸形成很大的作用，如供給家庭手工業者以原料，并爲之銷售整批的製造品。此外還有仲介人或經紀人先向家庭手工業者定貨，然後再向他們領取製造品，而付以一定的包工工錢。這正如列寧所說：“家庭手工業者實際上已等於僱傭工

人，在自己家裏爲資本家做工，這種仲介人的商業資本，已變成工業資本了”。(全集第三卷)另外，還有許多商業家把資本投資於土地生產上面去的。實際上現在中國還是上列這幾種商業資本很普遍的發展。這些商業資本的作用完全與商業支配工業時代的商業資本的作用不同的。至於高利貸資本在中國農村的發達，並不是因爲封建制度基礎強固的結果，反而是因爲農村中侵入資本主義的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的發展使農民對於貨幣的需要增加，因此更加劇農村高利貸資本的發展。然而無論如何獨立和優勢發展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是封建經濟發展的產物，終於破壞封建經濟的基礎，促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兩者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和必要的前提。所以，在中國今日的高利貸和商業資本的發達并不能機械的證明封建經濟的強盛與發展。

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一書內闡明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關係說道：

“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發展得愈有力，那末工業資本的發展便愈見其薄弱（此外所謂工業資本是指資本主義的生產）。反之，前者愈薄弱，則後者愈見其強固了。

“因此我們俄國情形就得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俄國

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同工業資本之間是否相聯繫？在打破了舊生產方法之後，我們的商業和高利貸者是否能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來代替那舊的，抑還是用別種生產方法來接替？

“這些都是事實問題……照一般民粹派人們的見解，以為富農和小康農民所表現的并不是同一經濟現象的兩種形式，而是毫無相互關係且互相衝突的兩種經濟現象的形式。這種見解是毫無根據的……事實的論據所說却是相反。農民是否為着擴大生產而僱傭工人，農民是否在那裏買賣土地（按列寧的意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便是有真正的自由土地私有權；“這私有權乃自由投放資本於土地之障礙物”。如果保持這種土地私有權，“那麼資本不得不用繞道的形式——如農民與地主的土地典押，高利貸之役使農民，出租土地給有資本的人去耕種等等形式——以侵入農村”。因此，土地的典押與高利貸可以說都是免除土地私有對資本自由侵入農村所給與的各種障礙”。——作者）……或雜類商品，他們是否在那裏用細麻，乾草，家畜等等做買賣，或是用貨幣來使交易（高利貸者就屬此例）。再則，在俄國一般的鄉村資本的作用并不是僅僅在奴役和高利貸上表現完盡了的；這種資本同時也是為生產而流轉，我

們看見富有的農民他們不僅是投到商業上的建設和企業上去……而且還把牠投入改良經濟，購買及租借土地，整頓家財，以及僱傭勞動等等的途上去。假使我們農村中的資本，除造成奴役和高利貸之外，便創造不出什麼東西的話，那末，就關於現有生產條件而言，我們不能確切斷定農民的分化，和農村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形成——那末，全體農民就都只是代表被貧困所窘迫着的一種農戶的形式，在這些農民中，祇分出一部分高利貸者，而他們之所以特出，只是由於他們貨幣財產之多，而不是由於農業生產範圍和設備來的。總上所述，就發見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在我們的農村中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之獨立的發展，是“阻礙”農民的分化的，商業資本的發達就是使鄉村與城市接近，排除了原始的市場，破壞了鄉村店主的壟斷局面愈是向前進行；而歐洲式的正確信托制度若愈發達，擠倒了鄉村的高利貸者，則農民的分化將愈迅速而深刻的發展。從小商業和高利貸所括剝來的那些富農的資本，就轉向到範圍更擴大的生產事業上去，這種過程現在已經開始進行了”。（列寧全集第三卷第二章第八節）

很顯然地中國農村中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與地主富農和城市工業家都是處於交相錯綜的關係，也就是或多

或少的與生產事業有密切的關係，其“獨立”發展的成分比較薄弱。所以，在中國農村中不但商業和高利貸資本沒有阻止中國農民的分化，而且因為商業和高利貸的發展農民的分化非常劇烈。農民中不但有僱傭工人，自由買賣田地，雜類商品，細麻，乾草，家畜，等等，並且還買賣到必要的糧食如米，麥，穀物等等。農民之普遍的用貨幣做交易那更不必說了。

機械論者只知道商業和高利貸的發達，馬上便得到結論以為封建經濟佔優勢，他們忘記了馬克思所說的“獨立”發展。他們不懂得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商業和高利貸的發展在某種條件之下比封建時代還要利害的。他們不懂得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之過渡性。以為不是資本主義便是封建！

4. 生產關係，剝削關係，技術。

機械論者更沒有深切了解生產關係與分配關係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時也把技術的作用一概用機械的觀點來了解。他們不了解中國農村中土地所有權本身就是生產關係之一種（馬克思說，生產關係用法學上的術語來說就是財產關係。），牠是決定生產關係中的分配關係。剝削關係本身就是分配關係之一種，牠自不得受資本主義制度的私有財產關係所決定。沒有資本家佔有生產機關，沒有空無所有的自由勞動自然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式的剝削僱傭勞動，和建

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上的交換關係。不肖門徒在承認中國農村土地佔有關係大部分是資本主義形式的佔有，同時又用技術來解釋不會發生新的生產關係。他們根本不了解鄉村生產關係可以受城市生產關係發展的影響而有所變動，後進國的生產關係可以受先進國生產關係的影響而有變動，這都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尤其今日世界資本主義已發展最高度——彼此經濟生活都締結了有機而不可分離的聯繫。固然，在整個世界直到現在假使都還沒有進步的技術，那便表現現社會物質生產力所發展的階段還是處於很低級，自然不會發生更高的新的生產關係，而且現在中國的農村與城市還是在互相隔絕的時代，鄉村中沒有更高的技術，自然也表示着生產力的衰弱沒有更高的生產關係。然而，已經密切聯繫了，那末，農村的生產關係不會受城市的影響嗎？實際上，問題並沒有這樣簡單，“沒有新式技術就不會發生新的生產關係”。馬克思怎樣的判別經濟的各時代的社會關係和剝削關係和技術的作用呢？他說：

“區別經濟的各時代不在於生產，而在於由什麼勞働的工具，怎樣去生產。勞動工具不僅是人類勞働力發展的尺度，並且也是在那社會關係中間完成勞働的指示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

他在別處又說：

“骨骼構造的遺骸，對於研究滅跡的動物的組織有重大的意義；勞動工具的遺型，對於研究社會經濟的組織，有同樣重大的意義”。（資本論，第一卷，第十章）。

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說只有一種新的技術，便可發生新的生產關係。而是說，有新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纔會發生新的生產關係，自然，物質生產力不像新思潮派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似乎只等於技術一樣，實際上，牠包括技術和人類勞動自身。馬克思的基本觀念：技術是測量社會經濟制度最好的標誌，並不是說只靠一種技術纔發展新的生產關係。馬克思還說：“機器若不供諸勞動行程，那便是無用的”。（全上）

當然，進步的技術對新的生產關係的發生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經濟的各時代的區別到怎樣去生產。並且還要注意到外來的關係對於這個經濟領域的影響。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複雜的，不像新思潮派的眼睛那樣直，頭腦那樣簡單。

中國土地佔有關係完全受城市和帝國主義商品衝入的影響。這種土地之資本主義佔有關係上面，自然，更易容促使在土地上的剝削關係漸次發生變化。列甯說：“農民愈是脫離土地的狹小狀況，愈是掃清地主壓迫，愈是脫去中世紀社會關係和土地關係，愈是脫去奴役的淫威，那末，農民經濟內部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也愈利害”。（圈點是我加的——

作者)”(全集第三卷)我們自然不能也和機械論者一樣，以爲土地佔有關係是資本主義的形式，就信在這土地上的剝削關係也馬上就是十足的資本主義形式。但我們總可相信，土地佔有關係應是決定在土地剝削關係之一個重要的因素。

最可笑的就是他們抱定以中國農村的剝削形式來作說明農村經濟封建本質之唯一論據。特別是以數量來決定一切問題。他們認爲封建剝削關係主要的論據：“地主向農民徵收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依靠着土地所有權來剝削農民”，“地主完全不參加生產”，“自然品地租”等等。其實這都不是主要的方法。我們以爲地主自然要“依靠着土地所有權來剝削農民”的，這正如資本家要依靠資本權來剝削工人一樣。因爲土地是農業經濟中的主要生產工具之一，同時在中國的土地佔有關係上又是他用一副貨幣購買來的商品，他不靠這個剝削農民還靠着什麼！至於“地主完全不參加生產”這更不足奇怪，資本家向來是不參加生產的，地主假使要參加生產，他便失去其純粹剝削者的資格！至於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地租”，這並不證明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要比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爲重。資本家所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通常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比如說，工人每天六小時的工作便可維持他自己個人和家庭的生活，但資本家常是要工

人做十二小時以上的工，在現社會技術進步，生產合理化的結果，恐怕工人被資本家所剝削的還不只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罷！他們根本不瞭解封建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形式上根本的不同不在於剝削數量之多少，而在於公開的強制性之如何。封建領主雖然公開地強迫農奴的貢稅，但當天災水旱還幫助農民。資本主義的剝削是在形式上平等和名義上自由之下悲慘的剝削工人。列寧不但說過自然品地租是封建制度剝削的形式，並且還說，有時貨幣地租不過是自然品地租的變相。但這是就形式上說明地租的本質，並不是“教條”式的教導我們自然品地租一定是封建剝削的實質。正如他所說，貨幣地租不一定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一樣，我們知道，社會下有許多東西還是保留着舊的形式而帶着新內容，有的蒙着新形式而具着舊的內容的假面，貨幣地租只是代替貢稅以義務式的去交納地主，這仍然大失其封建性質。假使自然品地租代替了剩餘價值或資本利息的形式去交納地主，這已經具着資本主義的性質。中國農村這種關係是非常錯綜的，形式主義只是把農村中的剝削關係都歸納到封建上面去。此外，在西歐也有不少的事實，如當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威尼斯和法羅斯商人也有利用奴隸勞動的（從近東運來的奴隸），但這種剝削的實質，無論如何不是封建式的而是資本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常因技術提高造

成大批失業之後，這些被擯斥的失業者往往爲自己生活所迫，反跑到落後家內工作爲最後逃遁藪，然而，在這種落後技術的家內工作上，完全帶着另一性質。過去婦女和姑娘的家內工作，純爲滿足自己家庭的需要，此地是爲着資本而逐日工作的；因爲在家裏很慘酷的受着資本家剝削的。難道這裏也可說沒有新的技術不能發生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嗎？形式主義者只看到形式，因此，他們只懂得工人兒子要做工人，雇農的兒子要做雇農；却不懂得，他們之所以做工人做雇農，被人剝削，乃是因爲資本主義制度的財產關係存在着。因爲資產階級佔有一切生產手段，他們除出賣勞動力以外便再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出賣，可以維持自己生存；也就是說，不受這種剝削便不能生存。

由於他們專以剝削形式來做基本的說明中國經濟制度，於是他們便不得不專去剝削關係上去革命。所以，反映到他們一切的策略都是爲減輕剝削程度而鬥爭。簡單的例子就是：不沒收富農土地，不沒收資本家財產。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所認的封建剝削太利害了，資產階級只要他們實現八小時的工作制便夠了，因爲八小時制的剝削沒有地租百分之五十至七十那樣利害，所以是允許的！他們不懂得地租本身就是全社會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全社會的剩餘價值是在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的基礎之上發生的！

5, 經濟生活中的“領導”作用。

不肖門徒們之錯誤蟬聯不絕的發生就因為沒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之故。他們不但不了解經濟生活中的“領導”作用而且把“領導”作用與“支配”作用分開。世上那裏有“領導”不“支配”，或“支配”不“領導”的事實嗎？我們可否說蘇聯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而受其牠階級“支配”；能否說在資本主義國家議會權力是受資產階級“支配”而為別階級所“領導”的嗎？新思潮派一貫的認定封建經濟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生活“支配”的地位，他們同時又承認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他們沒有辦法解決這個矛盾，於是不得不乞援於詭辯術以圖自圓其說，於是潘東周便藉這方法術大出風頭說：“什麼叫城市經濟領導着農村經濟呢？要是農村經濟的發展，他將要隨着城市經濟發展的方向而前進。城市既是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則農村經濟一定也是走向資本主義，但這是就他發展的方向說，絕不是就他本身的性質說”。（圈子是我加的——作者）這種解釋自然有潘東周自己的苦衷，我們是不知道的，但是欲蓋彌彰，醜態終是百出的！我們這裏先發一個問題：在原始純粹封建經濟沒有資本主義城市的時候的社會經濟受着什麼經濟“領導”呢？這種經濟是否也是走向資本主義發展，或走向其牠經濟制度發展呢？最初的資本主義城市受什麼經濟“領導”來的呢？

“方向”的先生們！請指示，指示我們了解這段大著意義的“方向”罷！

最大胆不過的便是否認“領導”和“支配”之“質量”的作用，而代以“數量”多寡來說明！

這樣毫無經濟內容的見解，我們最好請馬克思自己來答覆好了，馬氏說：

“每個社會形態，都有優越於其他生產部門之一定的生產部門；因此，那種部門的條件便決定其他部門的地位和作用。

“一切其他顏色都沈溺在這普遍的光芒裏，并依那普遍的光芒而改變它的特殊性。這是特種的以太（ether），牠決定表現於以太中的一切存在之特別比重。

“我們且舉游牧的民族為例，（特別從事於漁獵的民族，處於實際發展起點的境界）。在他們這裏可遇見着一定形態的農業，土地所有權零散地就由這些農業形態所決定的。這土地所有權就是集體的，并且這種形態保持到多少程度，要看這些民族所固守的自己傳說到多少程度為漸，例如斯拉夫人的土地所有權，在有定居的農業之民族——這種定居已是個大進步——那裏農業是優勢的產業，如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裏，產業自身，牠的組織，以及與牠相適應的所有權的形態，多

少都帶有現行土地所有權的特性；社會或可說完全賴於農業的社會，如在古羅馬或如中世紀城市的組織中都是模仿樹立於農業中的關係。資本，牠還算不上純粹貨幣的，即在中世紀，處於手工藝(?)等等傳統工的形式中，這都具有土地所有權的特性。

“反之，在資產階級的社會內，農業僅漸次成爲業的一部門，并且完全爲資本所支配。地租也是這樣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凡土地所有權處優越作用的地方自然關係便居支配的地位。在資本處優越地位的社形態中，支配的作用便轉於社會的和歷史上所創造要素。沒有資本不能夠了解地租，但是，沒有地租却全能夠了解資本。資本便是統治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經濟勢力。牠應當造成起點與終點，并且牠的概念比在土地所有權的概念之先發展的”。……（馬克思經濟學批評導言）

馬克思怎樣注意土地所有權和資本的性質，而我們先生偏說“絕不是就牠本身的性質說”。馬克思怎樣地指封建時代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支配”（領導）經濟性質之同，在從前城市跟着鄉村後面模仿鄉村農業關係，在近代地生產成爲城市工業生產一個部門。我無須此地廣事發了，最好要大家自己去吟味馬克思的整個意見好了。不過

們一定要說一句話爲馬克思辯冤，就是向讀者諸君公開宣佈：“潘東周的意見不是馬克思主義乃是潘東周主義”！

在中國農業經濟中很顯然地一切經濟生活都是爲資本主義公律所支配，如在鄉村中所發生的資本主義最重要而普遍的現象：商品生產，無政府狀態，定期的農業危機，農業人口中的階級分化，最基本的事實，農業經濟中假使沒有貨幣，嚴格的說假使沒有與城市交換不能進行農業經濟的再生產的，這難道不是城市“領導”鄉村的“性質”的關係嗎？難道今日中國農村可以一天不和城市發生關係而可以走到他所要發展的“方向”去嗎？這樣的發展決然是沒有的，有的只是從馬克思主義隊伍內發展了不肖門徒！

6. 矛盾，發展，革命。

用孤立，不動，直覺的觀點去考察事物就是機械論的特色，因此，他們看見到了矛盾便忘記了發展，看見了發展便忘記了革命，看見了革命就忘記了矛盾。例子是很多，現在簡單的舉一些來說罷：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矛盾也，由李立三們看來，這矛盾沒有解決之前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然而，資本主義永遠是在與封建勢力不斷的矛盾之中發展出來矣；結果阿三忘記了發展！關門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也，由史達林看來一個國家單獨可以和平發展不須世界革命很快到來社會主義建設可以勝利的，技術書記先生忘了

馬克思的不斷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也，由布哈林看來“四個階級聯盟”可以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攜手并進合作到底完成民族革命，最後矛盾爆發，統一戰線分裂，革命失敗，千百萬工農犧牲，書獃子忘託了矛盾！

不肖門徒觀點的“孤立”在那裏表現出來？就是沒有看到中國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發展與世界經濟——或可說與帝國主義有密切的聯繫，農村經濟的發展與城市也是有密切的聯繫。他們只看中國農村比城市落後中國比外國落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抵不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於是便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他們根本就否認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的界說，只能縮短資本主義的局面，但不能跳過這個局面的真理！他們跑到俄國民粹派方面去了。他們只懂得資本主義制度與封建關係矛盾，又忘記了資產階級已取得了政權。不信任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由於馬克思所指出的一般社會發展的公律所支配，反而去拿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和“五四”時期的抵制日貨來說明中國工業的發展，他們不知道沒有大戰以前中國工業也是開始發展的，他們不懂得抵制日貨運動恰恰由於民族工業發展的結果，並不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以先抵製日貨後纔去發展工業。固然，世界大戰和抵制日貨對於民族工業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如果以這些事實，來作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根

本上之原則的說明，必然得到的結論就是：世界不大戰，中國不抵制外貨，資本主義便不能發展！？事實上却沒有這樣簡單，沒有世界大戰時和沒有抵制日貨的過去中國經濟是否發展呢？進一步說，世界大戰也許可以把中國拿去做戰場使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破壞，抵制外國也可以使外國進步機器不能進口的。解釋問題說明歷史不求之馬克思主義初步真理，而採取庸俗主義的皮毛論據，最後，發展了不肖門徒！

“不動”的觀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不了解一切事物依賴於時間和空間的條件。一則曰，“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要根據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上”；再則曰，“農村中沒有一種新的生產技術，沒有形成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因之也就沒有造成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喂！中國農村經濟中沒有新的生產技術——嚴格地應說只有少數新的生產技術——而堂乎皇哉而絕對真確的XX黨六次大會的決議便大書特書：“土地所有關係是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蘇聯並沒有比英美，德國更高明的技術，何以會有無產階級專政，何以有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何以有新的生產關係，而英，美，德，還沒有一個最主要的生產關係，無產階級領導全社會去生產呢？

機械論者蒙着中國文化落後的恩賜，得施行其對廣大多數革命青年腦髓中深注入“客觀任務論”的毒劑。到處廣

事宣傳“革命性質”由於“客觀任務”來決定，他們的觀點就是如果革命的客觀任務沒有完成，那末，革命的性質就不能改變，也就是革命性質“不動”！他們不了解革命的“完結”與“完成”，他們不了解革命的性質由於社會的階級相互關係來決定，因此，只相信不動的客觀而不信任能動的主觀，於是便從機械論的不肖門徒發展到宿命論的不肖門徒了。

他們忘記了土地革命(土地國有)乃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最基本的任務之一，然而資產階級，有的因為害怕向私有土地進攻，恐會破壞一切私有財產權；有的因為自己已經領有土地，所以，永遠不能履行這個歷史的任務！列甯說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并不曾指示我們純粹的土地國有”。我們難道可以說，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法、德等國，資產階級沒有把土地國有的所謂“客觀任務”還沒有完成，那末，未來的革命還不能“超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範圍”，還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嗎？！當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是二月革命之後十月革命的前夜，列甯在著名的四月提綱中寫道：

“1，舊時的俄皇政權，祇代表很少數的大地主，他那發號施令的整個兒的國家機關(軍隊，警察，官僚)，已經崩潰取消，但還沒有打死。帝制制度在形式上還沒有消滅……極大的農奴制度式的大地主制度還沒有取消。

“俄國的國家政權已經落到了一個新的階級手裏，就是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手裏，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俄國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已經終結”。

這裏很明白地指出，革命性質的轉變由於社會階級相互關係的轉變來決定，而不是由於“客觀任務”完成來決定；因為此時“極大的農奴制度式的大地主還沒有取消”。就是說，所謂客觀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所以，列甯特別以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為斷定當時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已告“終結”。“終結”之後繼之不斷的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十月革命。

列甯以後根據自己十月革命的經驗在革命四週年紀念的講演中還說；

“無論任何國家中當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已經終結之後，始終不能完成其任務，而我們於幾星期之內，便把這些問題解決了……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相互關係，前一個革命可轉變到第二個革命，第二個革命附帶解決第一個革命的諸問題。第二個革命以堅固第一個革命的事業”。

這裏不僅指出任何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不能完成其任務，並指出只有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纔能夠把這種任務“完成”！不動的“客觀任務論”乃目前中國革命最有毒質的革命

送命湯：不僅以農民的落後思想來欺騙工人階級，實際上，就是預先替未來革命發展中的羣衆開了一條到墳墓去的死路！

現在再來說說他們直覺的觀點罷，這也不過是機械論一個特質罷了。具着這種觀點的不肖門徒觀察事物，只是偏面的：看見了正面便忘記了反面；看見了反面便忘記了正面。只是直線的：看見了凸處便忘記凹處，看見了凹處便忘記了凸處。所以，他們對於整個資本世界穩定的估量，便只看到資本主義世界在戰後經濟的發展，而不看到整個世界階級力量的對比。當他們做出結論時便說：資本主義雖然是暫時——自然界和社會內部一切都是暫時的——穩定，但是資本世界整個的矛盾是不斷的緊張，資本主義世界愈趨於崩潰！這裏他們只見到“矛盾”不斷的緊張，資本主義愈趨於崩潰的凸處，而恰恰忘記這個“暫時”穩定的凹處。他們這種論調完全是形式主義空洞無用的公式！人們必然地一天天與死的日子漸近，我不能以為知道人們之必死和一天天漸近於死自相誇大；因為在漸近於死的整個歷程中還有辯證的曲折，有因病發生很大的危險，身體突然弱衰；有時恰因病後身體反而復元超過病前的發育的更加長大，然而，無論如何他最後要死亡的，但是，我們能否因為他必死，時刻把他收臉在棺材裏邊去呢！他們在反面只懂得封建勢力是阻

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却忘記了正面資本主義發展有自己的法則不怕封建勢力。他們只懂得反面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封建經濟的產物，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們不了解另一面商業和高利貸資本削弱封建經濟基礎，使舊生產方法起解體作用和作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必要的條件與出發點！在中國問題上，也是這樣，他們始終以中國革命失敗是“暫時”的為理由便不斷的高喊所謂“高潮”到來；自然，假使革命的失敗不是“暫時”，而是“永遠”的，那末，我們便何必再談革命呢？坐在家裏等着死亡，不是死也要得着安閒，何須為無結果奔忙呢？正因為是“暫時”的，所以要注意到在“暫時”失敗中應當怎樣做，怎樣使以後的高潮快些到來，怎樣使革命更徹底的勝利。他們口頭上承認革命是失敗，但在“暫時”的學究字義推敲之下便成為“馬上到來”；實際上，就是沒有承認革命的隊伍被敵人打得粉碎。於是，便如法泡製背誦公式，統治階級雖然“暫時”壓服革命，但內部矛盾日趨緊張，日趨崩潰；（自然不日趨崩潰，矛盾不日趨緊張，革命失敗便是“永遠”的了）。於是，經濟罷工也是革命高潮，兵變也是革命高潮；工廠倒閉也是革命高潮；統治階級分贓混戰也是革命高潮，這時便忘記一個主觀的客觀之革命羣衆組織和自覺，只憑金錢來開張各級黨部，在鄉村中招兵買馬，自僱羣衆上街示威以進行其“盲動政策”

和“軍事投機”！

他們根本就不懂得革命危機和一般經濟危機。革命危機是處於舊社會將要崩潰，新社會將要誕生的緊急關頭，最主要的表現為社會各階級——尤其是該社會代表主要經濟力和生產力的階級——爭取政治政權的鬥爭，而定期的經濟恐慌，如資本主義社會十年一次的危機，或因自然條件的影響，如天災，水旱等等，乃社會經濟力尚有充分發展時期所習見，並且資本主義每次經過每次危機之後，生產力常是向着新的更擴大的基礎上發展。他們完全不了解每種定期危機乃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必經的法則。固然，當着經濟危機，當着統治階級內訌的時會，常是適逢真正革命的局面，並且這種局面最有利於革命階級為奪取政權的改變社會制度的鬥爭；但是，並非每次經濟危機，每次內戰爆發都是革命的局面。機械主義者的不肖門徒即因為不了解這個，於是便造成了瘋狂的盲動主義，驅策革命戰士向着無出路的境地走，而供無結果的犧牲。這就是他們沒有整個解了矛盾，發展之辯證的革命過程！

馬克思主義遭遇之不幸在中國亦和世界上其他各國一樣；受人塗抹，改竄，曲解，庸俗化……是更僕難數的。然而，我們的任務不但在於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情願“讓給耗子們去囓嚼批評”的許多著作中去找尋化石的真理，同時還要

壓忍不拔地和馬克思主義不肖門徒作不可調和的思想鬥爭！

辯證唯物論的宇宙觀與 近代自然科學之發展

昂格斯著 畏之譯

現代自然科學算是得了各方面的有系統的科學的發展；現代自然科學可以和古代的天才的自然哲學的謎分庭抗禮，也可以和十分重要的蹊徑自關的而大部份是無結果的亞拉伯人的發現分庭抗禮，現代自然科學同新時代的歷史一樣佔了一個著名的時代，這個時代我們德國人稱之爲宗教改革，（這真是我們沒有法子擺脫的民族的不幸，）法國人稱之爲文藝復興，而意大利人則稱之爲五百年（Cinquecento）其實這三個名稱沒有一個能完全包括他的內容。這個時代是從十五世紀中葉開始的，國王的政治依靠在市民身上擊碎了封建貴族，建立大規模的，實際上即是民族的君主

國；現代歐洲的民族，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在這種基礎上得到了發展。在這個時候貴族及資產階級相互間的鬥爭還不充分酷烈，而德國的農民戰爭又預言地指出了未來的階級撕殺，因為在農民戰爭中，不僅有暴動的農民登場——這並不新奇——而且在農民後面還有現代無產階級的第一次露面，手裏打着紅旗，口裏喊着財產公有的要求。在比山庭滅亡時所救出的手抄本，在羅馬底廢墟裏所掘出的古代雕像，在驚異的西方之面前開了一個新世界——希臘的古代。在現世的影像之前消逝了中世紀的幽靈。在意大利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藝術之光華；這底確是古典的古代之反照，而且以後的發展也未能再達此種高度。在意大利，在法國，在德國都出現了新的破題兒的現代文學。英國與西班牙也很快地走到了他們的古典文學時代。大地底舊界限被打破了；只到了此時才發現了地球，才立了近代世界商業的基礎，才立了從手工業到手工廠制度轉變的基礎，而手工廠制實在是現代大工業的發軔。教會底精神獨裁被打破了；日耳曼民族的大部份接受了新教教義，而在羅馬民族中，擺脫了亞拉伯人而浸潤於新發現的希臘哲學中的樂天的自由思想漸漸根深蒂固，準備了十八世紀的唯物論。

這是個歷來人類社會中所發生的最大的進步的變革，這時需要偉大人物，同時他產生了偉大人物，這些人物在思

想之能力上，在熱情上，在性格上，在淵博上，在多學上都算是偉大的。造成現代資產階級的統治的無論如何都不是那些資產階級蠢才。反之，都是些當代的冒險的腳色。那時差不多沒有一個大人物不作過很長途的遊歷，不通四五國的語言，不弄過幾種創作。里昂那德·達文齊（Leonard da Vinci）不僅是偉大的藝術家，而且是個偉大的數學家，機械學家，工程師。他在物理學的各方面都有很重要的發現；亞爾卜列希特·杜烈爾（Albrecht Dürer）是個藝術家，木刻家，雕刻家，建築家，此外他還發明了築城學的系統，其中所包含的理想在很久之後孟達崙拜爾及德國其他最新築城學者才加以發揮。馬奇威里（Macchiaveli）是個政治家，歷史家，詩人，此外他還是第一個值得紀念的新時代的軍事作家。路德不但掃除了教會的積穢，他也打掃了德國語言中的積穢，他創立了現代的德國散文，他製作了許多歌曲，其中充滿勝利的感覺，成了十六世紀的馬賽曲。那時的人還沒有作分工的奴隸，他們的子孫却作了這種奴隸，而常常有低能的小氣的行動。但是他們有個特點，就是，他們差不多全都生活於當代底一切興趣中，參加一切實際鬥爭，他們總要不加入這個黨便加入那個黨，有人用舌頭，有人用筆，有人用劍，有人用這或用那，但總是鬥爭的。因此才有了他們品性之飽滿與有力，所以才從他們中間造成許多完人。書齋裏面的學者在那

時只算是例外；這大概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或是一些老好好的鄉愿，不願意野火燒了自己手指頭。

自然科學在當時普遍革命的環境中發展了，他自身便是個澈骨革命的，因為他在當日還要爲着自己的生存權而鬥爭。許多偉大的意大利人開闢了新哲學，他同這些意人一道兒送了許多殉道者給異端裁判所的火堆及囚室。很特別地，是新教徒也跟在天主教徒之後來搜捕自由的自然科學。謝爾維特(Servet)快要發明了血液循環說了，加爾文(Calvin) 燒死了他，在燒時還要活烤兩個鐘頭；而異端裁判所對於勃魯諾(Giordano Bruno)只簡單地燒死便已很稱心快意了。

許多不朽創作之出版實在是一個革命行動，自然科學以此宣佈其獨立性，好像是學步路德焚毀教皇的諭旨一樣。哥白尼用他的書的出版——雖然是在死後——算是把手套擲給了自然事務中教會的權威。從此時起，自然科學算是擺脫了神學，雖然有許多個別問題的說明一直延到現在，在許多人心中還沒有弄清楚。從此時起，科學有了長足的發展，這發展可以說與其從出發點距離（時間上的）之平方成正比例。

在發展的當時的初期自然科學的主要任務是怎樣處置當前現有的材料。在各門中都要從頭來。在古代有歐克里幾

何，有託萊米的太陽系統，亞拉伯人則有十進數法，有代數學，有現代計數法，有煉金術；基督教的中世紀則一無所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佔首要位置自然是自然科學中最要素的各門，如地球與天文之力學，及與他並列而服務於他的數學方法之發明與發現。這裏做成了很多大事。這個時期以牛頓與林乃 (Linne) 爲顯著，在這個時期的末期，這些知識部門中有了很顯著的發現。最重要的數學方法在根本上都已經奠定了：主要的是笛卡兒對解折幾何，尼波爾 (Neper) 之對數表，萊布尼茨及牛頓之對微積分。同時固體力學也大概是如此，一下子把他所有的規律都闡明了。最後在太陽系的天文學中凱卜萊發現了行星運動法，而牛頓却說明了物質運動的一般法則；自然科學之別個部門都還趕不上這些。液體與汽體的力學只有在這時期的最末尾才有了若干的研究。就嚴格意義上說來，這時的物理學才不過是最原始的階段，不過光學却是個例外，光學因天文學中的實際應用而得到進步。化學則因燃燒試驗而脫離了煉金術。地質學在這個時候不過是礦物學底胚胎階段，因此還不能夠有古生物學。最後在生物學方面，主要的是在植物學，動物學及解剖學特別是生理學的廣博的材料加以收集及整理。至於生命形態之比較，地理分佈及氣候及別種條件之研究，還談不到。這裏只有林乃的研究使植物學及動物學有了若干的成績。

然而這個時期亦有個特點，就是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觀，這世界觀底中心是關於絕對不變的自然界之學說。根據這種學說，不論自然是怎樣成立的，只要他是現成存在的，那末，他存在一天，便永遠如此不會改變。行星及衛星，既有一個玄祕的‘第一推動力’把他們引入運動，便照着他們的軌道運轉下去，一直到萬萬年，或是到一切東西都完結的時候。星宿們都永遠牢守着他們固定的位置，因‘萬有吸引力’而互相維持。地球呢，從皇古以來，或是從創造以來（不論是怎樣創造的）便是如此這般的，‘一成不變的。現在的「五大洲」是永遠如此的，山陵，谷，江河，氣候，植物，動物都永遠地維持着原狀，除了人為的變動之外。植物及動物底種別在成立時一經固定便永遠如此不會改變，相同的總產生相同的，林乃有時說，因為雜交也常常可以產生新種，這話已經是很大的讓步。人類歷史是在時間之中發展出來的，而自然歷史剛剛相反，他只成立於空間之中。否認了自然底一切變化，一切發展。原來革命的自然科學這時突然間立在極端保守的自然之前面了，在自然中現在的一切都維持着太初的狀態，而且一直會維持到世界之末日，就是說，他以後的萬萬年都會維持其太初狀態。

十八世紀初葉的自然科學高過了希臘的古代，不論就知識之淵博及材料整理上來講都是如此，但對於這些材料

之觀念上之克服來講，對於總的宇宙觀來講，他却遠遜於希臘。希臘的哲學家以為在實質上世界是從渾沌中產生的，是發展的，是變更的一件東西。而這個時期的自然科學家則以為是固定的，不變的，而且大半是一次造成的東西。科學還深深地埋在神學中。他在各處尋尋覓覓打算找一個最後的原因，自然本身所不能解釋說明的外來的動力。如果吸引力（牛頓很自得地名之曰萬有吸引力）是物性之真實性質，那末造成行星軌道的不可解的離心力的源泉又在那裏？動植物之無數類別何由而起？特別是人類是怎樣產生的？大家都可很堅決的斷定他不是本來存在的。自然科學家對於此種問題之解答往往乞援於萬物之創造者。哥白尼在這個時期之初棄絕了神學，而牛頓却以神的第一推動力之要求結束了這個時期。這個時期自然科學的最高的總的觀念是自然過程底目的性，十足的伏爾佛的目的論（*Wolfsche Teleologie*）據這學說，生貓是為着吃老鼠，而生老鼠是為着要給貓吃，而全部自然為着是證明造物者底智慧。當時的哲學者實有很大的德性及光榮，他們沒有承受當時自然科學底蠢才的觀點的影響，從斯賓諾莎起到偉大的法國唯物論者中都很堅定要在宇宙的本身中來說明宇宙，他以詳細證明的工作交給了未來的自然科學。

我把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也歸入這個時期，因為他們

所支配調遣的自然科學材料也不過是上面所描寫的。康德底劃代的著作是他們所不知道的，而拉卜拉斯(Laplace)離他們更遠。可是，不要忘記了雖然科學的進步完全打翻了這個腐老的宇宙觀，而十九世紀的前半期實在還在他影響之下，其實直到目下各學校所教授的還是這些東西。

打在這個宇宙觀底堅壘上的第一彈不是自然科學家而是哲學家打的。在一七五五年康德的書‘大自然史與天論’(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出版。在這裏取消了第一運動力的問題；地球及整個太陽系是在時間的行程中成立的。牛頓以預先警告來表示其自己的恐怖，他說：物理家，你小心着玄學家啊！如果大部份的自然科學家在自己腦筋中沒有感覺到這種危險，那末他們就應當從康德底天才的發現中尋求一點結果，可以節省他們在邪路上無頭無尾的徬徨，可以節省他們在錯誤的方針上所耗費的巨量的時間與勞力。在康德底發現中包含着一切未來進步底胚胎。如果地球本身是個發生的東西，那末他現有的一切地質的、氣候的、地理的狀況，他的動物及植物也應當是發生的東西，而他自己不但應在空間中而且應在時間中有歷史。如果照着這個方向馬上開始堅決地工作，則現在的自然科學必然比現在有更多的進步。但是哲學那能鬧出什麼門堂？很久很久康德底著作沒有發生什麼直接影響，直

到拉卜拉斯及亥色爾 (Herschel) 發展了充實了他的內容，成造了‘星雲假說’的勝利之後。以後的發現鞏固了他的勝利，最重要的發現是恆星自轉底確定，宇宙大空中有阻力物體之存在底證明，用光線分析確定了宇宙物質之化學共同性，而火質的雲霧大塊之存一如康德所想像。

現在還有個可以懷疑的地方，就是自然是自存自在，自生，自滅，假若沒有別的東西來幫助這種發育着的觀念，則自然科學家是不是會想到兩個學說中的矛盾呢，一個說變動的地球，一個說地球上面的不變的有機體。地質學成立了，他不但要說明現存的，在形成時一個比一個晚，在排列上一個在一個上的地質層，並且要研究各層中所保留的死動物底甲殼及骨頭，及地上不再有的植物之幹，葉，及果實。到這時就不能不承認，不但整個地球，而且地面及其上面的動植物都在時間中有歷史。在一開始這種承認是不容易的。居維 (Cuvier) 關於地球革命的理論，只在口頭上是革命的而在實際上却是反動的。他擯棄了神造說而代之許多類似的創造行動，從神蹟中製造了自然底真實本源。只有雷爾 (Lyell) 才把一種健康的思想引入地質學，他捐棄了突然的，由造物主一時發所興引起的革命，而代之以地球慢慢形成底漸進動作。

雷爾的學說同有機種類不變說比從前的學說更難調

和。地球表面漸次形成及其生活條件漸次形成底學說必然直接地引向有機物體漸次形成的學說，引向對變化的環境之適應說，引向物種可變說。但是傳統思想不但在天主教會中，即在自然科學中亦有力量。雷爾自己在很多年中沒有發覺了這種矛盾，而他的一些學生更差。只有用當時自然科學中底分工來說明這種現象，每人都自限於其專門的知識部門中，沒有人能夠融會貫通顧到全體。

然而物理學中所發生了很大的邁進。在物理學中有名的一八四二年，三個人同時做了一個結論。梅依爾 (Meyer) 在海德爾堡 (Heidelberg)，鳩來 (Joule) 在曼奇斯特證明了熱可以變作機械力，而機械力可變作熱。熱之機械力等量之確定打消了這個問題底一切疑問。同時格羅夫 (Grove) (並不是一個職業的自然科學家，他是個英國律師) 把當時推積的物理材料略加整理與研究之後就證明了一切所謂物理力者——如機械力，熱，光，電，磁，及所謂化學力——在某種條件之下都可互相遞變而無所耗失，這樣子，用物理學的方法也可證明笛卡兒學說之正確，他說宇宙中運動之數量是不變的。因此，各種物理力(即所謂物理學中的不變‘類別’者)都不過是等差的，依某種規律而互變的物質運動之形態。在科學中擺脫了物理諸力各種數量之偶然性，因為已經證明了他們相互的關係及變通。物理學同天文學一樣走

到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動的物質之永遠的周轉成了最後的結論。

拉伏瓦席 (Lavoisier) 特別是道爾頓之後的化學之飛快的發展另外地破壞了舊的對自然的觀念。用無機的方法來造成有機體中的化合物證明化學的定律不但適用於有機體，而且通用於無機體，向來的直到康德之後還有的有機與無機中間之鴻溝算是填平了一部份。

最後，地質學的研究在上世紀(十八世紀——譯者)中葉開始了有系統的，有組織科學的旅行與考察，在全世界的歐洲殖民地上都有那裏特養的專門家來作精確的研究，同時古生物學，解剖學，及生理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顯微鏡之系統的運用及細胞之發明，由此種之積疊了很多材料，使比較研究法之應用成爲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同時因爲有了比較自然地理學所以就確定了各種動植物之生活條件，對於各種有機體的相同器官都有了比較的研究，這不但對成年如此，對於生命發展之各段都是如此，此種研究越是深刻越是精確，固定的有機自然界的傳統形式越是難於維持。不但很絕望地消滅了有機無機之差別，而且發現了一種動物如 *Amphioxes* 及 *Lepidosiren* 兩物實在是超出了過去的一切舊的種類，他們是一種有機體但是不歸入而且不能歸入動物或植物。古生物學紀年中的空白多多少少填補

了一些，因此使最頑固的學者都要承認有機世界全體的發展史及每個有機物的發展史之間存在一種可驚的平行發展，這是一條阿利亞特尼（Ariadne）的線可以引出那動物學及植物學多年迷失的迷宮。很特別地是康德出來攻擊太陽系永恆說的時候，差不多是同時，在一七五九年，馮爾夫（Wosff）出來對物種不變說施以第一次的抨擊，而公佈了其發展說。但是，這在他不過是一種天才的卓見，後來到了阿金（Oken）拉馬克（Lamarck）及拜爾（Baer）手裏才有了較為具體的形式，而在一百年之後，在一八五九年才被達爾文勝利地引出。原生質與細胞本來是久已被人承認為一切有機體之最後組成要素。現在同時被人承認了他們都以最下級的有機形態而獨立生存着。因此，有機與無機中間之鴻溝差不多已經小到最低限度，而用發展的方法來研究有機體之由原之最重要的障礙算是掃清了。於是近代世界觀之基本諸點已經齊備了。一切永恆的解體了，一切堅固的蒸發了，一切所謂永久的都是可變的，而整個的自然界亦存身於永久的急流與旋渦中。

‘現在我們又回到希臘哲學底偉大的開創者的概念，他們說，從最小的分子到最大的大塊，小自一沙粒大至太陽，自蚊虻至于人，總而言之，全部自然界都存身於永恆的生與滅，不斷的川流，不停的運動及變化中。然而這在古代的希

臟不過是個天才的破謎，而在現代却是嚴格科學的經驗的研究之結果，因此有了十分更固定更清楚的形式。的確，此種周轉之經驗的證據還少不了許多空白，但是空白比較已經固定的要少，而且這空白也一天一天地填補起來。要記起科學之主要部門如天文學，化學，地質學才不過有一世紀的歷史，生理學中之比較方法才不過五十年，而一切生命發展之根本形式，細胞之發現才不過四十年。

星雲氣之回轉，其運動之規律要經過很多世紀的時間來觀察星宿的自轉才能知道，這些星雲中間因冷卻及消滅產生了許多太陽，及我們的太陽系，我們的太陽系則限制在最偉大的星環——銀河之中，那是個宇宙的星羣。很顯然地，這種發展並不是在各處都用同樣的速度。天文學現在不得不承認在我們的星系中有黑暗無光的非行星體存在，即無光星的存在。同時（根據賽奇 Secchi）我們星系中的雲霧是還沒有成功的太陽，而據梅德萊說，這些星雲是很遠很遠的獨立的宇宙星羣，而其發展的程度要由分光鏡來決定。

拉卜拉斯用很詳細的，空前絕後的方法說明了怎樣從星雲中發展了太陽系，最新的科學不過證明了他的思想而已。

在最模範的個體中——在太陽，行星，衛星中——最初充滿着一種物質運動的形態，我們稱之日熱。在那種溫度之

下，如現下的太陽一樣，談不到什麼原素之化學的化合；更進一步地觀察太陽使我們知道熱能夠變成電與磁；現在差不多已經十分肯定了，太陽上面所發生的機械運動，他的唯一的來源是熱與重之鬥爭。

單個的星體越小則其冷却愈快。開始冷的是衛星，流星，隕石；我們的月亮早已滅了。行星冷得較慢，而中心的大星冷得更慢。

隨着漸進的冷却，首先開始了互相變通的運動之物理形態的互相行動，最後到了某一點時，開始分成各種化學原素，化學上無差異的原素相互分化起來，每個得了一種化學性質，而可以互相化合。此種化合隨着溫度之降冷而變化。溫度之變冷不但影響於每一個原素而且要影響他們的化合物，隨着這種變化，氣體變化了液體，液體又變成固體，因此就造成了新的條件。

當行星得到一個硬殼時，他的表面就慢慢地積蓄了很多水，到了這個時候，他本身的溫度同他從中心星所取得的溫度比較起來，就慢慢地減少了作用。於是他的氣圈就成了隕石的活動場。用現在的話來講，行星的表面成了地質變化的場所，在表面上形成了大氣圈，他的比重慢慢地增加了，而地心火液對表面之行動則慢慢減少。

最後，溫度降低到了某種程度，——最低限度在地面之

某一部——超過了一定的界線，到這時蛋白質已經能夠存在了，而在適當良好的化學條件之下，就形成了原生質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曉得這種適當的良好的先決條件怎樣。這個並不奇怪，因為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曉得蛋白質的化學公式，甚之不曉得在蛋白質中有幾種化學原素。差不多在十年之前我們知道了完全不成形的蛋白質具有一切生命作用，消化食物，排洩，運動，消耗，對刺激的反動，繁殖。

不曉得過了幾千幾萬年，造成了一種條件使此過程能夠前進一步，於是從這無形態的蛋白質中因核及皮的形成而產生了第一個細胞。隨着第一個細胞立下了有機世界形態組成的基礎。我們根據古生物學的紀年的材料我們可以假定最初產生的是各形各色的無細胞的或是有細胞的原生物（Protist），堪那登斯（Canadense）告訴我們這些東西。從這些原生物中慢慢地分化了原始的植物與原始的動物。從原始的動物中經過更多的分化產生了類門族種的分類，最後產生了屬，到了發展到了完滿的時候，產生了神經系統，特別是脊椎神經，而最後，經過了脊椎神經，大自然就認識了自己——就產生了人。

人是由分化產生來的，這分化不但有個體的意義，由單細胞變到自然界中最複雜的有機體，而且有歷史的意義。經過了幾千幾萬年，兩手才從腳中分化出來，才有直立的行

走，從此人才同猿猴分途，從此才建立了語言發達及腦筋大發達的基礎，而且因為有了腦子及語言的發達所以才形成了人與猴之間的不可渡越的鴻溝。因為手的特殊作用發達了，所以才出現了工具，而工具可說明人的特殊的行動，人對自然發生了作用，這就是生產。動物也有工具，但只在很窄的範圍內，他只能以其身體之一部作為工具，譬如螞蟻，蜜蜂，水獺等等；動物也生產，可是他們對周遭自然界的生產作用只等於零，只有人才能夠對自然留得一點痕跡，他們不但可以移植動物與植物，他並且可以改變其住處的氣候與形式，他並且可以改變植物與動物，他們行動的結果只有到地球死滅時才會消滅。

他之所以得此，首先的主要的是因為有手。汽機在現在算是最有力的改變自然的武器，但最後還是要用到手。而跟着手的發展又發展了頭，產生了意識——在開頭時不過是些有益的實際的行動，後來在條件良好的民族中慢慢覺得了這種有益的行動就是自然的法規。一方面增加了對於自然規律的認識，一方面跟着就產生了對自然引動之方法。人不只在手的幫助之下創造了蒸汽機，假若腦筋不跟着手的發展而發展，則這還是不可能的。

我們以人的資格走入歷史。動物亦有歷史，就是他的發生及慢慢進化到現在狀況的歷史。但是這歷史只經過他們，

爲着他們，而他們自己也親身參加的，但是却依照他們知覺及希望。人離嚴格的獸越遠，則越能覺到自己的歷史，則不能預見的因子不能節制的力量對歷史的影響亦愈小，而先定有目標的歷史行動亦越能得到較多的符合的結果。如果我們以這種規模而研究人類的歷史及現代最發達的民族的歷史則我們可以看到立定的鵠的及得到的結果之間還有很多大的不調協存在，這不可預知的勢力還依舊統治着，不可節制的力量比起運動中有計劃的力量還要大得多。這是沒有辦法的，人類最重要的歷史活動，人類以之脫離禽獸的活動，這種活動組成了人類一切別種活動的基礎，這滿足人類生活需要的生產，到了現代就是社會生產，當這種生產還是不可節制的力量之不可預見的行動之盲目的遊戲時，當人類所立定的目的實現起來只是一種例外或是結果完全相反時，總是如此的。在最進步的工業國家裏我們可以克服自然的力量使他服務於人類。我們因此可以無限制的擴大生產，而到了現在一個小孩子做的事都比過去幾百個成年人做得多，但是這種生產擴大的結果如何呢？剩餘勞動的增長，貧困的增加及每十年一次的大破壞。經濟學家宣揚自由競爭與生存鬥爭爲最偉大的歷史勝利，而達爾文却證明了這些東西是禽獸世界的常態，當他這樣做時，他給人類特別是他的同鄉開了個頂苦辣的頑笑，這他自己也知道。只有

有計劃的生產與有計劃的消費即是社會生產的自覺的組織才可以使人在社會關係上超乎其餘的禽獸，因為他把生產抬舉到特殊的意義上。只因爲有了社會發展所以才使這種組織一天天有可能。從此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人類及其各種活動特別是自然科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一切過去同他比較起來都不過是個陰影。

一切生的都要滅。過去了幾百萬年幾千幾萬代生了滅了，時光毫不姑息的前進，當太陽的熱力窮盡時兩極所堆積的冰必然會散佈開，那時密集在赤道上的入類必然也有人工取暖的必要，那時有機生活的最後餘跡也必然會慢慢地消滅，那時的大地成了冷卻的死了的球，同月亮一樣，那時他將在死了的太陽之周圍循着一天比一天短的軌道在深遠的黑暗中運轉，最後便落在太陽上。別的行星也要遭受同樣的命運，有的比地球晚有的比地球早。一個冷的死的球繼續着在宇宙大空中很單調的行走，代替以前的調協地多元的，有光的有熱的太陽系。我們太陽系遭際此種命運，我們宇宙星海中無數的別的系统也將遭受同樣的命運；有些星星，當人類存在還有眼睛能夠看到他們的光時，他們的光還沒有走到地球，但是他們也逃不了這種命運。

當這些太陽系完結了這些生命之環而遇到了固定的命運時，當一切都是犧牲的死滅時，以後怎樣辦呢？太陽體是

不是會以簡單的大塊在無窮的太空中滑溜，難道以前的各形各色的分化出的自然之力會變成永遠一成不變的運動的唯一形式——吸力麼？賽奇（Secchi）曾問過（八一頁）‘或許在自然中有一種力量能夠把死了的系統恢復到火熱的星雲的原始狀態，能夠喚起新的生命？我們不會曉得。

當然我們不會曉得，正如我們不曉得二乘二等於四是因為什麼，不曉得為什麼物體之吸引力同物體距離之二次方成反比例。在理論的自然科學中，力求把自己對自然的觀念統一成為調和的整體，沒有這東西連近代最有辦法的實驗的理論都不能前進一步，我們時常要乞靈於不全知的數目，而邏輯及思想之澈底應當經常的把知識之空白處填補起來。現代的自然科學必須從哲學那裏借來運動不滅說，不然他便不能存在。但是物質的運動不但只有一種呆板的機械運動，不但只有簡單的位置移動；物質的運動有熱，光，電的及磁的引力，化學的化合及分解，生命及最後的意識。假如說物質只有一次，同永恆的時間比較只有很有限很有限的一個短期中可以分化成為各種形式，以後就要把運動底一切豐富形式交還，而自己永遠以簡單的位置移動而滿足，這等於說物質是死的而運動是無常的。運動不滅說不但要從數量的意義上同時也要從質量的意義上去了解他。物質——他的機械的位置移動雖然在某種合適的條件之下也可以

變作熱與電。化學作用及生命等等，但是他自己不能夠產生這些條件——這種物質只耗費運動；運動——假若沒有能力能夠變作他本身所蘊含的幾種形式，這運動雖然有動源 (Dyoamis) 却沒有能力 (Energie) 這樣就會消滅一部份。但是這兩種情形都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就是一個時候我們的大宇宙的物質把很多運動變作了熱。他的數量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不過據梅德萊爾說，最低限度從這些運動中可以產生二千萬個太陽系，這些太陽系當是早晚是要消滅的，這是我們堅決地相信的。究竟怎樣變的呢？我們所知道的同賽奇一樣地少，將來的我們太陽系的殘骸是不是會從新變作生原料以備造新的太陽系。對這個問題我們或是不得已而乞靈於造物者，或是做一個結論說製造我們大宇中的太陽系的火熱的原料是用天然方法起來的，用運動轉化的方法，他出於自然底運動的物質，雖然幾千萬萬年之後，雖然以多少偶然的形勢，但必然有這個時候。

現在我們應當一天一天地更要承認這種轉變可能。一般學者都不得不相信，星宿之最後命運是互相碰擊，他們必然排洩出很多熱力，這是在這種衝突之下必然會產生的結果，天文學所通知的新星之突然出現，及許多熟知的舊星之突然地增加了光明。都很易得來證明此種衝突之假說。在此

時不要忘記了，不但我們這一羣行星繞着太陽轉，而我們的太陽也在大宇宙星羣中移動，而我們的全宇宙星羣又要在宇宙太空中移動，他要同別個宇宙星羣維持一種暫時的相對的均勢；因為，即令是一個自由運行的個體他的相對均勢也只有在某種條件所限制的運動中才能存在，許多研究者證明，在宇宙太空中各處的溫度並不是一致的。最後我們知道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我們宇宙是星羣之無數太陽之熱力都消滅在太空中但還很難增高太空溫度攝氏寒暑表百萬分之一度。這些大量的熱力以後的遭遇究竟如何呢？是不是葬身於烘煖太空之嘗試中呢？是不是實際消滅了而只因爲增加了比零大的溫度一個事實而在理論上還能存在呢？這種論斷等於否認了運動不滅說。這替一種假說開了門，這假說說因各星之互相碰擊，一切實在的機械運動都變成了熱，這些熱將消散於宇宙太空中，因此雖然‘物力不滅’。但所有的運動都會停止。（因此可見，用物力不消一語代替運動不滅一語是何等的不成功。）我們由此可得到一個結論，消散在太空中的熱力應該以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只有將來的自然科學才能知道）轉變成運動之別種形態，熱力將這種形態中重新積聚起來，重新發生作用。在這種情形之下，那死了的太陽們返轉來變成火霧的主要困難都沒有了。

然而，宇宙在無窮的時間內永遠重覆着繼續出現不過

是在無限太空中有無數宇宙同時存在一語的邏輯推論：連楊克(美國人——譯者)德拉派爾(Draper)底反理論的腦筋都不能不承認這個斷語之強制的必然性。

物質在永久的旋流中運動，這旋流在其長時中完成其拋物線的運動，其時間之長。我們地球上的年份是不能作單位的。在這旋流中時間有了最高的發展；有機生命，特別是自覺存在物之生命所給的時間，其小得可憐等于這些生命及自覺所佔的空間；在這旋流中一切物質存在底個別形態——不論是太陽或星雲，一個動物或是一種動物，化學的化合或分解——都毫無差異地，一樣地是無常的；這其中沒有永住不滅的東西，除了那永遠變化永遠運動的物質及這運動與變化之規律。但是，不論這旋流怎樣屢次地怎樣不憐惜地在時與空中完成；不論有幾多太陽幾多地球會生滅與；在某一個太陽系內某一個行星上會出現一種有機生活的必要條件，不論這個要等好久；不論在有能思想的腦筋的動物出現以前有幾多種類動物會發生會死滅，而這些能思想的動物又於極短期間存在於適合於他們生活條件之下，而以後還要毫不慈悲地滅絕——不論如何，我們總相信，物質在其一切變化中還是永遠如此的，他沒有一個德性會消滅，因此地球上的最高光芒——思想的精神——雖然會以鐵的必然性而消滅，但是他會在另一時間內重新產生於別的地方。

昂格斯曾準備以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來整理十九世紀自然科學中的一切成績，他本來打算寫一本書叫‘自然辯證法’，他曾寫了幾篇文章陸續在‘新時代’上發表了；又發表過兩個大綱，第二個大綱中便有‘舊序’的名稱。

舊序便是這篇文章，大約是一八八〇年寫的，因為文中曾說：細胞之發現才不過四十年，而細胞是一八三九年發現的。從‘舊序’兩字看來，昂氏大概還準備寫一篇新序，但在遺稿中却沒有找到。

文章的內容很豐富，序文字之瑰麗有力亦堪與內容相稱。譯者準備將‘自然辯證法’全書書出，先譯出‘舊序’以饜讀者，更名為‘辯證唯物論的宇宙觀與近代自然科學之發展’。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著

實價大洋七角

在這兒呈露於讀者諸君眼前的，是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我們這本小書，凡代表了十三國，共八十三篇，都是現在文壇上極重要的消息，和美好的論文；而有介紹於國人的必要的。倘使我們是讀過這本書的話，至少可以懂得和了解最近世界的文壇是怎樣？著者趙景深先生的文筆是極溫柔簡潔的，讀完了，會使你覺得文字的美妙。

現代南歐文學概觀

徐霞村著

實價大洋四角

南歐文學在現代的世界文壇上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惜乎因為太專門的緣故，國內無人介紹。本書為徐霞村先生數年來心血之所聚。共合「現代意大利文學」「現代西班牙文學」「現代希臘文學」「現代葡萄牙文學」「古魯兒司格派與皮藍得婁」「阿左林」諸篇，為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素箋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大洋五角

這本美麗的小本，包含十封寫給幾個似曾相識的人的信，可說是情書集，也可說是懺悔錄。有些可以使你覺得幽默得有趣，有些可以使你感傷得下淚。中國生活史的作者陳東原，和許多著名的書報介紹欄對本書都有詳細的批評，都承認本書體裁方面在中國貧弱的文藝園圃中是別開了一個生面。在藝術方面是充滿了詩意的美，而陳君尤三致意於女性的純真表現的親切有味。

沈從文甲集

沈從文著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凡愛好文學而沒有對沈從文先生的小說發生特殊的興味的人，大概是很少的吧。他的作品是能抓住你的感情一氣讀到底，不會使人疲倦，而只是使人感覺得食多無厭的。這本十萬言的小說集是夠你過癮了。全書包含六個短篇，一個中篇，都是他最近精心的結構的傑作，其中五分之四是從未發表過的作品。

論資本論

李季

內容
主旨
特點
批評
歷史
讀法

資產階級的態度

俄法文的譯本

無產階級的態度

達爾文的共鳴

與共產黨宣言的比較

世界一切有文化的國家對於資本論都有譯本，可是就作者所知，在德，俄，法，英，意，日等早已刊佈此書的先進國中，至今還沒有人將這部名著的內容，主旨，特點，批評，歷史和讀法，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所持的態度等等概括介紹出來，使人們于讀此書之前，知道一些應當預先了解的事件，實為學術界中一個缺點。現在國人具有願意研究資本論的強烈傾向，但苦不得其門而入，特發表此文，以資參攷。不過本文只是拙著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學說上編第三冊中的一章，本書下編既有專章介紹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為避免重複起見，故對於這一點略而不言，作者此時正在整理第三冊，又無暇在此補足，這是要請讀者特別原諒的。季子附識。

“資本論的出現對於馬克思物質的地位，毫無所改變。然此書却指出他的生活中一個轉向點。並且使一般仇敵必須承認他為第一流學問上的思想家”。（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三卷編者小引二二頁）。我們承認柏柏爾和卡斯天于校訂馬昂兩氏書信錄時所說的這幾句話是十分正確的。關於資本論的出現為馬克思生活中一個轉向點一節，昂格思于此書付刊時即已說過了，（參看本書第三冊三六四頁）。本書以後的敘述也可以表現出來，此處用不着多講。現在單就

柏卡兩氏最後一句話引伸幾句。馬克思秉質極高，又生性好學，在“少年時代”，已經是學識優長，嶄然露頭角，所以黑斯讚美他對於哲學造詣之深，而嘆為合盧梭，福祿特爾，何爾巴哈，勒新，漢訥，和黑格爾為一人。（參看本書新版第一冊三九頁）。迄他移居巴黎，亡命不律塞，思想發生變遷，學業與時俱進，因此發現歷史的唯物論。他為“第一流學問上的思想家”的證據是明白表現出來了。後來遜跡倫敦，潛心學術，著政治經濟學批評一書，開經濟學的新紀元，為無產階級在理論上獨樹一幟，他為“第一流學問上的思想家”的證據又明白表現出來了。然當時的人士，不必說他的仇敵，就是一般朋友也很少確切看出並且承認他是一個“第一流學問上的思想家”，觀于李卜克內西和畢士坎蒲對他的政治經濟學批評沒有好評，（參看本書第二冊三五頁）即可見一斑。然自他自認為“主要著作”（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三卷三三二頁）。的資本論出世，表見其精深博大，自成一家言，不獨是普通一般人稱之為“勞動階級的聖經”（見英文資本論第一卷昂格思序言三〇頁，一九二一年芝加哥出版），就是馬克思的仇敵，只要不是完全盲目的，或成見極深的，也不能不承認此書為千古傑作，不能不承認作者為“第一流學問上的思想家”。因此資本論的出現在馬克思的生活史上應是一個新階段的起點，故我們特據此為他的晚年時

代的開端。

馬克思的資本論共有三大卷，這仍是繼續從前的政治經濟學批評一書的，不過他後來覺得這部書所論的多屬於資本的問題，名之爲“資本論”，較爲洽當，然他在書上所標的副題仍是“政治經濟學批評”。當他在世之日，資本論只出了第一卷，其餘第二第三兩卷是他死後由昂格思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兩次校訂出版的。本書下編既有專篇論馬氏的經濟學說，資本論中的學說，此處自不必提及，惟將其內容，主旨，特點等項略說一下。

資本論第一卷所論的爲資本的生產進程，(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共分七篇。第一篇論商品與貨幣，計三章，第一章商品，第二章交換進程，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

第二篇論貨幣轉變爲資本，計一章，即第四章，章名與篇名相同。(按英文譯本將這一章的三項作爲三章，即一，資本的一般程式，二，一般程式的矛盾，三，勞動力的買賣)。

第三篇論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計五章，第五章勞動進程與價值增殖進程，第六章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第七章剩餘價值率，第八章工作日，第九章剩餘價值率與量。

第四篇論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計四章，第十章相對剩餘價值的概念，第十一章協作，第十二章分工與手工工廠

業，第十三章機械與大工業。

第五篇論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計三章，第十四章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第十五章勞動力價格與剩餘價值大小的變化，第十六章剩餘價值率的各種程式。

第六篇論勞動工費，計四章，第十七章勞動力的價值（又價格）變成勞動工費，第十八章計時工費，第十九章計件工費，第二十章各國勞動工費的差異。

第七篇論資本的蓄積進程，計五章，第二十一章單純再生產，第二十二章剩餘價值變成資本，第二十三章資本主義蓄積一般的定律，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的蓄積，（按英文譯本將本章改作一篇，將其中的七項改作七章，即一、原始蓄積的祕密，二、農民被驅逐于土地之外，三、十五世紀末葉以來對於被驅逐者的殘酷立法。減少勞動工費的法律，四、資本主義佃農的興起，五、農業革命對於工業的反響。替工業資本創造國內市場，六、工業資本家的興起，七、資本主義蓄積歷史的傾向）。第二十五章近世殖民的學說。

概括地講起來，這一卷向我們指出價值和剩餘價值是怎樣生產出來的，因此揭露資本的生產場所的歷史、本質、營業技術的和經濟的祕密。我們在此處所看見的唯一重要事件是資本家剝削勞動者，而階級爭鬥即根源于此。

資本論第二卷所論的為資本的流通進程，（Der Zirkul

la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共分三篇。第一篇論資本的轉形及其循環，計六章，第一章貨幣資本的循環，第二章生產資本的循環，第三章商品資本的循環，第四章循環進程的三種公式，第五章流通期間，第六章流通費用。

第二篇論資本的回轉，計十一章，第七章回轉的期間與度數，第八章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第九章投資的總回轉。回轉的循環，第十章關於固定與流通資本的學說。重農主義者與亞丹斯密，第十一章關於固定與流通資本的學說。李嘉圖，第十二章工作時期，第十三章生產期間，第十四章流通期間，第十五章回轉期間對於投資大小的影響，第十六章可變資本的回轉，第十七章剩餘價值的流通。

第三篇論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計四章，第十八章引論，第十九章過去對於本問題的討論，第二十章單純的再生產，第二十一章蓄積與擴大再生產。

概括地講起來，這一卷引導我們到資本的和商品的市場，探討資本循環的各種形態，說明資本家實現曾經生產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即換取貨幣——以便再行購買生產工具和勞動力，使生產進程得以繼續下去。

資本論第三卷所論的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進程，(Der gesamtproz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共分七篇。第一篇論剩餘價值化作利潤與剩餘價值率化作利潤率，

計七章，第一章成本費價格與利潤，第二章利潤率，第三章利潤率對剩餘價值率的關係，第四章回轉對於利潤率的影響，第五章應用不變資本的經濟，第六章價格變動的影響，第七章附註。

第二篇論利潤化作平均利潤，計五章，第八章不同的生產部門因資本的組成不同而有不同的利潤率，第九章一般的或平均的利潤率的構成與價值化作生產價格，第十章競爭引起一般利潤率的均衡市場價格與市場價值，第十一章勞動工資一般的變動對於生產價格的影響，第十二章補註。

第三篇論利潤率下降傾向的定律，計三章，第十三章定律的本身，第十四章反對作用的原因，第十五章定律內部矛盾的發展。

第四篇論商品資本與貨幣資本轉變商品交易資本貨幣交易資本，計五章，第十六章商品交易資本，第十七章商業利潤，第十八章商人資本的回轉。價格，第十九章貨幣交易資本，第二十章商人資本歷史的材料。

第五篇論利潤分作利息與企業利潤。擔負利息的資本，計十六章，第二十一章擔負利息的資本，第二十二章利潤的分配。利息率。“自然的”利息率，第二十三章利息與企業利潤，第二十四章在擔負利息的資本形態中資本關係具體化，

第二十五章信用與空資本，第二十六章貨幣資本的蓄積及其對於利息率的影響，第二十七章資本主義生產中信用的任務，第二十八章流通媒介與資本。圖克(Tooke)和佛拉頓(Fullarton)的見解，第二十九章銀行資本的成分，第三十章貨幣資本與實在資本一，第三十一章貨幣資本與實在資本二，第三十二章貨幣資本與實在資本三，第三十三章信用制度底下的流通媒介，第三十四章錢幣原理與一八四四年的英國銀行立法，第三十五章貴金屬與匯兌率，第三十六章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況。

第六篇論剩餘利潤化作地租，計十一章，第三十七章引論，第三十八章差額地租。總論，第三十九章差額地租的第一種形態，(差額地租一，)第四十章差額地租的第二種形態，(差額地租二，)總論，第四十一章差額地租二，第一例：不變的生產價格，第四十二章差額地租二，第二例：下降的生產價格，第四十三章差額地租二，第三例：上升的生產價格。結果，第四十四章差額地租與最劣的耕種土地，第四十五章絕對地租，第四十六章建築地的地租。礦山地租，土地的價格，第四十七章資本主義地租的發生。

第七篇論收入，計五章，第四十八章三位一體的程式，第四十九章生產進程的分析，第五十章競爭的外表，第五十一章分配關係與生產關係，第五十三章階級。

概括地講起來，這一卷分析剩餘價值變為利潤：資本家在市場中所實現的剩餘價值不是一部分人所能壟斷的，必須分配于整個的資產階級，即以利潤，利息和地租的形態而分給企業家，銀行家和地主等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謎子至此乃完全解決了。

資本論三大卷的內容雖略如上所述，然還可用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幾句最恰當的話總括一下：“就這部大著作的全體看，我們可以說：第一卷及其中所發揮的價值律，工資和剩餘價值將現社會的基礎赤條條地暴露出來了，第二和第三卷則表現立於這種基礎上面的上層建築物。此外也可以用一種完全不同的圖形形容出來，就是：第一卷示我們以社會有機體的心臟，而血液即產自這個心臟，第二和第三兩卷示【我們】以全體的血液循環和營養，一直到最外部的表皮細胞為止”。（見墨爾林馬克思傳三八四頁）。

哥郎瓦爾德 (M. Grundwald) 說：“凡在國際資本主義佔勢力的地方，馬克思的‘資本論’也佔勢力，只有資本論佔了優勢，才能夠克服資本主義。這種克服就是指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就是指另一種經濟和歷史結構體的開始”。（見哥氏馬克思資本論入門一三頁一九一二年出版，Zur Einführung in Marx' "Kapital"）資本論為什麼有這樣大的威權，牠一佔了優勢，就可以征服資本主義呢？因為牠是科學的共產

主義的基本著作，或像考茨基所說的一樣：“是近世社會主義鐵的基礎”。（見工人教育報一九二三年第三期四頁。Arbeiter-Bildung）可是不獨我們在上面說明資本論的內容時沒有涉及共產主義，即翻徧全部資本論，也不能發見關於共產主義的長篇大段的議論，並且在這一部二千餘頁的宏篇鉅製中，簡直連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都很少映入我們的眼簾。所以昂格思說：“有些讀者對於此書將十分失望。自許多年以來，有幾方面希望牠出版。【他們以為】真正社會主義的祕密教義和萬應靈藥終久應在書中揭示出來，當某些人見着此書行世的時候，也許預先想到現在將從書中看見共產主義的福音地是怎樣一回事。誰想及這種享樂，誰就是根本錯誤”。（見耶贊諾夫主編的馬克思與昂格思叢刊——Marx-Engels Archiv——第二卷四四九至四五〇頁，楚柏爾：昂格思對於資本論第一卷的七篇評論。一九二七年佛朗克佛出版。——Ernst Czöbel: Friedrich Engels, Sieben Rezensionen über den ersten Band des ‘Kapital’）既是這樣，資本論怎能稱為科學的共產主義的基本著作，或“近世社會主義鐵的基礎”呢？

但我們應當知道，資本論所以得着這個稱呼，並不是因為馬克思像一般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一樣，憑着自己的腦子，在書中作出一些共產主義的圖案，或訂出一些共產主義的

條文，以為新社會實行或遵守之具，而是因為他“將近世社會的經濟運動律表現出來了”。（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三八頁）。所謂近世社會，“即資產階級的社會。探討一定的歷史階段的社會生產關係的起源，發展和消滅——這就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內容”。（見德文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二四頁，維也納，柏林出版。——W.I.Lenin Sämtliche Werke.）或像特煖爾池所說的一樣：“資本論是從特別勞動和生產狀況的經濟中心點出發，對於近世文化作一種極明確極銳利的分析，牠並非一般的國民經濟學說：這是一個主要點。此書的確是在極力注重反面【的意旨上】，描寫近世文化的飛揚，進步，憂患和將來的結局。但這個結局不是文化的滅亡，而是人類新時代的開端與前提，是在大家同樣享受從資本主義獲得的生產力的結果之下，繼續推進這種生產力。進到這一步的轉變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世界革命，馬克思確信這種革命將除去種種不可保持和矯揉造作的關係，這就是一切人類真正的進步與真正的幸福”。（見特煖爾池全集第三卷歷史論及其問題三五八至三五九頁，一九二二年杜平根出版。Ernst Troeltsch Gesammelte. Schriften III.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Tübingen.）

我們為使讀者深刻了解馬克思所謂近世社會的經濟運動律起見，特在此略加發揮，藉以表現資本論的主旨何在。

昂格思稱馬氏生平有兩大發現，其一為“暴露資本主義的生產利用剩餘價值的祕密”。（見昂氏杜靈格的科學革命一三頁，一九二一年司徒嘉德出版）。脫尼斯以為資本論的“名稱又可以叫做‘剩餘價值論’”（見脫氏馬克思傳及其學說一〇九頁，一九二一年葉那出版）。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近世社會的經濟運動是為資本所宰制，而資本的目的却在于生產剩餘價值。

一般資本家購買生產工具和勞動力，製造商品，出售於市場，為的是掠取剩餘價值。凡商品的價值是由其中所含的社會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勞動力也是一種商品，所以牠的價值是由勞動者維持生活和蕃殖子孫所需的生活品的價值而成的。例如勞動力每日的價值為一元，資本家即以此數雇用勞動者，作工十點鐘。他在五點鐘之內所生產的價值等於勞動力的價值，（除去資本家所投的資本的價值），然他必須繼續作工五點鐘，此後所生產的價值便是一種剩餘，即一種剩餘價值，完全為資本家所壟斷。

資本家將勞動者所製造的商品送入市場，實現其中所含的價值與剩餘價值後，不獨依舊購買生產工具與勞動力從事于生產，並且將剩餘價值（除用于消費的一部分），變作資本，（即資本的蓄積），從事于更大規模的生產，以便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同時他們更將各單個的資本集合攏來，

(即資本的集中)，使蓄積的作用擴大並加速，又使資本技術組成(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關係)的革命擴大並加速，於是生產的組織便由單純的協作進而為手工工廠業，再進而為大工業了。

當最初的資本家出現之時，工資勞動的形態雖已存在，然這種勞動只是例外的，副業的。這資本家使生產變作一種社會的行動，由許多工人在工廠中着手實行，工資勞動即成為全部生產的常規與主要形態，而工人即以工資勞動為唯一的活動。然生產工具與生產物都為資本家所壟斷。這就是社會的生產，與資本家的私有，其中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

這種對抗並非偶然，而且是日趨劇烈的。在一方面，因大資本壓倒小資本，小資產階級相繼破產，以致無產階級的人數日多，在另一方面，因技術進步，機器日精，人類勞動的需要減少，以致無產階級的失業者日多，形成龐大的產業預備軍。隨時隨地供資本家的驅策去壓迫現役勞動軍。而“那種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預備軍與蓄積的範圍及精力保持均衡的定律，將勞動者釘在資本上面，黑佛斯托斯(Hephas-tos)火神的楔子將布洛墨托斯(Prometheus)釘在巖石上還要堅固。牠形成一種貧窮的蓄積以與資本的蓄積相呼應。所以一方財富的蓄積同時就是對方——即生產自己的生產

物作為資本的階級——貧窮，勞動痛苦，奴隸狀況，無知識，兇殘和德性墮落的蓄積”。（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五八二至五八三頁）。

無產階級既對照着資產階級而日趨貧困，牠的消費即降極小限度，牠所購買的商品僅限于維持生活所必需的。但在另一方面，因近世機器不斷的改良，生產力不斷的提高，生產範圍不斷的擴大，商品的數量有增無已。世界市場雖可加以擴張，但不能和生產的擴張同其步驟，於是發生商業的危機。在危機之中，生產物充斥於市場，無人過問，現金匿跡，信用消失，工業停滯，工人因替資本家生產了過多的生活品，以致自己得不到生活品，而破產之事也層出不窮。大量的生產物和生產力必須加以毀滅，才能夠使生產與交換逐漸恢復原狀。

但這種危機絕非例外，而是隔若干年出現一次的。“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六年，總是每隔十年出現一次。後來雖不甚如期表演，然並沒有停止”。（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二卷考氏序言二〇頁）。而且每次出現，比較上次危險更大，蔓延更廣，現在簡直成爲一種痼疾，永久不退了。這種痼疾就是暴露資產階級再也沒有能力管理近世偉大的生產力。

近世無產階級特別是受了危機的壓迫，愈加增進牠的反抗，牠“因資本主義生產進程自身的機構而受訓練，互相

聯合，並且組織攏來了。資本的壟斷變成生產方法的桎梏，這種生產方法本來是在牠的下面繁榮的。生產工具的積集和勞動的社會化所達之點，與牠們資本主義的外殼不能相容。這種外殼行將破裂。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撞着喪鐘。剝奪者將被剝奪了”。（見同書第一卷六九〇至九一頁）。

“由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生出來的資本家佔有方法——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建築在自己勞動上面的個人私有財產第一次的反。（Negation）可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依一種自然進程的必然性，產生牠自己的反。這是反之反。（Negation der negation ·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這種反之反不再對工人恢復私有財產，但恢復基于資本主義時代所獲——即基于協業以及土地和勞動自身所生產的生產工具的公有——的個人財產。

將基于自己勞動的個人零星私有財產變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比較將資本家的財產——在實際上這種財產已經是建築在社會的生產營業上面的——變為社會的財產，這種進程自然是更延久，更激烈，並更困難。前者是少數篡奪者掠奪民衆，後者是民衆掠奪少數篡奪者”。（見同書同卷六九一頁）。

統觀以上各節，便知道資本主義的起源，發展衰落和傾覆種種因于掠取剩餘價值。資本家最初所以孜孜汲汲，購買

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從事生產，爲的是掠取剩餘價值。後來發展技術，擴張生產，在世界市場中作猛烈的競爭，爲的是採取更多的剩餘價值。但市場有限，人慾無厭，他們因此所生產的商品竟無法出售，于是危機四伏，險象環生，近世的生產力不斷地反抗近世的生產關係，使資本主義不得不陷于孤城日落之境。這是因爲牠吸收剩餘價值太多，消化不了，以致僵死。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於這種發展的進程很詳細地剖解出來，就是將牠的出路昭示我們，這條出路即共產主義。所以資本論雖沒有多談共產主義，牠却配稱爲共產主義的基本著作，或“近世社會主義鐵的基礎”。

資本論的主旨既經明瞭現在當介紹其中足以感動人心的特點。克卡樸說：“資本論第一卷從英國的歷史紀錄內和國會委員會的藍皮書中對於資本家奪取剩餘價值，引出許多證據，這是英國工業制度中種種弊端的一幅慘淡無光的畫圖，這是英國工業興盛中一種黑暗和悽慘的反面”。（見克氏社會主義史中文譯本上卷一六二頁）。朋斯（C.D.Burns）說，資本論的“實在勢力似乎是在對於一般學者和享特權者所同聲喝采的制度，善于堆積宣告罪狀的證據，去反對這種制度。凡不懷成見的人讀了資本論，對於著者真摯的慈愛，及其反抗工業制度所舉無可反駁的證據，不能不印入腦筋

中”，（見朋氏革命原理三七頁。The Principles of revolution）因為“沒有人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一樣更‘深入社會確定的具體的關係中’。他花費二十五年的工夫從一切方面去探討此等關係”，（見昂格思的住宅問題七二頁，一八八七年和亭根，齊利池第二版。——Zur wohnungsfrage Hottigenzurich, 1887.）而他所列舉的英國工業主人虐待男女工人和童工的事實，尤足動人觀感，尤足使人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達是由一條血路中撕殺出來，是從千百萬工人的身上踏踐而過，因此所演成的罪惡，實足遺臭萬年，非五大洋的水所能滌蕩乾淨的。

馬克思告訴我們：“產業發達的國家對於產業不發達的國家只是指出其自身將來的模型”。（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三七頁）。現在國際的和國內的大工業在中國許多地方開始萌芽並發展了，工人因生活困苦，待遇不良，舉行同盟罷工之事，層見疊出，“黑暗和悽慘的反面”逐漸暴露出來了。因此我們對於馬克思所舉工業發祥地的英國資本家虐待工人的事實尤有知道的必要，今特介紹其中最重要的節段如左。

首先從關於男工講起。“三個鐵路工人——一為守車，一為司機，一為信號手——立于倫敦命案陪審官之前。鐵路上一樁極大的慘案將好幾百旅客送入陰間地府去了。鐵路

工人的疏忽是這種不幸事件的原因。他們三人在陪審官之前異口同聲說道：當十年或十二年之前，他們的工作每日只有八點鐘，至最近五、六年中，此項工作增至十四點鐘，十八點鐘以至二十點鐘，當着旅行客車【開車】的時候，在旅行者一種特別嚴厲緊逼之下，他們作工常是經過四十點至五十點鐘，不得間斷。他們也是凡人，並不是天神。他們的工作能力一達到某種限度便喪失了。他們自然趨于麻木。他們的腦筋不復能想，眼睛不復能看。那些十分‘有體面的’英國陪審官發出一道宣判書，判定這三人是犯了殺人罪，移歸審判廳辦理，他們在宣判書上輕描淡寫地加入一個‘附條’，表示誠懇地希望鐵路上的資本貴人將來多破費幾個錢，購買充分的勞動力，並希望對於榨取所購買的勞動力更‘節省’一點，更‘自制’一點，更‘顧惜’一點”。（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一卷二〇一至二〇二頁，見英文資本論一卷二七八至二七九頁。按英文資本論雖係從德文原本譯出，然內中所徵引英國事件的文字係由馬克思的幼女伊利安樂從英文原書中直接抄出，故我們對於此項文字，一概以英文資本論為根據）。

托爾斯泰（L. Tolstoy）因俄國鐵路上的運貨工人繼續作三十六點鐘的工，在現代的奴隸制（The slavery of our Times）一文中詫為驚世駭俗之事，然以之和英國鐵路工人

的工作時間相較，猶不免有漸色。上述的變端是起于英國的資本家沒有購買充分的勞動力，致以人命為兒戲，此外還有因他們節省小費，設備不週，致以人命為兒戲的。“讀者知道最近二十年來，麻業大加擴充，而愛爾蘭的梳麻工廠因此也增加了。當一八六四年的時候，該處有一千八百個梳麻工廠，照例，一到秋冬兩季，一般婦女和少年人——她們都是隣近小農民的妻室子女，完全不知道使用機器——從農場勞動中抽調出來，和麻一起去作梳麻工廠中輪的養料。關於出險的次數和種類在機器史上實在是無與比倫。在科爾克（Cork）附近的乞爾的蘭（Kildinan）一個梳麻工廠中，自一八五二至一八五六年共發生六次致命的事件和六十次傷殘肢體的事件；只要花幾個先令的費用，作最簡單的設備，這些事變都是可以避去的。敦巴特里克（Downpatrick）的工廠檢驗醫生懷特博士（Dr. W. White）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所呈的正式報告中說：‘梳麻工廠所出的重大事變是屬於一種最可怕的性質。在許多場所，【工人的】四肢的一部分被截斷的，或因此致命，或成為將來的殘疾。此處工廠的增加自然會使這些可怕的成績擴大，如果把這些工廠置諸立法條例之下，便是一樁大幸事。我相信如果對於梳麻工廠加以適當的監督，則生命和肢體的大犧牲當可免去’。（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一卷四二三頁，及英文資本論一卷五二六

到五二七頁)。

柏柏爾說：一國文明最好的標準，就是婦女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見柏氏婦女與社會主義英文本)。可是在“文明的”英國，勞動婦女所處的地位的惡劣還在男工之上。“露天漂布人’藉着沒有婦女在夜間作工這樣謊話逃出一八六〇年關於漂布業的法律。這種謊話為工廠監察員所發覺，同時國會因工人的請願，把那在清涼馥郁的草地作露天漂布的提議打消了。在這種露天漂布業中，乾燥室中溫度常是華氏九十至一百度，【攝氏三二至三八度】室中的工作大部分由女孩子擔任。‘納涼’是她們有時從乾燥室中逃到新鮮空氣中所用的專門術語。‘十五個女孩圍着火爐，麻布須有八十到九十度【攝氏二十七到三十二度】，的溫度，而葛布則須在一百度【攝氏三十八度】，以上。另有十二個女孩在一間十方尺左右的小房中熨布，和上漿，在這小房的中心地方安着一個緊閉的火爐。女孩子們圍爐而立，爐中常吐出一種可怕的熱氣，使葛布迅速乾燥，以備熨布人作工。她們的工作時間沒有限制，當忙碌的時候，作工常至晚間九點鐘或十二點鐘，並繼續許多夜不停止’。(見一八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報告五六頁)。一個醫生宣言：‘沒有規定特別的時間納涼，但當溫度太高，或她們的手為汗水所污的時候，才准出來休息幾分鐘。……我對於療治火爐工人的病症所得的經驗一

——這是很多的——強迫我發表一種意見，就是，她們的衛生狀況決不如紡紗廠中的工人。（資本在向國會的請願書中描寫她們非常健康，肉色和紅蘿蔔一樣）。她們中間最顯著的病症，是癆瘵症，喉管火症，膀胱作用失去常態的病症，最劇烈的神經昏亂病，和風濕症。我相信所有這些病症都是直接或間接起于工人在工作室中的空氣不清潔和熱度過高，並且是起于她們于冬季歸家時缺乏適體的衣服，可以抵抗濕冷的空氣’。（見同書五六至五七頁）”。（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一卷二四四到二四五頁，及英文資本論一卷三二五頁）。

照基督教講，地獄中盡是火，凡罪人及不信教的人死後當投入獄中，這種神道設教的話原屬“子虛烏有”，即令真有其事，也只在陰間地府，然我們一看馬克思上節所徵引的事實，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爲着生產剩餘價值，陽世中也設有“活地獄”，而一般沒有罪的，甚至于還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女子竟被投入其中。可是英國的資本家不獨替青年女子設備了基督教所宣傳的“火地獄”，並且還替她們設備了基督教所未會宣傳的“窒息苦役地獄”。“在一八六三年六月最後的一個星期中，全倫敦的日報登載一段記事，用‘純因工作過度而死’這種‘驚心怵目的’標題。這是講一個女裁縫瓦克萊（M. A. Walkley）致死的事，她年二十歲，被雇于一家信用素著的製衣店中，受一個芳名伊利斯（Eliss）太太的

掠奪。古來常講的故事又重新出現，此等女孩子每日平均工作十六點半鐘，逢着生意忙的時候，常是繼續工作至三十點鐘，她們垂盡的工作力是靠先勸酒，葡萄酒，或珈琲的偶然供給來恢復的。那時的生意異常忙碌。【店中】必須在頃刻之間，替一班貴婦人製成一些華麗的服裝。以便其參加歡迎新到的王太子妃的跳舞會。瓦克萊已經作了二十六點半鐘的工，沒有間斷，此外同作工的還有六十個孩子，三十個人在一間房中，而這間房所供給的空氣，只有她們所需的空氣立方尺三分之一。到了夜間，她們兩個人一對，睡在窒息的洞中，裏面的睡房是用木板隔開的。然這還是倫敦最好的製衣店之一。瓦克萊於星期五起病，星期日死去，伊利斯太太對於她不預先將手中的工作做完，【便爾死去】，大為驚訝。凱思（Keys）醫生來到死者的床前太遲，他在命案檢查官的面前正當證明‘瓦克萊之死是由於在人數擁擠的工作室中做長時間的工，並且是由於寢室太小，空氣不良’。命案檢查官為着給這位醫生以一種喜於處世的教訓起見，發出判詞道：‘死者是由於中風，但在人數擁擠的工作場中作工過度，死得更快，這也許是一種理由’。自由貿易論者哥布登（Cobden）和伯來脫（Bright）的機關報晨星（Morning Star）大聲疾呼道：‘我們的白奴啊，我們的白奴啊，勞苦終身，大部分是靜悄悄地凋謝了，靜悄悄地死去了’”。（見考茨基註釋的資

本論一卷二〇三到二〇四頁，及英文資本論二八〇到二八一頁)。

瓦克萊爲着替伊利斯太太生產剩餘價值而死，後者猶以她未將手中的工作做完，引爲憾事，資本家唯利是視，不顧工人死活的心理，由這位太太盡情暴露出來了。可是資本家僱用女郎做長時間的工作，因爲致死，禍猶只及於工作者的本身，他們還僱用有孩子的婦女做長時間的工作，不獨直接害及這些婦女，並且間接戕殺她們的小孩子。“在英國十六個註冊區中，每十萬個一歲以上的兒童，每年平均只死去九千；(有一區只死去七千零四十七)。在二十四區中這種死亡超過一萬，但小於一萬一千；在三十九區中，超過一萬一千，但少於一萬二千；在四十八區中超過一萬二千，但少於一萬三千；在二十二區中超過二萬；在二十五區中超過二萬一千；在十七區中超過二萬二千；在十一區中超過二萬三千；在荷阿 (Hoo) 烏爾味罕普吞 (Wolverhampton) 亞施頓，(Ushton-un-der-Lyne)和布列斯頓超過二萬四千；在諾定昂，(Nottingham) 斯它克波爾特，(Stockport) 布刺德佛德 (Bradford) 超過二萬五千；在衛斯俾基 (Wisbeach) 爲二萬六千；在曼切司特爲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五。(見公共衛生第六次報告三四頁，一八六四年倫敦出版)。一八六一年的官場醫生調查指明死亡率之高，除掉地方上的原因外，大都由

于母親被雇離家，結果對於小孩子的照顧不週，待遇也不良，如營養不足，食物不相宜，給予眠睡藥，和其他等事都是；除此以外，在母親和子女之間又發生一種不自然的疏遠之情，此事的結果是故意餓死和毒死小孩子。（一八六一年的調查……又指明在曾描寫的情形之中，母親因職業的關係，對於小孩子的照顧不週，待遇不良，以致小孩子流于夭折，然母親喪失了對孩子的自然感情達到一種深可悲痛的地步——她們對於子女的死亡大概不甚關心，有時甚至於……用種種直接的方法以速其死）。那些‘雇用婦女最少的農業區域，【小孩子的】死亡率便甚低’”。（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一卷三四二頁及英文資本論一卷三四至四三五頁）。

勞動者的嬰孩既因母親在工廠中作工，不免大批的夭折，或被毒死，即倖免於死，稍長也還是要受自己父母的掠奪。“一八六六年兒童雇傭委員會最後的報告說，‘兩性的兒童所需的保護，所當防備的人，無過於自己的父母，由全部證據看來，不幸此事是顯然無疑的，並且達到一種可悲痛的程度’。普通對於兒童勞動作無限制的掠奪的制度，和特別所謂家庭勞動‘所以能夠維持下去，只是因做父母的人不受限制，不受拘束，能對於他們幼小嬌嫩的兒女，行使這種專擅的和惡作劇的勢力。……父母不當具有絕對的權力，使自

己的兒女僅成爲‘獲得許多星期工費的機器’。……所以兒童和少年人在所有這些場所，可以從立法上正當要求一種自然的權利，就是，凡毀傷他們身體，和減少他們智識及道德的事都當免除’。（見兒童僱傭委員會第五次及第二次報告）。然這却不是因親權的濫用造成資本主義直接或間接對於兒童勞動的掠奪；反之，這却是因資本主義的掠奪方法掃去了親權的經濟基礎，遂使親權的行使，流於權力的濫用”。（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一卷四三一頁及英文資本論一卷五三五至五三六頁）。

勞動者既因受資本主義掠奪方法的壓迫，對於自己幼弱的子女無所顧惜，而一般資本家對於掠奪兒童勞動，更無所不用其極了。“一八六〇年一月十四日諾定昂所開的一個會議，主席爲郡長查爾敦（Charlton）君，他在會中宣言道：‘在和花邊業有關係的一部分人口中所受的許多窮困和痛苦是國內其他部分所不知道的，也真正是文明世界所不知道的。……九歲或十歲的小孩子在早晨兩點，三點或四點鐘的時候，便從他們污穢不堪的床上拖下來，爲着一種赤裸裸的生活費料，被逼迫去做工，直至晚上十點，十一點，或十二點鐘他們的四肢凋萎，體格衰弱，面色若白，人性全然降至和石頭的一般的麻木不仁，想起來簡直可怕極了’。（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一卷一九三頁，及英文資本論一卷二六八

頁)。

九歲或十歲的小孩子爲着獲取少量的日食，每日替資本家作工竟達二十點鐘，這已經是駭人聽聞的事，然他們中間還有繼續作工至三四十點鐘的。“在一個製五金板片的工廠中，名義上的【工作】時間是自上午六點鐘起至下午五點半鐘止，一個男孩子每星期作工四夜，至少要到午後八點半鐘，……這樣做工六個月。還有一個九歲的男孩子有時將三個十二點鐘的班一連做下去，到了十歲，他便兩日兩夜連起來作工’。第三個男孩子‘現年十歲，……從早晨十點鐘起至晚上十二點鐘止，連作工三夜，其餘的夜間則作工至九點鐘止’。‘還有一個男孩子現年十三歲，……從晚間六點鐘起作工至異日正午十二點鐘止。共歷一星期，有時將三班【的工作時間】連在一起做，這就是說，從星期一早晨起至星期二晚上止’。‘還有一個男孩子現年十二歲，在斯特很列 (Stavely) 一個鑄鐵工廠中服役，在兩星期之中，從早晨六點鐘起作工至晚上十二點鐘止，他不能再多做了’。(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一卷二〇七頁，及英文資本論一卷二八四至二八五頁)。

十歲或十三四歲的小孩子連日連夜作工，已經是戕賊生機，忍受不了，然他們內中還有受嚴刑壓迫的。“費爾登 (Fiel-den) 宣言：‘在德被州 (Derbyshire) 及諾定昂州 特別

是在蘭卡州，新發明的機器應用於建築在河流能轉水輪的河邊的大工廠中。此等地方忽然需要從遠處城鎮招來的千千萬萬的工人；蘭卡州素為不毛之地，居民較少，當時所需的就是居民。織小敏捷的指頭，明白些說，小孩子是最需要的，於是從倫敦北明翰和其牠地方各種教區工廠中招致學徒的規例馬上興起來了。成千成萬不幸的兒童從七歲至十三四歲，都被送到北方去作工。這種規例是主人須以衣服供給學徒，並使之食宿于附近工廠的‘學徒室’中；監工人被派出來監督工作，後者的利益在使兒童極力作工，因為他們的報酬是以他們所誅求的工作量為比例的。殘忍暴虐自然是【此事的】結果。……在許多製造區中，恐怕特別是在我所屬的那一個惡區【蘭卡州】中，最堪痛心的殘忍暴虐之事，實行加在這些受製造主照顧的無辜和孤立的兒童身上；他們因過度的工作，煩惱得要死，……他們遭鞭撻，被捆綁，受刑罰，備極慘酷的能事；……在許多場所，當被鞭打去作工的時候，他們饑餓到露出骨頭來了，……有時……甚至於被迫而自殺。……德被州，諾定昂州，蘭卡州美麗的和富於風韻的幽谷一逃出公眾的眼睛，便變為嚴刑和殺戮的悽慘荒涼之所。製造業的利潤極大；此事本來當滿足【他們的】慾壑，竟反擴充了【他們的】慾壑，因此製造家又借助於一種計畫，似乎要使自己獲得利潤，沒有任何限制，他們開始實行所謂

。夜工’，這就是說，他們既使一班人在日間作工而被疲勞，又另換一班人去做夜工；夜班【的人】才離床，日班【的人】即睡下，反之，日班【的人】在早晨才離床，夜班【的人】又復睡上。蘭卡州一句普通相傳的話是，從來沒有冷床’。（見費爾登工廠制度的禍患—The Curse of the Factory System—五至六頁，一八三六年倫敦出版）。（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一卷六八六至六八七頁，及英文資本論一卷三八一至八三二頁）。

就以上三段話看來，便知道無產階級的兒童因作工所受的痛苦遠過於少年及成年的男女工人；然這還是就七歲以至十三四歲的小孩子講的，此外還有四歲至六歲的小孩子也要去替資產階級作苦工。“花邊的製造不是在所謂‘女主人院’中完成，就是在各婦人自己的家中完成的，她們或有小孩子的幫助，或沒有這種幫助。開設‘女主人院’的婦女自己也十分貧窮。工作室就是一種私人的住宅。……小孩子開始作工的平均年齡為六歲，但在許多場所，却在五歲以下。通常的工作時間從早晨八點鐘至晚上八點鐘，內中有一點半鐘作為餐時，然飲食一事出現於不規則的閒暇時間，並且常在污穢的工作室中。當着生意忙碌的時候，工作常從早晨八點鐘，甚至於六點鐘到晚上十點鐘，十一點鐘，或十二點鐘。英國兵營中對於每個兵所規定的空間為五百至六百

立方尺，在軍用醫院中為一千二百立方尺。然在這些工作豬欄中，每人只有六十七至一百方尺【的空間】。同時空氣中的養料為瓦斯燈所消耗。因為要使花邊乾淨，地板上雖鋪有磚或石板，小孩子的鞋仍常被迫脫下，即在冬季，【也有所不顧】。‘在諾定昂常有十四個以至二十個小孩子擠在一間不滿十二方尺的小室中作工，每二十四點鐘內做十五點鐘的工，這並不是不通行的，這種工作的外身因為麻煩討厭和單調無變化已經令人困倦，並且還是在不衛生的狀況中進行的。……甚至於最小的兒童對於工作那種勉強注意和速度，真令人驚訝，他們殆沒有讓自己的手指停止過，也沒有使自己的動作遲緩過。當有事詢問的時候，他們從不使自己的眼睛離開工作，因為怕失去一轉瞬的時間’。工作時間一經延長，女主人便愈加用‘長鞭子’作為興奮劑。‘小孩子們逐漸感覺疲倦，對於自己職業的不自在，就和久稽樊籠的鳥雀望着一個終止期一樣，這種職業既十分單調，又耗費眼力，並且因【作工時】身體姿勢的不變動，使人易於疲倦。他們的工作和奴役是一樣的’。（見一八六四年兒童雇傭委員會第二次報告十九，二十和二十一頁）。當婦女和她們的兒童在家——即現今所稱的租屋，常為屋頂一層的房子——作工的時候，情形更要壞些。離諾定昂八十英里以內的一帶地方即從事於這種工作。小孩子們在晚上九十點離開工場時，常接到一

捆花邊，帶回家中去做。資本主義的偽善者由牠的一個奴僕代表出來，自然用一句滑頭的話來解釋此事，說：‘這是給母親做的’，然他却深知那些可憐的小孩子必須坐在旁邊幫助。（見兒童雇傭委員會第二次報告第二十一和二十六頁）”。（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一卷四〇九至四一〇頁，及英文資本論一卷五一〇至五一二頁）。

四五歲的小孩子因為替資產階級產生剩餘價值而作苦工，已屬駭人聽聞，然尚有一樁萬不能相信而又千真萬確的駭人聽聞的事，就是兩歲半甚至於兩歲的嬰兒也被投入工作室中了!!! “英國枕頭花邊的製造大概在兩個農業區中。……農業勞動者的小屋通常是實行工作的地方。許多製造家雇用這種家庭勞動者至三千名以上，他們大概盡為兒童和少女。在花邊製造中所描寫的情形，在枕頭花邊業中又重演一遍，不過那裏的‘女主人院’在此處改稱‘花邊學校’罷了，此等花邊學校設在貧窮婦人的家中。兒童在此等學校中作工是從五歲——常是更早些——至二十歲或十五歲在第一年中最小的兒童每日作工四點至八點鐘，以後則從早晨六點至晚上八點或十點鐘。‘教室’通常是小屋中平常的住房，為避風起見，特將房中的煙突封塞，人們專靠自己的體溫抵禦寒氣，即在冬季也常是如此，在其牠場所，所謂教室和小貯藏室一樣，沒有燒火的地方。……此等巢窟中常是擁擠不

堪，而空氣的污穢也常達于極點。此外，還有靠近這些小屋傍邊的陰溝，廁所，腐敗物質，和其他污穢東西蒸發的有害的氣味，滲透進來。至于講到距離一層：‘在一個花邊學校中有十八個女孩子和一個女主人，每人只佔三十五方尺【的空間】；在另一個花邊學校中，那種氣味令人忍受不住，內中容十八人，每人只佔二十四個半方尺【的空間】。在這種工業中，兩歲和兩歲半的小孩子都被雇傭作工’。（見一八六四年兒童雇傭委員會第二次報告二九和三〇頁）”。（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一卷四一一頁，及英文資本論一卷五一二至五一三頁）。

從上述各節的事實看來，英國資產階級以及附着這個階級討生活的奴隸們待遇一般男工，女工和童工，殘忍刻薄，暴戾恣睢，真是達到絕頂！英國資產階級的人常泰然自得，稱他們的國家為“快樂的英格蘭”（Merry England）原來這“快樂的英格蘭”裏面是陰風苦雨，是慘霧愁雲，是血肉模糊的殺人場，是嚴刑酷罰的活地獄。馬克思對於此等事實特別寫得詳盡無遺，特別駁得淋漓盡致，于是一般唯利是視的資本家的罪惡便一齊暴露出來了。桑姆巴特常責馬克思只看見人性中壞的和弱的方面，（參看桑氏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五九頁，一九二〇年第九版。—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其實在初期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之下，因工人

漫無組織，不能作強有力的反抗，以致一般利慾薰心的資本家的性格中壞的和弱的方面特別顯著，而好的方面已經無形消滅，因此馬氏自然也無從發覺了。

馬克思的資本論學理的湛深，議論的精當，包羅的宏富，事實的正確結構的雄偉，感人的深遠，在全世界著作中真正是罕有其匹。昂格思說：“世界上自有資本家與勞動者以來，沒有一部書對於勞動者像本書這樣重要。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是現社會全部制度的樞紐，這種關係在本書中才第一次依據學理發揮出來，其持論既澈底，又復銳利無匹，關於這一點只有一個德意志人才做得到。渦文，聖西門和博立葉的著作現在是很有價值的，將來仍是很有價值的，——然一個絕頂却留給一個德意志人來攀登，而近世社會關係的全體從這個絕頂上便一眼望得清清楚楚，這就和一個站在最高山峯上的觀察者望着起伏于他眼前的小山一樣”。（見哥郎瓦爾德馬克思資本論入門一八至一九頁）。此外，洛利亞對於資本論的批評也很恰當；“這部書是一種傑作，書中一切敘述和議論是宏偉的，無匹的，並且令人驚異的——論分析是精密的，全書是莊嚴的，體裁是暢達的，所以作者要表同情于貧民的禍患，則紙上滿布愁雲，作者要斥責有力者的奸邪，則筆端露出憤慨，此外，論學問則淵深廣博，論熱情則如火如荼。在這部書中種種不相容的東西都有一種奇

異的調和，因此我們像在宇宙的神祕創造中一樣，只看見真正的整齊與顯然的紛亂有一種幾乎不可思議的結合；縝密的注意和偉大的組合結合，數學和歷史結合，靜止和運動結合；就此書的一切纖維講，牠好像是超人的勞動和超人的痛苦兩者間一種不可測度的和超越的聯合產物”。（見洛氏馬克思英文譯本六五至六六頁），

資本論的內容，主旨，特點和批評，我們已經講過了，現在再進而敘述此書與昂格思的關係。馬克思因受昂氏金錢的接濟，才能開始著資本論。這是我們所熟知的，但他不僅獲得這種物質上的幫助，並且還獲得精神上的幫助。他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寫信給昂氏，報告政治經濟學批評第一冊的計畫，講及資本一項，說：“在實質上這是第一冊中最重要的一點，我最要徵求你的意見”。（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二卷二六九頁）。至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復向昂氏詢問關於工廠主的蓄積基金（Akkumulationsfonds）的問題，並且說：“你對於這一點（不講理論，專講實際情形），必須予以答覆”。（見同書第三卷三九六頁）。昂格思于是很詳細地舉以相告。（參看同書同卷三九七至四〇〇頁）。因為他久居工商界，深悉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結構，故常能以種種材料和意見供給馬克思，使之演成一貫的理論。當資本論第一卷正在排版之時，他從馬氏處接到此項排印稿，即先讀

一遍，並對於馬氏貢獻意見，給予忠告，無不立見採納。（參看同書同三八一，三八三，三八六，三八七等頁）。他當時且提議俟這一卷出版後，由他幫助穆爾（Samuel Moore）譯成英文。（參看同書同卷三八四頁）。此事雖未能即時見諸實行，但當一八八六年穆爾和阿衛靈共同繙譯此書時，他親任校訂之責故畢竟如願相償。

昂格思對於資本論第一卷助力之處固多，然對於第二卷效勞之處尤不少。當馬克思在世之日，資本論只出了第一卷，迨他將死之前，自知不久于人世，遂將沒有付印之稿交給他的幼女，請昂格思代為校訂出版。昂氏至一八八五年才把資本論第二卷校完付刊，因為這種校訂工作與平常所謂校訂不同，實含有著作的意思在裏面。他在這一卷的序言中說：“這一卷的大部分大抵是些零星碎片的作品，遂使【校訂的】任務難于着手。內中可以直接付印的，至多只有一部分；（第四抄本）；但這裏面的大部分也因新近編輯的緣故，變為陳舊了。書中的主要材料雖大半是關於事實的，然在文字上却未嘗完成；馬克思作草稿時所用的文字：不注意于體裁，應用習慣的——常是極談諧的一熟語，參用英法文術語名詞，有時全句甚至于全篇都為英文；這只是照作者腦筋中每次所發展的思潮紀錄下來的。除掉某些詳細說明的部分外，其他同樣重要的部分都只有些暗示；凡說明事實的材料雖

已徵集攏來，但差不多沒有編排就緒，更說不到完成；在每章之末，因為迫于要做下章，常只有幾句殘斷的句子作為該處的發揮沒有完全的指標；最後有些手稿甚至連作者自己也不能認識。我對於這種草稿，只要辦得到，便以編訂原文為限，關於體裁一項，凡馬克思自己一定要改之處，我才加以改變，關於中間的說明語，和承上接下的語句，如為絕對必需的，而在意義上又毫無疑問，我才予以增補。凡在解釋上最少疑義的句子便逐字逐句刊印出來。我所作的和增補的地方，合攏來尚不滿十頁，並且還是屬於一種如法泡製的性質”。（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三二頁）。

昂格思校訂資本論第二卷費神已經不少，然校訂第三卷，盡力尤多。馬克思這一卷的稿子只是一些堆積的材料和不完全的圖案，還沒有成書的形態，所以昂氏的編輯和增補工程便非常費力。他在此書一八九四年十月的序言中說：“【本篇】第四章只標出一個題目。但此處討論之點為：回轉對於利潤率的影響，極關重要，所以我有自己將此題作就，把全章括入方括符中”。（見昂氏校的資本論第三卷第一冊序言六頁一九二二年漢堡第六版）。然這並不算是困難，還有使他耗費歲月，絞盡腦漿的。“主要的困難點為第五篇，他所討論的也是全卷中最複雜的對象，馬克思恰在此處着手之際，即為曾經述及的一種重病所侵襲。因此這裏沒有留下一

種完備的草稿，也沒有一種圖案可以完成起來，【此處所留下的】，只是一種工程的排場，大抵是由一大堆沒有整齊就緒的標註，批評和規模粗具的材料組成的。我起初想依照我對於第一篇的辦法，把內中的缺略處加以增補，把那些只有暗示的零星碎片配合攏來，使著者意中要說的每一樁事至少大概都包含在裏面，藉此完成這一篇。我對於這種計畫至少嘗試過三次，但每次都遭失敗，因此所損失的時間就為【本卷出版】遲緩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最後，我看出這一條路是走不通的。必須將關於這一方面宏富的全體著作研究一遍，然結果所完成的東西便不是馬克思的書。所以我只好直截了當地以本篇的次序為限，僅加以最不可少的增補，除此以外，實沒有別的法子。因得于一八九二年的春季將這一篇的主要工作弄完”。（見同書同卷同冊序言八頁）。

統觀上述各節，可知昂格思對於資本論的功績非常偉大，二三兩卷幾乎是他自己著作的一樣。阿德雷說得對：“校訂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和第三兩卷，是昂格思送給無產階級最後的大禮物。與其說是‘校訂’，無甯說是一種新創作，他雖十分謙遜——只有大人物才具有這種讓德——將自己對於朋友的著作所費的工作，視為無足輕重，【然在實際上決不如此】。他從【馬克思】遺下的零星碎片，概略，插語和暗示【的草稿】中完成資本論二三兩卷，除他以外，沒有人能夠

跟得上他的奮鬥的同志思想的軌道。【馬氏書稿】材料的大部分，就文字方面講，係急忙草成。這是就馬氏腦子中所發出的思想紀錄下來，未嘗加以整理；有些地方差不多已完全草就，但有些地方僅只有標語，半爲德文，半爲英法文，並且十分潦草，常使人難於認識。要照着第一卷論生產進程的方法，用高妙的手段，描寫資本的流通進程，剩餘價值的起源及其後來的命運，利潤的分爲利息和企業利潤，與地租說的發揮——這不獨是身體上一種最大的努力，精神上的工作也是必需的，並且還要不弱于原著者。只有昂格思才配做這樁事，因爲在生存的人中，沒有一人像他一樣具有【和馬克思】同樣的思想方法，同樣對於最微小之點——如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機輪的結合——的明見。昂氏爲他的朋友作出‘資本論’的最後兩卷就和豎立一塊萬古長存的紀念碑一樣。但用不可磨滅的文字將自己的名字刻在這塊碑上，是他所不願意的。馬，昂兩氏在生平既不能分開，所以世人對於‘資本論’不能單稱爲他們內中一個人的作品，在國民經濟史上必須常稱爲馬克思與昂格思的‘資本論’。昂氏‘對於馬克思所供給的事實上的材料，自己必須作出結論，而又須爲合于馬氏精神的結論’，他對於這些節段雖用方括符和他的姓名起首的字母F. E. 表示出來，然世人却永不能分別那種是馬克思的精神，那種是昂格思的精神”。（見一八九五年八月七

日維也納工人報。Wiener Arbeiterzeitung.)

馬克思的資本論雖是一種最有名的傑作，雖被譯成各種文字，可是世人從頭至尾讀過一遍的，實不多觀。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此書不獨是篇幅繁多，而且極難了解。阿白海默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他的】思想邏輯上的結構體，這種思想有一部分包含在爭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歷史的附錄和客觀的描寫中，其中的容積很大，因此使一般人對於這種傑作很難懂得，而許多人便不能懂得”。（見阿氏馬克思社會學的基本律序言。Das Grundgesetz der Marx'schen Gesellschaftslehre）博洽德（J. Borschardt）以為資本論最初幾部分對於平常人好像是用中國做成的。（參看博氏通俗資本論中文譯本編者序言一一頁）。柏爾也說：“第一卷表現最大的難關。作者為着創造一種名著起見，以極大的努力，使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學說達到一種哲學——一種黑格爾邏輯——的高度，這本是非必要的。作者是以一個精神上角力者【的氣魄】去對付他的對象”。（見柏氏馬克思傳及其學說一〇六頁）。由此可見資本論——特別是第一卷——的難懂已為一般學者所公認。考茨基著馬克思經濟學說一書，意在替資本論作一個通俗本，使人容易領略，然他在序言中偏說：【世人】見解的荒謬無有過于認‘資本論’的體裁是乾燥無味和難懂的。作者從沒有看見一部經濟學著作陳述的清

晰，活現，與體裁的優美，能與此書相比擬”。（見考氏馬克思經濟學說序言六至七頁）。考氏稱讚資本論“陳述的清晰，活現，與體裁的優美”，固然不錯，但因此認牠為並不難懂，却是一種違心之論，果如所言，則他的馬克思經濟學說一書大可不必作了。

資本論的第一卷既“表現最大的難關”，然世人偏只要讀這一卷。如資產階級著名的經濟學教授施班著書指示研究經濟學的方法，開列資本論，僅及于第一卷，就是一個顯例。（參看施氏：國民經濟學的主要學說一七六頁，一九二二年萊比錫第十版）。其實這部書是一氣呵成，互相貫串，互相說明的，如果遺棄二，三兩卷，不窺全豹，對於第一卷的意義便容易誤解，至少也是不容易明瞭。考茨基說得對：“要完全懂得其中的一部分，必須知道全體。沒有第二和第三卷，不會充分了解第一卷，第一卷中有許多【部分】，特別是第一篇商品與貨幣的最大部分，構成二，三兩卷的預備【材料】，比構成第一卷後面的發揮【張本】更多，並且對於了解流通進程比了解生產進程更為重要”。（見考氏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三四頁）。所以要想懂得資本論，必須全讀一遍，切不可蹈一般人向來的積習，僅翻閱第一卷。

“現在讀這部書是每個願意了解現代【社會】發達或願意在其中活動的人不可避免的義務”。（見博洽德通俗資本

論編者序言第一頁)。博洽德這句話是極對的。不過人們一開始，即遇着“最大的難關”，因此我們對於研究此書的方法便有介紹的必要了。

柯格爾曼夫人要讀資本論，覺得起首就很困難，柯氏以此訴諸馬克思，馬氏回信道：“你可告訴你的夫人，先讀‘工作日’‘協作’‘分工’和‘機器’各篇，然後讀‘原始的蓄積’”。(見馬克思與柯格爾曼書三二頁)。馬克思所舉的這幾章大概是講歷史的事實，像其他各章一樣充滿了抽象的理論，所以比較容易了解。然讀完這幾章經濟材料，終必及于理論部分，依照考茨基的意思，即可從頭至尾按步就班地讀下去，(參看考氏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三二頁)。可是哥郎瓦爾德曾擬就一種方法，於讀過上述各章後，依法進行，較便初學。就是：“初學者也要先讀第一卷的起首兩篇，即：商品與貨幣，貨幣轉變為資本。接着讀第三篇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至第九章為止。……于是讀十七，十八，十九，二〇各章，然後讀十四至十六章。最後才讀整個的第七篇”。(見哥氏：馬克思資本論入門一〇頁，一九二二年出版)。此外，考茨基又說：“讀者要是對於講貨幣的第三章發見非常的困難，却不可因此畏縮不前。以下各章比較簡單。這一章有許多議論要到第二第三兩卷才繼續發揮出來。所以讀者起初雖不能一一了解，仍當一直前進，胸中當確有成竹，拿定後

來必再有一次回轉到【原來的】出發點”。（見考氏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三二頁）。

資本論第一卷最有精彩，也最難讀，第二，三兩卷和第一卷比較，不免稍有遜色。然却較易了解，因此可一直讀下去，不必像對第一卷一樣要顛倒次序。可是內中也有很重要的地方與不甚重要的地方，關於這一點，昂格思在致微克忒阿德勒（Viktor adler）的一封信中說得十分詳細，今特介紹如下：

“第二卷第一篇。細心讀完第一章，你對於第二，三章便易爲力。第四章係一種更確切的撮要，第五，六章是容易的，特別是第六章所討論的爲補助事件。

第二篇的七至九章是重要的，第十和十一兩章尤特別重要，第十二，十三，十四，三章也一樣【重要】。反之，第十五，十六和十七，三章初只是供隨意的翻閱。

第三篇陳述重農學派以來第一次所討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和貨幣的總循環，十分美滿——依照牠的內容是美滿的，但依照牠的形態却非常笨拙，第一，因爲這是用兩種不同的方法補綴攏來的兩種編纂，第二，因爲第二種編纂係在病中——此病且使腦子成一種失眠的鋼疾——勉強完成。我本打算將牠留在最後，即於完成第三卷後才來動手。這一點對於你的工作也初非必要的。

現在來講第三卷。

這一卷的第一篇第一至四章是重要的，反之，就全部結構講，第五，六，七章不甚重要，所以用不着花費許多工夫。

第二篇的第八，九，十章十分重要，第十一和十二章可隨意翻閱一下。

第三篇的十三至十五章都很重要。

第四篇的十六至二十章也一樣重要，並且容易披閱。

第五篇的二十一至二十七章十分重要，第二十八章却不甚重要。第二十九章是重要的。第三十至三十二章對於你的目的全不重要，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討論紙幣等等，是重要的，第三十五章講國際匯兌率，也很重要，第三十六章對於你很有趣味，並且容易了解。

第六篇論地租。第三十七和三十八章是重要的。第三十九和四十章不甚重要，然却要一起翻閱，第四十一至四十三章（差額地租二和零星事件），不必多注意，第四十四至四十七章又是重要的，大半也容易披閱。

第七篇很好，可惜是一個無頭的軀像，此外也有因失眠症所遺留的重痕跡。

你此後如果將內中主要的事實徹底研究一下，將不甚重要的略加瀏覽，（最好將第一卷的主要事實預先再讀一遍），對於【此書的】全體可獲得一個人觀，此後對於那些磁

忽的節段也更容易下手了”。(見一九〇八年的爭鬥月刊第一卷三月號二四八至二四九頁，昂格思的一封信。——Ein Brief von F. Engels)

我們對於馬克思資本論的內容，主旨，特點，批評，歷史，和讀法等等，已經或詳或略地講了一遍，在略的地方固然是掛一漏萬，在詳的地方也仍然是徵引無多，所以讀者必須親自去讀此體大思精的著作，才能識其內容，知其真相，而不致貽“道聽塗說”之譏。可是柯洛(Heinrich Cunow)說得對：“沒有辯證法，馬克思做不成資本論。他在此書第一卷第二版的跋文中說，‘歐羅巴先驅報’(Europaischer Bote)的批評者所讚頌的方法不過是一種辯證法，這並非自欺之談，也不是一種空話”。(見柯氏：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及國家學說第二卷三四六頁，一九二一年柏林出版。——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因此，“人們要好好懂得資本論，必須首先徹底思索政治經濟學批評有名的序言”。(見蒲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德文譯本八五頁，一九二〇年司徒嘉德出版。G. Plechanow: Die grundproblxm des marxismus)。即首先徹底了解辯證法的唯物論。此外，柏爾所說的一段話也很值得特別注意，就是：“要懂得資本論，必須記着下列各點：(一)馬克思沒有下永久有效的界說；如資本，工費，和價值等等的

觀念都是歷史的範疇，這就是說，牠們在一定的歷史時代中有一定的意義，在其牠時代中便沒有此等意義。例如價值的觀念在其牠時代中可以只指物品的有用性講；在另一時代中價值的決定可以用一種物品所表現的能效或美麗做標準。但在現社會中，價值是由生產費決定的，而這種生產費，由馬氏用科學的分析，化為勞動。(二)他對於科學上發見的諸原則，視為事物內部的真正的性質，對於與之對峙的實踐，視為事物表面的和由經驗得來的現象；例如價值是理論的表現，價格則為經驗的表現；剩餘價值是理論的表現，利潤則為經驗的表現。由經驗得來的諸現象（價格與利潤）固然和理論有參差之處，但沒有理論，此等現象即不能為人所了解。(三)他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進程在本質上視為不受外界的阻礙與擾亂，視為不受國家和無產階級嚴重的干涉；他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工人爭鬥與工廠立法，與其說是用為限制獨立資本的剝削作用，毋寧說是用為完成生產力的發達。(四)他的心目中總是看着資產階級，不是看着單個的資本家”。（見柏氏馬克思傳及其學說一〇六至一〇七頁）。

末了，我們來講世人對於馬克思資本論所持的態度。德國資產階級的智識界和新聞界中人從前對於他的政治經濟學批評既是一字不提，意欲使之湮滅無聞，（參看本書第二冊三五頁），此時對於他的資本論，也仍舊使用這個老法

子。昂格思從一八六七年十月至一八六八年的上半年雖做過十篇左右匿名的評論，由柯格爾曼，錫柏爾（Siebel）他們兩人替資本論宣傳十分努力，尤以柯氏為最，馬克思稱他的盡力處比全德意志為多）和李卜克內西等介紹登在資產階級的各種小報上，（大報是不得其門而入），却不容易打破他們沉默的態度。當時資產階級的學者只有兩個人出來作批評，這要算是絕無僅有的例外。一為柏林大學的講師杜靈格，一為有名的經濟學者化合。（Julius Faucher）杜氏于資本論出版後，即在“現代研究補編”（Ergänzungsblätter zur Kenntnis der gegenwart）上面對於此書的內容加以詳細的評論，他雖採取一種敵視的態度，並表現不少的誤解，然到底他是第一個發表意見的專門家，不由得馬氏後來不表示幾分謝意。至于化合在他主編的國民經濟與文化史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kulturgeschichte）第五年度二十卷（一八六八年六月出版），上面批評資本論，極為幼稚可笑，他斥馬氏為巴斯楊不肖的門徒。但馬氏夷然不以為忤，並于是年七月二日寫信告訴柯格爾曼說：“化合在他的季刊中嘲笑我的書。這些先生畢竟將自己的忿怒發洩出來，是很好的”。（見馬克思與柯格爾曼書四四頁）。

可是其他專門家仍舊一聲不響，連這種忿怒都不高興

發洩。他們後來看見這樣的抹殺政策沒有多大的效力，才改變一種方式，羣起對資本論加以惡意的批評。關於當時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态度，我們可以用墨爾林的幾句話概括起來，就是：“當一八六七年資本論第一卷——這是世界學術中萬古不磨的稀有著作之一——出版時，雖被世人按照資產階級不忠不信的規矩，私自剽竊，然對於公衆却一字不提，迄至最後隱瞞不住，于是就被科學的批評斥爲一個沒有成熟的自修者錯誤百出的練習作品”。（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一年度一卷七〇八頁，墨氏：馬克思）。

此外即有一，二學者心中十分讚賞資本論，也禁若寒蟬，不敢代爲宣傳。馬克思于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一日報告柯格爾曼說：“德國一個大學的經濟學講師寫信給我，說他完全信服我，但因自己的地位關係，‘和其他同事一樣’，不能形之于口。在一方面這種專門學究的怯懦，在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和反動報紙緘口不言的詭謀，使我受很大的損害”。（見馬克思致柯格爾曼書五三頁）。

上述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新聞記者對於資本論的態度不僅在德國爲然，即在英國以及其他各國也無不如此，馬克思于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寫信給索爾格，說是年六月有一個叫做海德曼的刊佈一本小書，其中“論勞動與資本的兩章不是‘資本論’的摘要，就是一種迂曲之詞，但……既未見

引書，也沒有指出著者，只在他的序言的末尾說‘關於第二，三章的觀念和許多材料，應感謝一個大思想家和自出心裁的作者的著作等等’。他寫一封信向我道歉，內中的意思是‘英國人不喜歡向外人領教’，‘我的名字極爲人所厭惡’等等。此人雖十分‘庸闇’，甚至於還沒有徹底研究一樁事物的忍耐性——這是造學問的第一個條件——然他的小書既經剽竊資本論，即做了很好的宣傳。所有這些可愛的中等階級的著作家——如非社會主義者的話——都是見獵心喜，要因利乘便，從任何種新思想中馬上獲得金錢，名譽或政治資本”。（見倍克，蒂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八〇至一八一頁）。馬克思最後這幾句話真是罵盡古今中外一般藉新思潮作文字投機的人們了！

各國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對於資本論所施的手術猶不止此。馬克思在此書第三卷中說明，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十分發達時，商品的市場價格在供給和需要的影響之下，依生產價格的水平線而或上或下，至於生產價格自身是以價值爲基礎的。迨這一卷出版（一八九四年）後，他們便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一致喊着資本論的第三卷與第一卷互相對抗，互相火碰，其實這是子虛烏有的事。考茨基說得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明，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因力求利潤平衡的結果，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長和

牠們的價值分離，其中一半的價格長在牠們的價值之下，另一半的價格則長在牠們的價值之上，一般反對馬氏價值說的人遂以為他在第一卷中所發揮的學說被第三卷推翻了。可是馬氏要是曾經指出價格對於牠們的價值沒有關係，才算推翻了自己的價值說。資本論第三卷絕未出此，並且證明，被市場價格視作標準的生產價格完全依賴價值律，否則無從解釋”。（見考氏：馬克思經濟學說九三頁）。馬氏說明商品的價值，生產價格和市場價格，源流分明，首尾一氣，那裏有什麼“火碰”什麼“矛盾”呢？

然資本論既是世界學術中一部空前的傑作，自不會因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抵制與誣蔑而消滅下去。自第一卷出版後，銷路雖不甚好，可是不到一年，即被譯成俄文。馬克思對於此事極為高興，于一八六八年十月四日報告昂格思說：“我的書譯成俄文，在彼得堡出版，我聽見這個消息，自然非常歡喜”。（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四卷九五頁）。他于同月十二日寫信給索爾格復說：“數日前，彼得堡一個書店主人給我一個消息，說‘資本論’譯成了俄文，正在排印中，此事殊令人驚訝不置。他要求予以相片，刊在卷首，對於‘我的好朋友’俄國人這種小事不好拒絕。自二十五年以來，我不斷地對俄國人作戰，不僅在德文中是如此，即在法，英文中也無不如此，然他們總是我的‘保衛者’，這是何等的一種

命運。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寄居巴黎的俄國人待我十分和善。我反對蒲魯東的著作(一八四七年)和在洞刻(Duncker)處出版的著作(一八五九年)銷路之大無有過于俄羅斯的。而繙譯資本論的第一個外國民族又為俄羅斯”(見馬克思致柯格爾曼書四七至四八頁)。

俄文資本論雖于一八六八年付印。但因受檢查委員會的檢查，遲至一八七二年春季才得發行。雷士列說：“當一八六八年十月初間，馬克思與高采烈地告訴我，說‘資本論’第一卷已譯成俄文，在彼得堡付印。他對於俄羅斯當時的運動甚為重視，每說及該處人士為着研究和傳播理論上的著作而受的大犧牲，以及他們了解近世觀念等事，深致敬意。當俄文‘資本論’從彼得堡達到他那裏的時候，他和自己的家人及朋友都視此事為一種重要的時代指標，而開筵慶祝。”(見新時代雜誌第十一年度一卷七五二頁，雷氏：一個工人對於馬克思的回憶)。俄國人士自繙譯資本論以後，更進而灌輸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俄國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受這種學說的陶冶至三、四十年之久，故能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開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業。馬克思及其家人朋友于接到資本論的俄文譯本時，視此為一種重要的時代指標而至於開筵慶祝，這便是於不知不覺之中，替他的主義將首先在俄國獲得實現的機會，預為誌慶。

當俄文資本論發行之際，法文譯本第一卷第一冊也出版了。法文本的銷路勝過德俄文本，因為第一版印刷一萬本，在出版之前即定去八千本，（俄文本第一版只有三千本，德文本的數目不過一千本左右），而書的內容復經過馬克思的修改，較德文原本為完善。他在一八七五年四月這個譯本的跋文（第一卷至是年才出完），中說：“我既擔任這種校訂工作，便覺得須在原文——德文第二版——的基礎上加以擴張，將各處的說明弄簡單些，完全些，並加入一些歷史或統計的補充，和批評的註釋等等。這個法文版即使有文學上的缺點，然牠於原本之外，具有一種特別學術的價值，應為一般懂得德文的讀者所利用”，（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一七頁）。法文資本論既較德文原本為完善，所以考茨基於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二六年所刊佈的民衆版資本論一、二卷，都將法文本改善之處採入了。

資本論的英文譯本出現於一八八六年。在十年之中，歐洲幾個有文化的主要國家都有這種名著流行，因此對於工人階級也發生不少的影響。特別是在德國的成績尤為優良。“此書的根本思想很迅速地表現於工人階級演說家的講演中和政論家的論文內，並且由千百種途徑間接侵入羣裏面。老倍克在先驅報（Der vorbote）上鄭重宣言：‘我們將盡力之所能及，使此處【資本論中】所表現的寶藏成為一切被壓

迫者和被剝奪承繼權者的公共財產’！德意志兩個互相爭鬪的工黨的領袖們爭先恐後地替這種著作宣傳。李卜克內西的機關報‘民主週刊’ (Das Demokratische wochenblatt) 登載【資本論】序文，——於許多徵引和評註之外——昂格思的兩篇論文，雷慈根的燦爛的評論，(四續)，和昂氏所作的馬克思傳。當德意志工人聯合會在努連堡開第五次聯合會時，(一八六八年九月五至七日)，施維協爾和李卜克內西從資本論引出證據，‘而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在這種論證之前，即無能為力，只好默不作聲’。拉塞爾派的領袖‘石衛茨’在金德工人聯合會的機關報上從這種著作的議論中作出十篇論文，並宣言‘當文明世界有一種經濟科學的時候，此書將成為研究的對象。’這個聯合會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的漢堡大會特邀請馬克思為與會的大賓。邀請書的日期係七月六日，因為要經過聯合會執行委員二十人的署名，此書遂走遍全德國，至於邀請的理由是因馬氏的著作‘對於工人事業所獲的’‘非常的功績’。大會對於石氏所宣讀的馬克思的回信‘鼓掌接受’。【按馬氏因故不能與會，特回信致謝，並指出大會應將爭取完全的政治自由，規定工作日，以及工人階級在世界史的大任務中有計畫地國際合作等項列入議事日程中。石氏在開會詞(八月二十四日)，中談論這種著作。……布拉克(Wilhelm Brücke)于八

月二十日的第二次大會上也講到‘馬克思的著作’。(見耶贊諾夫主編的馬克思與昂格思叢刊第二卷四四〇至四四一頁，一九二七年佛郎克佛出版)。資本論既這樣受德國工人階級熱烈的歡迎，所以馬克思在一八七三年一月德文本第二版的跋文中很高興地說：“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的廣大範圍中迅速地獲得了解，便是我的工作最好的報酬”。(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跋文四〇頁)。

此外，其他各國的工人階級對於本階級“理論的聖經”(引昂格思語，見馬克思與昂格思叢刊第二卷四四五頁)。也是一樣的歡迎。當馬克思之世，“資本論變成各國社會主義者的讀本，一切社會主義和工人的報章都將牠的淵深的學說通俗化，當紐約發生一種大同盟罷工的時候，有人採取這種著作中的章節印成小冊子，藉以鼓勵工人，使之堅持到底，並對他們證明他們要求的正當”。(見新時代雜誌第九年度一卷四一頁，拉氏：回憶馬克思)。

就上述各點看，各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何等重視資本論，尤其是民主週刊所載雷慈根的“燦爛的評論”，(見一八六八年八至九月份報)，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因為雷氏不獨為馬克思的朋友與同志，(德國寬恩人。生於一八二八年)，並且是一個製革匠，為真正工人階級出身的作家，(他僅受過中學教育，於一八四九年亡命美國後，有時猶做製革

匠)，他的議論，表現這個階級迫切的需要，今特介紹其中數節如下。

雷慈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首先感覺本階級的人對於智識的提高與資本的認識，是一種切要之圖，所以他說：‘我們階級中人畢竟開始一致了解，我們如果長久令他人給予一點知識，便長久有人要藉這種精神上的優越，來從軍予一種物質上的剝削。一個願意參加本階級自救工作的工人第一種需要在乎不仰給於他人所給予的知識，而倚賴自己的知識。關於特別的，單個的知識，我們可以讓諸專家。至於資本是我們在社會爭鬥中有力的共同敵人，認識資本是一種普遍的階級利益，這是每個人應有的任務’。（見哥爾瓦爾德：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附錄二六至二七頁）。

他於是介紹馬克思及其作品道：“作者將明鏡與光明送給我們，不是要使我們信仰，而是要使我們觀察與認識。一種巨大的工作橫在我們的前面。這不是爲着日常利益，爲着市場及其投機者而創造的工業生產品。這也不是出於虛榮心與炫耀我們耳目的學者裝架子的作品。這是一種工作。大家從此看出牠是一種注於堅決愛的生活的結果。這種愛又不僅是從過去著作與現在生活的廢料中挖出此等知識的寶藏，加以洗刷與改造。牠除掉對於事業的熱烈心腸外，還具有一個優越的頭腦，一種邏輯精神不可抵抗的鋒芒，一個

天才思想家稀有的才能，一個學識超越和訓練有素的研究者不感疲倦的辛勤。……現在接近人類——特別是現代，尤其是工人——的，無有過於目前物質生活品的生產進程。作者將對於這種進程的認識及其定律的研求，作為他的目的，我可以說，作為他的終身任務。此外，他所論的不是單個的事件，不是我，你或他獲得日食的問題，而是我們，是民族，是國際的勞動組織”。（見同書二七至二八頁）。

雷慈根於這樣鄭重的介紹之後，復進一步說明資本論的性質道：“可是大家不要誤會這句話，以為這種著作是討論何種計畫，討論關於應當出現的制度的私人意見。這種著作是一種科學——指這個名詞最高的意義講——的產物。科學所討論的只是現有的事，只是可由事實證明的事，不是計劃，即使是計劃，也只限于牠們是實際存在，並侵入科學中間的。國際的勞動組織不是未成的，而是現成的。我們的生活是間接倚賴自己勞動的生產物，直接依賴國際的勞動生產物，俄羅斯的五谷，荷蘭的魚，美國的棉花都在我們的消費之列，由此證明我們從事生產不是運用孤立的勞動，而是運用共同的社會勞動。現在每個人都知道，這種勞動的外表不是一種共同的勞動，而是一種私人的勞動。然科學的任務就在經常地指出，外表是欺幻的，例如大陽並不繞地球而行。政治經濟學科學的任務在乎認識現今私人組織的勞動

的社會性。馬克思在他的批評中已經將這種任務的解決向我們提出來了”。(見同書二八頁)。

雷慈根接着又以淺顯的文字，介紹資本論的內容，對於生產進程大略加以說明，他的結論是，凡不懷成見的讀者都會相信，“社會問題不僅為工人階級的問題，並且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主要問題”。(見同書三五頁)。

工人階級中的智識分子認識資本論的深刻與歡迎資本論的熱忱，可以由雷慈根續文為之代表。我們試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於資本論所持的態度比較一下，便發見牠們是互相對抗的，這是源于階級的利益，本不足怪。然真理之為物有如皎日，終不會因陰雨裏的障礙而失其光明，凡明敏的科學家也決不因階級的成見而無所察覺。試觀達爾文對於資本論的意見，即可見一斑。

當德文資本論於一八七三年第二版出書之後，馬克思特贈送一本給達爾文，即引起達氏的共鳴，特於是年十月一日回信說：“承賜大著資本論，謹謝厚意。深願我更能了解經濟學各深奧和重要的問題，以期無負此次的餽贈。我們研究的領域雖不相同，然深信我倆志在鄭重傳播學術，而這種學術終必造福於人類”。(見新時代雜誌第十五年度二卷七五三頁，阿衛靈達爾文與馬克思)。

十九世紀只有兩個最偉大的科學家對於人類有絕大的

貢獻，即達爾文與馬克思。前者發現生物界的發達律，後者則發現人類歷史的發達律。達氏對於馬克思及其著作既具有如此熱忱與敬意，現在第一要問馬氏對於他和他的著作持一種什麼態度，第二要考究他們兩人學說的異同及其關係，因為世人對此每多誤會，值得我們在此處特別提出來。

當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的名著物種原始出版之後，馬克思讀了大為讚賞，他于是年十一月底寫信給昂格思說：“我現在正讀達爾文【的著作】，真是名著。結局論（Teleologie）在一方面尚未被攻破，此時却破產了。關於證明自然界的歷史發展，從來沒有這樣大規模的企圖，更少這樣的成功。至粗率的英國方法，自然必須除外”。（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二卷三六四至三六五頁）。至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又對昂氏說：“此書雖是粗率的英文發揮的，然却含有我們見解的自然歷史的基礎”。（見同書同卷四二六頁）。他在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致拉塞爾的信中復說：“達爾文的著作十分重要，自我看來，恰為歷史的階級爭鬥中自然科學的基礎”。（見拉塞爾書信與著作第三卷三四六頁）。他後來在資本論常引用達氏的學說，並稱讚物種原始為“開新紀元的著作”。（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二八八頁）。此外，昂格思于闡明他們所主張的辯證法時也說：“自然就是對於辯證法的一種實驗，我們必須反覆申明，近世自然科學對於這

種實驗已經供給一種極豐富並逐日堆積的材料，因此證明自然界的運動畢竟是辯證法的，不是玄學式的，牠不是在永遠一成不變中往復循環，而是經過一部真正的歷史。在此處當首先提出達爾文他證明現今全部有機的自然界——植物和動物，人也在內——是幾百萬年繼續發達進程的產物，因此予玄學的自然觀以一種最有力的打擊”。（見昂氏：從烏託邦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達三〇頁，一九〇年柏林出版）。

馬克思和昂格思上面這些話表現他們對於達爾文及其著作也具有同樣的熱忱與敬意，並且認和他們自然的學說可以互相發明這是確切不移的。所以阿衛靈說：“世人以為達爾文的學說與馬克思的學說互相抵觸，而天擇說與社會主義的見解尤不相容，其實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進程中邏輯的結果，而達爾文之說則為社會主義最有力的科學的幫助。馬克思深識達氏的全部著作”。（見新時代雜誌第十五年度二卷七五二至七五三頁，阿氏：達爾文與馬克思）。考茨基也說：“達爾文與馬克思的並行不悖不是新的事實，他們兩人的學說極為相近。各人都在爭鬥中找着發達的鎖鑰，達爾文求之于生存爭鬥，馬克思則求之于階級爭鬥，達氏在自然界中所發現的運動律和馬氏在社會中所發現的運動律都源于同一運動律”。（見同書第十三年度一卷七〇九頁，考氏：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達爾文與馬克思所處的環境不同，所研究的對象亦異，而結果却殊途同歸。還有一層，他們生平同樣受人誹謗，他們開新紀元的著作于同一年中出版，（參看本書第二冊三四八頁），而“終必造福于人類一點也為彼此同具的自信心，這要算是十九世紀兩個最大的偉人一段佳話了。

我們在本書對於馬克思和昂格思的著作雖儘可能地一一加以介紹，然特設專章來討論的，只有共產黨宣言與資本論。有好些人會將馬克思的生平分作少年與老年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以為少年馬克思是革命家，共產黨宣言為之代表，老年馬克思是進化論者，資本論為之代表。對於馬氏這樣劃分時期，並將革命與進化對抗起來，固屬愚妄，然資本論與共產黨宣言的面目的確有些不同，例如共產黨宣言極力主張無產階級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而資本論則從未表現無產階級專政的語句，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關於這一點，柏爾說得簡單扼要，今特徵引如下，作為本章的結束。他說：

“革命與進化對於馬克思並不是對抗。……共產黨宣言進化的色彩不減于資本論或政治經濟學批評，反之：資本論革命的色彩不減于共產黨宣言。

此事怎樣講呢？

……凡讀馬克思著作的人，必須首先了解這種著作所討論的是什麼：牠是討論一種客觀的進程——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的分析——還是討論無產階級的活動。

經濟的進程是進化的材料，無產階級及其領袖的活動是革命的變化。

在共產黨宣言或共產黨的講演中，無產階級是討論的對象。因此革命的關鍵提到前列。馬克思在此處表現為革命的思想家。

在資本論中，資本主義的經濟是討論的對象，因此進化的關鍵站在前面。馬克思在此處表現為經濟發展的剖解者。

黑格爾在他的邏輯 (Logik) 中對於思想的理性所演的任務——即矛盾達到頂點——馬克思則加之于有階級覺悟和犧牲精神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便從生產條件中發生出來的無產階級的階級爭鬥達到頂點。

因為馬克思和黑格爾一樣，矛盾的互相衝突與對抗的達到頂點是生命的發展和宇宙各種力量的充實最有效的手段。

進化而輔以革命的手段：即社會經濟的認識與社會革命的行動——這就是馬克思的遺囑”。(見柏氏：社會主義與社會爭鬥通史第五冊四三至四四頁，一九二三柏林出版)。

蘇聯關於價值學說的爭論

彭章秋

在哲學上犯了極明顯極嚴重的錯誤，被列甯與樸列哈諾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波格達諾夫，其反動的哲學體系雖然久已為馬克思主義者所唾棄，然其錯誤的經濟學理論，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羣衆中，都仍保持了很大的力量。一直到無產階級專政存在數年之久，其著作仍極風行一時，而波格達諾夫與斯結班諾夫共同所著的“政治經濟學課程”一書更是蘇聯從上至下一切教學的範本。還是在國內戰爭停止，蘇聯無產階級由直接的武裝鬥爭，轉變為和平的經濟建設，因之在思想上亦開始重新估量各種理論體系，加深各種理論研究之時，波格達諾夫在理論經濟學上所犯的錯誤及其所形成的反動作用，才被發現。因之在政治經濟學上發生了同波格達諾夫派的鬥爭。

波格達諾夫在經濟學上所犯的錯誤，經過了這次爭論，現在已十分顯然，不需要我們此時再來詳加追述。他主要的錯誤是：他把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擴大到全人類的經濟發展史，甚至全人類的社會發展史上，他不了解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生產關係；誤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範疇為“超歷史性”的“固定”的範疇；最後，更以機械論代替辯證的唯物論，看輕抽象的理論分析等等。

波格達諾夫之所以這樣迅速的被攻擊下去，其原因是因為在哲學上早已失掉其立足地，然波格達諾夫派小組織在政治上所進行的反動的孟塞維克的活動，更是縮短其壽命的重要原因。

當馬克思主義者已發現波格達諾夫經濟理論的錯誤并宣佈與之作戰之際，乃有蘆彬的“馬克思價值學說”出現。(1923)。從它降生的時代，即可認識它所負的歷史使命。自然，它是此次鬥爭的產物。它的根本任務即在於擺脫舊日波格達諾夫派的錯誤與偏見，以正確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精細的深刻的研究并闡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價值論。是的，在這一本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已經部份的執行了此種任務。他正確的指出了經濟範圍的歷史性，摺絕了波格達諾夫之固定範疇論，此外，他更確切的釐明了理論經濟學的對象，指明政治經濟學為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經濟

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科學。這一本“馬克思價值學說”的出現，我們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者戰勝波格達諾夫派後的尾聲，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新的基礎上更深進的研究和解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基本問題的嘗試。在這一本新的嘗試中，除去上面我們所指明的幾點積極方面之外，自然也露出了許多消極方面——錯誤和缺點。因之，戰勝卜格丹諾夫後之新的經濟學方面的鬥爭，也就從批評和糾正這本“價值學說”而重新發動起起來。

爭論的發端本是關於價值論與抽象勞動等問題，然而爭論的開展漸漸的跳出了價值論的範圍，問題的中心亦漸漸轉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一般的對象與方法論等問題。自然，經濟學的對象與方法論等問題和價值論問題之密切貫連，乃是此次爭論轉變之根本原因。

的確，鬥爭是一切前進的“動力”，批評乃是發現真理的武器。因指摘和糾正盧彬在價值學說中所發揮的錯誤而興起的此次論爭，結果不但是使一般的讀者審慎的研究了這一些問題進一步認識了這些問題，並且“價值學說”的作者在本書第三版出世時也公開的承認了并糾正了不少自己過去的錯誤，例如，在過去他曾堅決的說：“抽象勞動只有在市場交換的實際行動中才得出現”，“抽象勞動係在市場交換的行動中降生”，“沒有交換的行動就不存在有抽象勞動”等

等，可是在第三版時他就另換一個面目來說話了，此地他說：“當然，勞動在交換行動以前也佔有(預先的與意想的)抽象勞動的性質，不過也只有經過交換，(才得表現)，因為在生產的當兒已經就預定了交換，並且在生產產品時已經就與一定數量的貨幣相比較”(見“價值學說”第三版 158頁)。關於價值的內容問題，因為有許多人的批評和指摘，作者也糾正不少原來的意見，此外，他更感覺到在第二版的概論中所發表的：“流通範圍所消耗的勞動也創造價值與剩餘價值”的理論，完全不合乎馬克思主義，所以，也就全部刪去了。

雖然“價值學說”的作者，在本書第三版時，這樣的更正了自己的錯誤，對於自己的批評者作了這樣大的讓步，然而，一般的對於盧彬的批評與指摘，並不因“價值學說”第三版出世，而停止。恰恰相反，新的攻擊更因此而愈加激烈起來。如果說：過去只是指摘和糾正其在其幾方面的錯誤與缺點，現在都是進一步的批評和攻擊其整個的理論體系了。如果說，過去還只是認為作者在某些方面的偶然錯誤，現在都認為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整個理論的根底了。

可惜我們不能詳細的將參加此次爭論之各派意見一一介紹過來，僅能把主要的兩派(實際上參加鬥爭的意見不只

兩派，可以說三派，關於爭論的主要問題，作一個簡單的概括的敘述。因為這次在經濟學方面的鬥爭和哲學上的鬭爭一樣，參加的份子特別複雜，派別也特別紛紜，如果想在這一篇文章中將這複雜的各方面一一敘述清楚，不僅是困難，簡直是不可能。

爭論的發端與焦點是價值論。因此我們也先從價值論談起。

抽象勞動是馬克思在價值學說中之一偉大發現，同時也是馬克思價值學說之重要問題之一，因此，他們對於此問題的意見紛歧，便造成他們對於整個價值論的觀念的不同。

什麼是抽象勞動呢？抽象勞動在馬克思的價值學說中究竟佔若何置呢？其與價值之形式與內容諸問題究竟有若何關係呢，

盧彬在“馬克思的價值學說”一書之價值的形式與內容一章中，曾指出“抽象勞動不僅是價值的創造者，並且是價值的實質和內容”。當他敘述勞動與價值的區別時，曾說：“勞動不是價值，只是價值的實質。然為使得到價值的全意，勞動之為價值的實質應視之為與價值的社會形態有不可分離的連繫”。另外還說，“社會的平均勞動，在商品經濟之下，即成為抽象勞動的形態，並且也只有從此抽象勞動之中，必

然的產生出勞動生產物的社會形態：價值”，“所以抽象勞動這一概念我們應視為價值的基礎，內容與實質”。

從上面的話中已經十分顯然的看出，盧彬認價值之實質與內容為抽象勞動。抽象勞動係商品經濟下的社會平均勞動，係創造勞動價值之唯一因素。

但是價值乃是社會勞動的表現，資本主義人類社會關係的表現。勞動生產物的社會形態，交換形態，即是價值的形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曾說：“商品之社會形態與價值形態或交換形式，這三件都是一樣的東西”。勞動生產物之社會性(交換)既為價值的形式，則作為價值的實質(或內容註)的抽象勞動究竟是怎樣一個範疇呢？於此而聯繫到馬克思哲學之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問題。作者根據黑格爾的哲學觀點(馬克思在哲學上一般的是繼承黑格爾)，認為內容與形式，決不能成為兩件截然不同的東西。內容自身發展并培育形式，形式則內在地包涵於內容之中。所以，社會的價值形式係由價值的實質(或內容)自身成長起來，換話說：價值形式的社會性係由價值內容的社會性出發。沒社會性的價值內容，無從產生社會性的價值形式。因此為價值內容，構成價值唯一因素的抽象勞動，毫無疑義的應視為帶有社會性的歷史範疇了。由此而得出盧彬對

(註)按盧彬語，實質與內容都是一樣的。

勞動的定義是：抽象勞動係在一定社會形式下（資本主義經濟所特有的社會形式）的社會平衡勞動，既不是簡單的生理勞動，也不是一般的平衡勞動。抽象勞動的存在只限於資本主義的交換社會，資本主義的滅亡，抽象勞動這個經濟範疇，也就隨着完全失掉其意義。

然而，盧彬的發揮並不盡於此，在抽象勞動一章中他更繼續引中的說道：“馬克思幾次的說，價值係社會的現象，價值的實質（存在）帶有單純的社會性質，其中沒有含有半點物質的因素，因此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亦宜視為社會的範疇，其中我們不能找到半點的物質因素”。“我們或者是認為：抽象勞動係人類的力（生理的意思）的消耗，那末價值就是帶有物質的性質的東西，或者是認價值為社會現象，因之抽象勞動亦應視為社會的與一定的社會生產形式不可分離的現象，兩種意見可任選一條。”“對抽象勞動之生理的認識決不能與其創造價值的歷史特性相調協”。

價值係單純的社會現象，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亦是社會範疇，其中不含有半點物質因素。這是盧彬之最根本的思想。

估在盧彬對方的哥恩（Akou）與辟桑諾夫（Bessonoff）等對此問題的意見如何呢？他們認為“抽象勞動即是一般的人類生理的力之有用的消耗”。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之區

別，依哥恩的話講來就是：“抽象勞動是在以下的關係上不同於具體勞動：具體勞動係在一定生產部門下，生產一定的使用價值的勞動，抽象勞動則係帶有一般性的勞動，除掉各個具體勞動所包含的一切特性的勞動”。

抽象勞動即是單純的人類生理的力的消耗，其中沒有含任何社會的特性。所以哥恩更進一步的承認：抽象勞動並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為使勞動能創造價值，則此勞動不僅是抽象的，並且還要是社會的，即在一定條件（即商品資本之條件下）所完成出來的勞動。所以抽象勞動（即生理勞動意思），其本身僅只是一個邏輯的範疇，而不是歷史的範疇。哥恩說：“創造價值的勞動才是歷史的範疇，然并非因其為抽象勞動，而是因此抽象勞動係構成於一定社會形式之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抽象勞動表現價值，作為商品的價值，在有組織的社會之中，例如，共產社會之中，則在計算全社會的勞動力，及向各生產部門分配時，公開的出現”。

勞動的社會方面（或社會勞動），不能與其物質生產隔開。所以，創造價值的勞動也應包含着不同的兩方面：一方面他是社會的勞動（構成於一定社會形式之下），另一方面是生理的勞動（抽象勞動），而生理勞動則構成價值之物質基礎。所以，抽象勞動價值之基礎，同時是價值之實質。“價值係由抽象勞動（指生理的意思）所造成，然為使勞動創造價

值，則此勞動宜不僅是抽象的，並且是社會的，（註一）。

哥恩攻擊盧彬最力之點，係指責盧彬機械的將物質之生產與其社會之特性分開，誤認勞動的創造者，勞動價值的實質就是單純的社會性，不含有半點物質因素的社會性。其實構成價值的勞動永遠會有物質的與社會的兩方面，既是物質的勞動（生理的），同時又是社會的勞動（一定條件下）。“物的社會性是交換關係表現的唯一形式，而交換社會之生產關係，成了物之社會性的唯一內容”。（註二）物質的生產過程與其社會性兩方面之矛盾的一體，乃是政治經濟學之基本範疇——價值——之固有的特徵。撇開了物質基礎，單純的將社會性作為價值之唯一內容，這是根本的脫離開唯物論的立場，由機械論轉到唯心論。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關係於社會必需勞動諸問題。

一般講來，社會必需勞動之大小，係由該社會之一般的生產技術的狀況及生產力發展之一般水平來決定，所謂生產力之一般水平，係指生產機關之全結構，在此生產機關中之各種不同技術形態之互相關係。只有注意到該社會所應用的各種生產技術，才能正確的決定生產力發展之一定階

（註一）見哥恩著“政治經濟課程”，現此書為蘇聯一切教學範本。

（註二）見哥恩著“新經濟學方法論”，中譯本126頁

梯。所以，所謂生產物的價值並不是說生產物品時之每個人實際的具體勞動的消耗，而是生產該物品時所需要之一般的社會必需勞動。此種由社會必需勞動所決定的價值，馬克思即稱為市場價值。此市場價值即因同一部門之各個生產者的相互競爭而成立。此外，因不同生產部門間的競爭，因不同部門間資本之相互對流，而造成各個生產部門間的利潤率的劃一，由利潤率劃一而創造的價格，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價格（在常態的情形下，市場價格和生產價格相等）。由此看來，社會必需勞動直接決定着市場價值，間接規定着生產價格。然而社會必需勞動究竟如何來規定，其數量之大小究竟如何來計算呢？

盧彬認為決定該部門商品之市場價值的社會必需勞動，係該生產部門中在生產的數量上最佔優勢的那些企業。譬如說，該生產部門中51%以上的商品，都是應用最高生產技術的企業來生產，那末，社會必需勞動的大小，大部份係由那些最高技術的生產力來決定。市場價值則與這些企業之實際的勞動力的消耗相近。假設此佔優勢的企業為中等企業，則調劑市場價值，規定社會必需勞動的大小者為中等企業。在最低的生產技術佔優勢的情形之下也是一樣。所以，社會必需勞動時間的決定者，也許是最高技術，也許是最低或中等技術，這全要看該時生產力的狀況如何，及在該

生產部們中所佔優勢的企業所應用的技術如何而定。

哥恩反對盧彬此種決定社會必需勞動的方法。認為此種以某一部份企業調劑市場價值，決定社會必需勞動時間的方法，是與馬克思的所謂“以生產的全結構決定社會必需勞動”的方法，相背謬。此外他更指出此種方法的無確定性與不科學性。例如，從51%至99%都可以說是數量上的優勢。如果說其生產品佔99%的一些企業能夠完全支配市場價值，決定社會必需勞動時間，可是隨其所佔分量之逐漸減低（如從99%——80%——70%——51%）則其所形成之作用亦逐漸變小。以數量看來，雖然51%與99%都是佔着所謂優勢，然兩者的作用則大相懸殊。這是一點。

此種生產佔優勢的企業，雖然在決定社會必需勞動的時間上是比較形成稍大的作用，然其他企業的作用也是同樣重要半點不可忽視。例如，設51%的生產品為中等技術的企業所生產，則此中等技術的生產力對市場價值的影響上有相當大的作用，然市場價值究竟如何大，主要的還應當看其餘49%的商品究竟為何部所生產，設其餘的商品為最高技術的企業所生產，則社會必需勞動時間的大小表現一種樣子；設其餘的商品為最低技術的企業所生產，則社會必需勞動時間的大小表現完全不同。所以此種以單一的佔優勢的各企業來決定社會必需勞動時間的方法，盧彬自己雖然

聲言已注意了生產之全結構（蘆彬說是生產上佔優勢係從計算生產全結構而得，所以這已經是注意全結構了），然而實際上仍只是注意了其全結構的一面（即從全結構中提出了數量比較優勢的一方面），對於全結構之其餘的各方面，是完全拋開掉或忽略掉了。所以，他此種方法無論怎樣都不能說是科學的。

哥恩一面指出他這種以某些企業代替生產全結構的片面性與不科學性，同時提出了他那簡單的計算全部生產的數學方法。他說，無論在何種情形下，社會必需勞動的大小係等于全部個人勞動消耗（在生產上）的總數（在一定生產部門之下）以生產物的總數除之。即：
$$\frac{\text{勞動消耗總量}}{\text{生產物總量}}$$

自然，哥恩此種簡單的數學公式，也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適用，此種條件就是：該生產部門全數商品所實現的價值，正與實際所消耗的勞動量相等。換句話說：實際所消耗的勞動（價值）與實現的勞動（價值）兩者間沒有任何數量的差別，市場價值正與全部個人生產的勞動價值相等。

此種條件在^①一般的工業生產上，可以說完全存在着，因為，一般講來，工業生產物之總價值正與全部個人生產的勞動價值相等。然而在農業上就不能通行。

因為在農業上有等差地租的存在，所以，農業生產物之總價值永遠不與生產農業品時所消耗的總勞動量相等。實

現的價值永遠高于實際的勞動價值。這就是說，農業生產物市場價值的決定者，不是如哥恩所說的以生產品總數除個人勞動消耗的總價值的方法，然也不是如蘆彬所說的：可以由高等技術或中等技術來調劑的方法，而是完全由于生產力最低企業部份。

蘆彬曾以此而攻擊哥恩，說哥恩的方法在此不能適用，其實，蘆彬自己的“優勢”說，在農業的生產上又如何能夠通行呢？

在農業上因為有土地的壟斷，所以發生地租，因此，農業資產階級要多一筆無抵償的消耗，這一筆無抵償的消耗也只能以提高農業生產物的價格的方法（所以，農業生產物的總價值恆高于其實際所消耗的勞動力，市場價值的決定者不是其佔優勢者，而是其生產力最低的企業），來找到補償，這就是工業與農業在生產條件上之根本的異別。這也就是馬克思的價值學說不可機械的運用（並不是不能應用，只是不可機械的運用）在農業上的原因，蘆彬似乎不宜以哥恩的公式不能直接通用于農業而完全否定其意義吧？

將前面兩問題作了個簡單的敘述之後，現在我們再看一下在方法論問題上哥恩對蘆彬的相互指摘。

前面已經講過，在價值論抽象勞動等問題上，蘆彬曾將

物質的生產與社會性機械的分開，并以簡單的社會性作為價值的實質與內容。在方法論與對象等問題上，他一樣的將生產過程與其社會形態，嚴格的劃分為兩件獨立的東西。他談生產過程與其社會形態，兩方面都可以各自獨立的成為特殊的科學。另外還說：“政治經濟學不是研究生產過程的物質技術方面，而是其社會形態，亦即創造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人類生產關係的總合，生產技術與生產力之可以列入經濟理論的研究範圍，只是作為背景，作為起點，因為這些背景與起點在解釋我們研究的真正對象——人類生產關係——上是必要的”。另外還繼續的說：“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正是研究生產關係的不同形態（社會的經濟的形態）。

由此我們看到，蘆彬將生產過程與社會性劃分得清清楚楚，認兩者都可以成為互不相關的獨立科學。而政治經濟學則是研究其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的人類生產關係的科學。至于此人類生產關係從何研究起，具與生產力與物質生產過程有何緣係，他却簡單的說：生產力為前提，為起點。

自然，理論經濟學的對象決不與機械學或其他自然科學一樣，他所研究的也決不是技術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任務係指明資本主義生產中之人和人的關係。

然而，資本主義的特徵，乃是人類生產關係之非直接的表現，而是內在的包涵于物質生產過程之中。物質生產本身

(生產過程)構成并涵育一定的生產關係。所以馬克思說：“生產不僅是製造物質生產物，并且還不斷的複生產着人類生產關係，在此生產關係中進行生產品的生產”。(資本論第三卷)。

所以，我們說，物質生產過程，生產力，不僅是與生產關係有密切的聯繫，有相互的影響，他們彼此間已組成辯證的矛盾的統一，成爲整個兒的一體。其彼此間的關係卽如同一體中之不同因素一樣。只有在一定社會形式之下研究物質生產，方能窺見該時代物質生產之真諦，同時也只有在物質生產之中，才能看透真正的社會關係。因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并不是獨立的浮面的現象，而是化身于物的特性之中，內含于生產過程之中，所以，爲了解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理論經濟學應研究那些爲生產關係所化身的物質範疇，物質因素，因爲這些物質因素正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表現的唯一形式。

所以哥恩很正確的說道：“馬克思永遠是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之下研究物質生產。他認爲，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體系以及全體系中之各個連帶，同時既是物質的範疇，又是社會的範疇。將社會關係的全結構推到交換方面的盧彬，却認爲生產只是技術過程，生產關係則只是社會的而非物質的現象。生產關係對於他不是內在形式，而是獨立的現象，生產關

係只是與生產和技術前提有聯繫，而不是生產過程的一定方面’。

盧彬機械的觀察一切現象，認一切物質的現象都不是社會的，反之，一切社會的現象也都不是物質的。所以他將生產過程嚴格的與社會關係劃開，想從生產過程以外研究社會關係。他這樣以交換代生產，以社會現象解釋社會現象的企圖，真有傾向于西歐資產階級社會學派的危險。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是一般的社會生產的歷史的一定形態。後者（一般社會生產）既是人類生存物質條件的生產過程，又是在特殊的歷史經濟關係所產生的生產過程，又是這些關係的複生產，因之又以此種過程的主持者的生存與互相關係的物質條件，——即生產過程的一定社會經濟形態，因為在這些關係的綜合之中，這些過程的主持者，遇到了其對於自然及彼此間的相互關係，在這些關係之中方能進行生產，而此綜合，恰好就是以經濟結構的觀點所認為的社會”。

馬克思認社會是這樣一個複雜的綜合體。而生產關係也是連繫于整個連環中的一個因子。盧彬想將這維繫各方面的生產過程與人類的生產關係隔開，並使之對立起來，這在方法上是怎樣的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最後，我們說，盧彬的“價值學說”在反對波格達諾夫

的陣線上是盡了相當的功績。然而就在這當中又暗伏了他另外一方面的錯誤。如果說波格達諾夫是不能將物質的生產過程與其社會形態聯結起來，認生產為超社會性的東西，可是蘆彬却又發展了另外一個極端，他離開物質生產以外來研究生產的社會形態。本來機械論者的邏輯只允許其發展于相反的一方面。或是根本否定物質生產，或是根本否定社會形式，他們不知道將這矛盾的對立，融為辯證的一體，所以，此次在經濟學方面的論爭，歸根究底仍不外是方法論方面哲學基礎的論爭，不真正了解辯證法之基本原則，則對其任何科學知識，不會有一正確的認識。

所以，我們可以說，此次在經濟學方面的論爭，不外是唯物辯證法在征服各種理論體系中因遇到新的荆棘與障礙而引起的肉搏與苦戰。不外是在總的哲學鬥爭以外的一支別動隊。你們相信，唯物辯證論者此次在經濟學上所給與一切機械論者的打擊，不僅是奠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礎，並且是唯物辯證法在各科知識中建立權威的一個明證。

馬克思價值說的基點及其與李嘉圖學說之區別

(續)

盧彬著 代青譯

(三)

馬克思的價值論

我們已知政治經濟之一切基本概念，是表現了物化的人的生產關係。就此而研究價值論，則我們的任務，是在於證明價值是表現：(1)人的社會關係(2)採取物的形態(3)和生產過程相連繫。

價值亦如其他政治經濟的概念一樣，初看起來，好像是就物之性質而論的。當我們觀察交換現象。見有市場上之每個物件和一定量的他種物件相交換；或在發展的交換條件

之下，則與一定量之貨幣(金子)相交換。此貨幣在市場上是可以購買任何種的東西的。(自然，要視貨幣之多少而定)。此貨幣之數量，或物之價格。是大概依市場之景況，而每日皆有所變動的。今天市場上感覺羅紗缺乏了，一星期之後，其數量在市場上增多了，而超過了平常應有範圍以上，則其價格每碼又落至二元七角半了。如此每日價格之動搖及偏差，如繼續到若干時期以後。則會變成平均的程度，即中等價格，以上例言之，則每碼等於三元，即為中等價格之標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此種中等價格，非以生產物之勞働價值為比例的；而是那所謂“生產價格”為其標準，此種生產價格是等於某種生產之生產費加上所投資本之平均利潤。自然，為分析簡單化起見，現在暫不提及資本家製造羅紗，是由於僱傭勞働這一事實。馬克思的方法，是對各單個生產關係形式加以分別與研究，此各個的生產關係之形式，只有在他的總和中，才能表現出資本主義經濟之畫圖來。現在我們只研究一個商品社會中人與人間生產關係之基本形式。即是研究各個形式上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據上述，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只是羅紗這個東西是商品生產者所預備拿到市場去交換或賣給其他的商品生產者。我們此地所說的社會，是指商品生產者的社會，或即所稱為“簡單的商品經濟”，其和複雜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是有區別的。在簡單的商品

經濟條件之下，以勞働價值爲標準的勞働生產物之中等價格，是市場價格動搖不定中之中等水平，並且，社會勞働若是比例地在各不同生產部門中加以分配，而各不同的生產部門因而得維持有均衡之狀態，則在此情形之下，市場價格是和這個中等水平相符合的。

凡每個以分工爲基礎的社會，社會勞働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之一定的分配，是必有的。每個分工的制度，亦就都是勞働分配的制度。在原始共產主義公社，在父權的農家族或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各經濟單位的各份子的勞働是預先有計劃地按各集團份子的必要，及勞働生產力的程度，在各個工作間加以分配。在商品經濟【社會】中，沒有人去調節各生產部門間及各企業間勞働的分配的。任何一個的羅紗匠，都不知道有多少羅紗是當時社會需要的，以及有多少羅紗在當時全體羅工生產中製造起來。因此，羅紗非供過於求（過剩生產），即求過於供（停滯生產）。換言之，社會勞働的數量，非過多，即不足。羅紗工業及其他生產部門之均衡，遂漸以破壞。商品經濟是經常破壞均衡的制度。

然既如此，則商品經濟如何，能成爲相互調擠的各生產部門之總和而繼續存在呢？商品經濟之能夠存在，只是因爲每次均衡之破壞，都引起了趨於復原傾向。此均衡復原之傾向，是市場及市場價格本身機構之特性。在商品社會中，任

何一個商品生產者，都不能命令其他一個商品生產者擴大或縮小其生產，然以其自己對物的關係，影響別人的勞働行爲，(他本身並不知道)使別人擴大或縮小生產。羅紗之過剩生產以及其所引起價格之下降，低在價值以下，使羅紗匠縮小了生產。如在停滯生產情形之下，則相反的過程，也就發生了。市場價格與價值之偏差，是過剩生產及停滯生產所藉以剷除，及國民經濟中此一生產部門與他一生產部門間均衡的復原傾向所藉以創立的一種機構。

所以，兩種不同商品按他們的價值的交換，是和此兩種生產部門間之均衡狀態相符合適應的。因而此一部門的勞働，流入他一部門，即停止了。然既是這樣，那末很顯然的，兩種商品按他的價值的交換，是平均了兩個生產部門中生產者的生產利益，而由此部門轉爲他種生產部門之動機，也因而消除了。在簡單的商品經濟社會，此種在各種不同生產條件的生產各部門中的平均化，是表示：商品生產者所消耗於國民經濟的各部門中的勞働之一定量，由他給與了生產物以同一的價值。市場上之商品的價值，是與生產所必需的勞働量，成正比例的。設在現在生產技術狀態之下，三碼羅紗。平均需要三小時的勞働（消耗在原料，生產工具中的勞働，亦計算在內），而一雙長靴之生產，平均需要九小時的勞働，則羅紗匠與長靴的匠勞働之平均化——即三碼羅

紗與一雙長靴的交換，是與羅紗生產及長靴生產間之均衡狀態相符合適應的。

但價值若是決定於商品單位的生產所必需的社會的勞働量，則勞働量本身，是要依勞働生產力而不同的。勞働生產力之發展，縮短了社會必需的勞働時間，而降低了商品單位之價值。例如，機器之應用，可以使長靴之生產，由以前之九小時，變為六小時。如此可使其價值由九元降低至六元。（假設一小時長靴的勞働，——此地我們是以平均計算的——創造一元之價值）。廉價的靴鞋，開始侵入於農村中，排擠土製的靴鞋了。靴鞋之需求，遂增高起來。而靴鞋之生產，也擴張起來。因而在國民經濟中生產力。發生了一部分的重新分配。所以，勞働力生產力之發展，引起了勞働生產物價值之變遷，而價值之變遷，便又影響到各生產部門中社會勞働之分配。“勞働生產力——勞働價值——社會勞働的分配”——這是商品經濟之“格式”在這個商品經濟社會中，價值是在國民經濟的各生產部門的勞働分配的比重之不斷偏差和破壞中，起調節之作用的。

價值論是研究交換的公律，物在市場上之對等化的公律的，而其研究只是因為它們和商品經濟中生產的公律，勞働的分配是互相連繫的。每次兩個商品的交換的對等，是說他的總平均起來的對等，並不是說那偶然的市場價格的對

等，這個對等，是和生產力之一定狀態及此等商品的各生產部門間勞動之分配之一定狀態相符合適應的。經過物——勞動生產物——之對等，在市場上發生了那成爲分配在各生產部門間社會勞動的總和之一部分的各種具體勞動的對等，故凡那以爲價值論是只限於研究物之交換的相互關係的學說的流行觀念，是錯誤的。經過了物之對等的規律性，價值論是要去發現出勞動均衡的規律的。然因此以爲馬克思的價值是研究勞動對物的關係，即對勞動生產物的關係。這種意見，也同樣是錯誤的。勞動與物的關係，是表現之於某種勞動之具體的形態及某種具體的物之中的。——這是技術的關係，而價值論所注意的，不是這個。價值論研究的對象，是勞動在分配過程中之各種各式的關係。而這個分配，是經過了物（勞動生產物）之交換關係而成立的。如此，則馬克思的價值論，始完全滿足上章所分析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之總的邏輯方法的要求——這個馬克思經濟學說所研究的，非物與物間之關係，亦非人與物間之關係，而是研究由物而連繫起來的人與人之間之關係。

我們已經分析了對於馬克思的價值論之理解的思想之一般情形了。按批評家們的見解，馬克思在資本論之第一頁，是以在交換中兩個商品相等的事實的判斷爲出發點，並以物在市場上之對等化，若沒有該物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消

耗的對等，則是不可能的。此種對馬克思學說的觀念，根本上是錯誤的。馬克思的引為出發點的，是從商品社會及其各單個商品生產者的生產關係之特性來的。蓋因生產之無政府，故生產力及各種勞働之分配的諸變遷，不能不表現之于市場上的商品之交換比例之變遷上面來。人的勞働活動之諸變遷，必然要採取在商品價值的變遷形式。此種“勞働價值的規律，是為商品社會之顯著的特點。我們試設想今有社會，具有正常的勞働的平均化和分配，而此社會中之各份子又具有把生產物按任何原因去交換的權力，則此社會所表現之現象，完全和發生在商品社會中的交換，別是一個樣子。在後者社會，交換是在再生產過程本身中，而在前者社會中，交換之發生，是在生產的外面的。【此時】交換不調節勞働之分配，而其本身，交換亦不為“勞働價值”的公律所調節。若是這樣一個社會中，去考察什麼交換的規律性，那末，無論如何，都找不出與社會勞働的分配的規律性有關的規律性來。我們知道：勞働價值的公律，並非從物之對等的交換這一事實的本身發生出來的，而是從在商品生產中此種之特徵的社會功能中發生出來的。所以。我們是找價值的社會形式的。在商品社會中，價值是執行了調節社會勞働的分配的作用的。然價值的此種作用，是從商品經濟中技術的特性，還是從社會的特性生產出來呢？即是說，是從牠的生

產力狀態還是從該社會特有的人的生產關係的形式中產生出來的呢？提出了這個問題，充分足以後者的意思（即社會的特性——譯者）給這個問題，以一個答覆。不是一切的社會勞動的分配，給了勞働生產以一個價值的形式，只是那不是由社會直接指揮的，而是經過了市場及物之交換而間接調節了的那種社會勞動之分配，給了勞働生產物以一個價值的形式。在原始共產主義公社或在封建的鄉村中。勞働生產物之有“價值”(Price)是就有用性(Utinity)的意義而言的，即是說就使用價值而言的，而不是“價值”(Value)。商品社會之發現後者，只有在該社會之生產，是專為出賣，而且是客觀地並正確地在市場上取得了“估價”(這個估價，是由金錢使生產物與其他一切商品相等，因而予貨幣能與其他任何商品相交換的特性)的情形之下，才可能的。換句話說，價值是表示經濟(商品經濟)之一定形式。各私有企業形式之下的勞働組織之一定形式，並非勞働之為勞働者，他本身給與勞働生產物以“價值”，而是組織於一定的社會形式(商品經濟形式)中的勞働，給與了勞働生產物以“價值”。如果生產者彼此間是互不相依的，而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則他們的勞働生產物是以“價值”在市場上對立起來的。經濟主人公及買賣生產關係中對立人的商品生產者之形式上平等，是表現在勞働生產物的對等，即價值的對等化上面。物之價

值是反映了人與人間生產關係一定形式。

如果勞働生產物只有在勞働組織之一定的社會形式之下，才發現了價值，則所謂“價值”者，便不是指勞働生產物的“性質”，而是指勞働生產物在各生產者中起連環似的作用即是執行他們間生產關係之“中間人”或“紹介者”之一定的“社會形式”或“社會機能”而說的。自然，初看來，好像價值簡單只是從物之性質來說的。假如我們在說：“有色的，圓的，槲皮的棹子，值得二十五元的價值”，則此地指出了棹之四種性質，這是可以證明出來的。然我們試一想想，則可斷言說，棹之前三種性質，和第四種的性質，是截然有別的。前三者是指出棹子是一物質的物。因為棹子是人類勞働的生產物，所以這些性質，是棹子的具體的勞働的生產物，這些性質又告訴了棹子勞働之技術方面之一定狀況。有經驗的人們常是按照椅子的這些性質，或立起生產在技術方面的畫圖來，而得有原料，輔助品，技術方法以及木工的技巧等諸觀念。然因他們對於棹子，未加以詳細考察，所以這裏他一點也不理解棹子生產者與他人間的社會生產關係。同時，他也不理解，這個生產者是否獨立的手工業者，工藝者，僱傭勞働者，或是社會主義公社的份子或是爲自己而製造的木匠。至於說“棹子價值二十五元”這一句話所表現的勞働生產物的性質，則完全不同。這句話是表示出：棹子是一

個商品，他是爲市場生產的，牠的生產者是以商品生產者的生產者和社會的其他份子相連繫的，經濟有一定的社會形式，即是商品經濟的形式。我們一點也不去理解生產的技術方面或物的本身，然而却理解生產的社會形式以及參加於生產中的人。這即是說，價值者，不是論物而是論物所由生的人類社會。這不是物之性質，而是由物所表現的“社會形式”，物之能夠表現，因爲人類是經過了牠而進入了他們相互間的一定的生產關係。價值乃“社會關係物化之結果”，乃表現于物的性質形式中的人與人的生產關係。商品生產者的勞働關係，或社會勞働“物化”或“結晶”于勞働生產物的價值。這即是說，勞働組織的一定的社會形式，給與了勞働生產物以特殊的社會形式。馬克思的價值論，不是研究勞働和勞働生產物間之關係，而是研究勞働的社會形式及勞働生產物的社會形式間的關係。“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働 正確些說；決定〔Setzende〕交換價值的勞働，是勞働之特別的，社會形式”它“創造財富，即交換價值之一定的社會形式”

馬克思論“價值形式（這個價值形式是勞働本身一定社會形式的結果）的學說（即是論採取勞働生產物的社會形式的學說）是馬克思在勞働價值說中所引伸于經濟學中之特有的新學說。勞働創造價值的理論，在馬克思很久以前，即

（注 Zur Kritik, P. B. ）

已明顯提出過了，然馬克思的價值論，所發現的却是完全是另外的一種意義。馬克思指出了生產的物質技術過程及其社會形式間，技術方法（具體的）之總和的勞働及從它的社會形式方面觀察的勞働（抽象的或一般的勞働）間之正確的區別。商品經濟的特點，是在於社會所生產的物質技術過程是無組織的，且是形成爲個別的商品生產者。具體勞働，同時就是個人的部分的勞働。各個別商品生產者的部分勞働，和其他一切的商品生產者的勞働之能連繫而成爲社會的勞働，只是在於他的勞働生產物，在市場上和一切其他的商品相等化那時候。此種一切商品之市場上的相等化，表現在它的估價中，這個估價，又是以一種商品——金子（貨幣）來表現的；我們知道，這種市場上相等化，即是表示一切消耗于國民經濟部分中的具體的勞働之相等化，這即是說，個人的部分勞働之帶有社會勞働的性質，並不是在於生產過程中，然而是在於交換行爲中，從各種物及勞働的各種形態中的具體的特性抽象化而來的。各種形態的勞働的相等化（平均化）經過了一切勞働生產物在市場上的相等，即是價值，這即是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勞働的概念。因爲經過了物之相等的勞働相等化。是從商品經濟社會形式中發生出來的。在這個的商品經濟中，是沒有直接的社會組織所以，勞働的相等化，即抽象勞働，是社會的和歷史的概念。抽象勞働所

表現的不是各種形態的勞働之生理的均等，而是各種形態的勞働之社會的均等，並在勞働生產物之市場的均等的特殊形式中，即在價值中表示出來。

馬克思的價值論之特點。是在於他解釋了：何種的勞働創造了價值。“馬克思研究勞働創造價值，是從他的性質方面開始的，第一次就指出了：何種的勞働，何以並怎樣形成了價值，第一次就指出了：一般說來，價值不是別的，是這一種的結晶勞働(註1)所以馬克思在闡明“勞働之兩重性質”中，即以此為他的價值說之中心部分。(註2)

所以，勞働之兩重性質，是表現了生產之物質技術過程及其社會形式之間的區別。此種區別，我們在前章已說明過，是整個馬克思經濟學說之基礎，亦即是馬克思的價值論之基礎，從這個基本的區別中，劃出具體勞働與抽象勞働的區別來，而首先反映之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之對立性中來。在資本論第一章中，馬克思是從相反方向分析起。他開始從市場現象，從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之對立分析起。他是從現象表面的對立，而更深入，探討勞働之兩重性質，具體勞働和抽象勞働，以便在第一章之末，及在論“商品拜物教”這一部分中，找出了由生產的物質技術過程所表現的社會形式。

註1 恩格斯：資本論第二卷序言

註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八頁 馬克思與恩格斯書信集P168

馬克思的分析是由物經過了勞働，而後及于社會，由目擊的現象而後去找出應由科學分析而發現的那些現象。然而馬克思證明的過程，是和他在資本論第一章的分析的過程相反的。他是從生產過程及其社會形式間的區別，從商品經濟的社會結構，而證明到勞働之技術的及社會的兩重性；以及商品之兩重性，——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在資本論的膚淺讀者看來，必以為馬克思是在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的對立中來觀察物的性質之如此這般。（即以為馬克思是在研究物的性質之是為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譯者）（柏白爾及其他許多的批評家，便是如此了解。）而實際上馬克思所要研究的，是物之“物質的”及“機能的”存在性間，是勞働生產物及其社會形式間，物及與物相混合的，即經過物的介紹而表現出來的人的生產關係間之區別。

然則，我們便由此可見馬克思的價值論，和他在商品拜物教分析中之總的邏輯方法的基礎，是有深刻而解不了之連繫了。價值者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表現于物的性質形式中的生產關係他並與社會勞働分配相連繫的。或者，從現象之別方面來說，價值者，是每個商品生產者的勞働生產物能在和生產力程度及社會勞働之均衡的分配相適應之一定的比例中與其他任何商品生產者的勞働生產物相交換的一種器量。在我們面前，所看見的，是一種採用物的性質的

形式的，在和生產中勞働分配過程相連繫的人的關係。換句話說，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種物化的人的生產關係。價值中勞働的物化，是那證明商品社會中人的生產關係物化之不可避免的拜物教學說中之最主要的結論。勞働價值說所說的，並非勞働的物質擬固品，例如物中之生產成分，勞働生產物等，不是這在一切歷史系統中都有的，及為價值之技術前提的現象，不是他的來源，而是在物之價值中之拜物教化的，物化的人的勞働關係的表現。勞働之“結晶”或形成于價值中是在下列意義之中：即是他採取了社會的“價值形式”，他是在這個形式中表現出來。(Sich darstellt)。馬克思在分析抽象勞働及價值的關係時，常常引用後者的用語。馬克思的批評家們，不了解他的勞働價值說和他論人之物化或拜物化的生產關係的學說間之不可分離的連繫，而把馬克思的價值論，從機械自然主義的意義，而不從社會的意義去了解，我們對之只有驚奇。

所以，馬克思的價值論，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的：(1) 建築在價值形式論——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社會生產關係之物的表現 (2) 建築在社會勞働分配說及價值之大小與勞働生產力之發展有關說。此為同一過程之兩面；價值論是研究價值之社會形式，此社會形式是在由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勞働分配過程表現而來的，“在這個形式中表現了在

這種社會結構裏面的勞働之均衡的分配，而社會勞働之連繫，是存在各個人勞働生產物部分的交換之形態中，——這樣一種的形式，即是這些生產物之交換價值”。（註1）所以，價值和生產的社會過程之社會形式。反和牠的物質技術之勞働的內容，同時發生連繫的。如果我們還記得價值是和其他的經濟範疇一樣，所表現的，不是一般的人之關係，而是人之生產關係，則上面所述這一點，也就很顯然了，勞働是組成價值之“內容”或“本質”——馬克思這句話的表現，是指明說，勞働生產力之發展及分配過程，在商品社會中，是由價值之社會形式中表現出來的。價值之神祕的“本質”（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曾受人非難）：實不過是發生于一定社會形式中之物質技術的勞働過程而已。（注2）從他的形式抽象化出來的，作為價值之“本質”的勞働只簡單是勞働消耗，不論勞働組織之社會形式如何，都是一樣的。勞働在這一方面說來，僅是價值論之前提，勞働消耗，亦是價值論研究之對象，——此勞働消耗，非直接表現於社會勞働的單位中的，而是表現于拿來和某商品作交換的勞働物之數量中，亦即是說勞働消耗，蓋採取一種商品價值形式。然而，從另一方面說來，價值的社會形式，應由一定的物質技術的勞働內容

（註一）馬克思給古格爾孟的書信。

（註二）見前章論本質與形式之對立。

所充實；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價值形式，亦如其他的“經濟形式”，或“形式之一定性”(Formbestimmtheiten)一樣，是把它當作生產的物質技術過程之有組織的社會形式來研究的。唯其馬克思之研究價值，是把牠當作受勞働組織之一定的社會形式所限制的勞働生產物之社會形式來研究故將價值之質量的和社會學的方面——抽象勞働放在第一位。唯其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發生了勞働生產力之分配與發展的過程，發生了“勞働的社會總和中之定量勞働”(注3)的運動(它須服從於“嚴格比量與嚴格關係的鐵律”(資本論卷一頁334)，故價值現象之數量的，亦許可以說，數學的方面，實有莫大的意義，大多數馬克思的批評家，其基本錯誤則在於(1)他們不十分懂得馬克思的價值論之質量的，社會學的方面；(2)他們只限于從數量方面，去研究交換比量，即物之價值之數量的相互關係，而忽視在他的基礎之上，社會勞働之數量的相互關係，及分配在生產的各部門及各企業間的數量的相互關係。

(注三)是從馬克思給古格爾孟的書信中引出來約。

(四)

馬克思與李加圖

現在說到馬克思的價值論與李加圖的價值論之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建立如下之總的立論：馬克思之爲

李嘉圖的繼承者，是在論價值內容這方面的，而不是在論價值形式這一方面的。馬克思之承繼李嘉圖的，是商品價值量之變遷對於勞働生產力變遷之依賴說，然而對於價值的社會形式之了解為人的生產關係之物的表現這一點，則馬氏並不是從李氏傳留下來的。馬克思之新的，社會學的方法，改變了研究之對象：從研究價值之物的性質，改變為研究採取物的形態之人的社會生產關係。

我們已知，馬克思論價值形式的學說，其基礎即在他自己所明白指出的：生產物質技術過程及其社會形式間之區別。至於李嘉圖則因價值的社會形式不在其心目之中，因而此種區別，是沒有的。李嘉圖的價值論之別于馬克思者，是為：(1)生產的物質技術過程與其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間，無所區別(2)因而對於勞働之兩重性——技術方面(具體勞働)或社會方面(抽象勞働)——無明白之了解(3)不了解價值之社會形式，乃勞働組織一定形式之後果。此數點在邏輯上是互為連繫的，今試就各點，加以考察。

(a) 生產過程及其
社會形式

古典派政治經濟學，是工業發展自由的衛兵，他以為工業之新的資本主義形式，是理智的和“天然的制度”，而以此和舊之封建的，行會的及商人的組織對立起來，以為這

些是非理智的和人爲的【制度】。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古典經濟學者看來，是以爲他是“怎樣地天然的，必需的制度，好像生產勞動本身一樣”（資本論第一卷）他們以爲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是“社會生產之永遠的天然的形式”。（資本論第一卷 P 49, 497）。現社會之社會形式，變成了“絕對的生產形式及天然律”了。（Theorien, III, P. 282, 492）經濟範疇，却從歷史的，一變而爲永遠的，從社會的，一變而爲天然的了。從現存的生產社會形式而發生的經濟公律，却認爲是對生產的物質技術過程而存在的了。

生產的物質過程，一旦不可分離地和他的社會形式相吻合，則其間矛盾之不可能，那是當然的，“資產階級的，正確些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李加圖認爲是生產之絕對形”；故對於牠而存在的生產關係之一定形式，是不以爲其能陷入矛盾或爲其生產之桔桔的”（Theorien III. 54）馬克思這幾句話之足以肯定：生產過程及其社會形式之區別，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及其經濟學說之總的出發點，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在李加圖看來。生產力是與生產關係同時並進，故其間之矛盾，是沒有的。在馬克恩看來，生產力是在某現存生產關係之內發展，經常衝出牠的界限，而企圖破壞牠。

b) 勞働之兩重性

生產過程及其社會形式之同一化，遂使勞働之技術方

面及社會方面間的區別即在具體的與抽象的勞働間的區別之明白指出，成爲不可能了，李加圖指出了價值是由勞働決定之思想，然而是何種的勞働呢？正確說，是勞働之那一方面呢？他對此問題，就沒有答案。夫物之有價值，並非因此物是勞働生產物，乃因他是組織於商品經濟社會形式中的勞働生產物。——這一點李加圖並沒有說到。勞働兩重性之明白了解，李氏是沒有的。‘古典派政治經濟學，無論何處都不會直截完全指出在勞働間（像他所表現之於價值中及本身中的）之顯著的及自覺的區別。因爲它已是同化於生產物之使用價值中去’。（資本論第一卷P.48）。李加圖“混合了”勞働之兩面了。（Therien III P.164—5，資本論第一卷 P.48，176.）。此種把勞働之技術方面及社會方面的混合遂使它首先就注意去抽出那目所易見的第一方面，而忽略了勞働組織之社會形式。李加圖“不懂得勞働成爲價值要素之特別形式。即是不懂得：唯一的勞働應成爲一般抽象的；並且是在其社會勞働形式中”。（Theorien III.P.163,164）

羅遜白格對於馬克思本身所最認爲有決絕意義的，就是李加圖對於抽象勞働的概念，無明白之了解這一點，乃無一言提及。羅氏對於“何種勞働創造了價值”這一問題，在提出以後，却以爲此在馬克思李加圖之間的區別，是在於一爲論社會必需勞働，一爲論生產勞働。然此種區別，在其整

個的重要性而言，較之具體勞働及抽象勞働之基本區別，是其次要焉者。只有馬克思的抽象勞働的概念，是像通常所把它了解成爲生理的意義時，羅氏在此情況下，才算是對的。實際上，此觀點是難以分別出馬克思及李加圖對於勞働的了解之原則上的區別。若是說李加圖是從數量方面去考察決定價值的勞働，則其對於勞働各種形態之一般生理的一致之了解，那是無疑的。在生理意義上抽象勞働之了解，不但對於李加圖，是顯然的，即佛蘭克林（資本論第一卷 P. 47, —98, Zur Kritik P. 38），亦是如此了解的。然對抽象勞働了解爲勞働組織之特別的社會形式，在此形式中，“勞働各種形態，之質量一致或均等，是經過了勞働生產物之市場的相等化，——這理論是馬克思價值論之特點，而別之於古典派以及李加圖的價值論。

(c) 價值形式

馬克思所徹底指出生產過程及其社會形式間，具體與抽象的勞働間之區別，使其有可能發展他的論社會的“價值形式之理論。這個社會的“價值形式”，是由勞働生產物表示出，它表現了人與人間（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間）之社會生產關係之一定型式，價值形式的學說，是馬克思在勞働價值說中，比起李加圖，所新引伸獨創的新學說。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基本缺點之一，是在於他無任何時候，都不能從商品分析

中，~~部分說來~~，即是從商品價值分析中找出了價值形式，這個價值形式，是給與商品以交換價值的性質”（資本論第一卷P 48）。價值形式之了解，是有決絕的意義，因為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最一般之形式，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藉他以分析出社會生產之特殊狀態，同時亦為歷史上之特徵”（資本論第一卷 P 48—49）。沒有對於價值形式之了解，則對於該社會——即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及其各種經濟形式：貨幣形式，資本形態等之正確了解，亦是不可能的。（全上）“價值形式”是表示：在商品社會中，人的勞働消耗，是採取價值形式——勞働生產物的性質，而勞働消耗之數量變遷，是採取物的價值之數量的變遷形式。人生產關係“物化了”。“價值形式”的理論，是揭發了價值之真實的，社會的天性，此非物之性質，而是人的生產勞働關係之物的表現。勞働消耗若是採取物的價值形式，則價值形式是連繫勞働生產力之發展及勞働生產物價值量之變遷的中間一環。李加圖抹殺了中間一環而連繫其兩端之二環；他觀察商品交換比例之變遷，認是勞働生產力發展事實之直接的，天然的結果，從技術方面，加以觀察，而獨立於生產之社會形式。因此，勞働是為生產之技術的因素，而價值是物之性質。這樣，價值由表現人與人間之社會連繫的，和經過物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形式，一變而為物的性質——它不過是勞働生產與勞働間之技術連繫

的結果，不過是生產之因素了。李加圖揭發了隱在價值量變遷基礎之中的勞働生產力發展之技術的事實，然而他却注意到爲什麼這個技術事實採取了這一種的價值的社會形式。他從價值中找出了勞働，知道他是價值之技術的“內容”或“實質”然而他却沒有說明到：爲什麼勞働却採取了社會的“價值形式”。

我們現在說到初看起來好像正確的結論，此結論在馬克思的批評家們的意見中，至爲普遍。這個結論，就是以爲李加圖與馬克思間之基本區別，恰恰是在於後者的學說，是以勞働當作價值之實質。按他們的意見，李加圖提出了商品價值量之變遷，是依賴他的生產的必需勞働量之變遷這一理論，至於價值本身之天性或實質這一問題，李氏未曾提及。至於馬克思，則不以研究價值現象之連繫的原因爲已足，乃又指出說，勞働不僅決定價值，而且即是價值，而爲價值之實體或本質，這種馬克思論價值實質之形而上的學說，按他們的意見，即認爲是馬克思之新引伸于價值論中之新學說，而以爲此新學說是比李加圖的價值說更壞了，而不是變好了。馬克思批評家的這種見解，是可以下列不正確觀念解釋之：即他們好像馬克思所見于勞働中的，是有何種的價值之形而上的實質，他的物質的實體。我們已知，這種勞働與價值間關係之自然主義的見解，是離馬克思很遠的。勞働

是價值之“內容”或“實體”這一句的意思，僅僅是指：在價值變遷中，其基礎即是發生于生產的物質技術過程，發生于勞働生產力之發展中之變遷而已。這一方面的現象，自己已經指出者，適是李加圖，所以，他和馬克思之基本區別，是在論“價值形式”之學說，而非論價值之“內容”啊！

這個問題，馬克思自己也說過。按馬克思之話說，李加圖在各地都直接指出：“勞働即是各種商品所藉以相等，一致之所在，他的實質即在于他的價值基礎內面。然而只有在何種勞働形式之中，才是這種的勞働，他却置而沒有研究到”。(Theorien III.P.163)。李加圖“完全沒有從價值形式方面，即從勞働當作價值實體所採取的一定形式方面，去研究價值，却僅僅研究了價值量而已”(Theorien II, P. 12)。馬克思在論商品拜物教那一章中，實質上，也是說出這個思想，特不過是把實質這一名詞，改成內容這一名辭罷了。“對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過——雖然是不夠的——價值與價值量並揭發過隱存在這些形式的內容。然而他並不下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這種內容，採取了這樣的形式，換言之，為什麼勞働表現於價值中，而勞働之延續力，是勞働生產物的價值量中的尺度”(資本論^P 47—48)。換句話來說，古典派證明了，勞働是價值之內容，馬克思却還要說明：為什麼勞働採取了價值形式。古典派之錯誤是：他們之揭發

現存的社會形式之物質技術的基礎，是以爲這固定的分析，而非爲繼續下去的分析。至於馬克思的目的，則在於揭發在生產力發展之一定階段上的物質技術過程所表現的社會形式之發生及其發展的公律。

這個古典派及馬克思確定方法之深刻的區別，表現了經濟思想發展之不同的及必然的階段，他們的科學的分析，是“從發展過程中之已成結果中出發”(R.I.43)。是從已成立並已結晶於周圍的實際東西中（價值，貨幣，資本，工資等）的那些許多社會經濟的形式，加以分析。當人們企圖把這些形式不當作歷史上的性質，那末，這些形式即獲有社會生活天然形式之鞏固性了，人們之揭發這些形式，是認爲牠是不變的東西，故只去求其內容而已。（全上）。古典派們，不去分析該社會經濟的形式，而僅僅把它的內容，他的物質技術基礎揭發出來就算了。他們在價值中揭發出勞働，在資本中揭發出生產工具，在工資中揭發出工人生活資料，在利潤中揭發出勞働發展的生產力所產生的生產物的剩餘。他們是從已成的社會形式出發，並以此已成立社會形式當作生產過程之永遠的，和天然的形式。他們不論到社會發生的問題的。在古典派經濟學看來，“創造地去發展各種形式，是沒有什麼益處的，他們只希望引導這些形式，經過了分析，而走入他們一致之道，因爲古典派經濟學之從這些形式出發，是

把它當作已成的前提的”。古典派們在他們已從現存的社會經濟形式，引出了他的物質技術的內容以後，他們就認為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終止了。然而他們所終止自己分析之處，即馬克思之所以繼續分析之點。馬克思不囿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圈子中，把它當作許多存在的和可能的經濟的社會形式中之一個，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來：爲什麼這種的物質技術的內容，在生產力發展之一定階段上，却採取了這種的社會形式。馬克思問題之邏輯方法立場是這樣：爲什麼勞働採取了價值形式，生產工具採取了資本形式，工人生活資料採取了工資形式，勞働生產力之發展採取了剩餘價值之增大的形式。他的注意力，是傾注於經濟的社會形式之分析，是傾注於它的發生及發展公律之探討，是傾向於它的各不同諸階段中形式形成(Gestaltungsprozess)之實際過程”。(全上書)。馬克思此種創造的方法，是與古典派之分析的方法，相對立着的。我們是已知了的，馬克思此種的創造方法之特性，不僅是在它的歷史特性，而且是在它之爲社會學的性質，在於它對於經濟的社會形式研究之深刻注意。古典派把現存的社會形式看做固定的，由此做出發點來揭發他的物質技術的基礎，作它的主要的企圖。至于馬克思，則是從生產的物質過程的狀態，從生產力的程度做出發，而企圖說明生產的物質過程所表現的社會形式之發生及其性質。由

上述說來，馬克思主要注意點，是在一般的經濟形式及其部分價值形式。

d) 價值與勞働生產力

如果價值形式是馬克思價值說之主要的部分，而別于李加圖，則價值量是依賴于勞働生產力之發展之說，馬克思在這一點上，是李加圖之繼承者。如果價值現象和生產的社會形式之間的連繫，為李加圖所未曾研究，則價值現象與生產之物質技術過程之連繫，是為他的注意點，而為他的價值論之中心。如果馬克思的價值論，可稱之為社會生產的，則李加圖的價值論便可稱之謂生產的了。李加圖的價值論是論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價值量依賴于勞働生產力之發展的原因的學說。我們還想指出關於李加圖價值論和他的前人——特別是亞丹斯密有別之幾點特點。(1) 亞丹斯密對商品價值變遷之依賴性的原因的研究，與此等變遷之確切程度之尺度相混淆。因此二者的混淆，根本上邏輯方法的特點之不同，遂使政治經濟學在其成為科學這一點上有了巨大的害處，而其為害，還直留到了現在，李加圖之豐功偉績即在于他在價值論中澈底採用了科學的原因觀點。(2) 亞丹斯密由于價值變遷的原因與價值尺度的混合，遂至也把消耗在商品生產中的勞働和在與該商品交換中可以得來的勞働相混淆起來了，因此在亞氏學說中，把客觀勞働的價

與主觀勞働的價值，都交雜其中了。至於李加圖，便提出了價值變遷原因的問題來，並以消耗在商品生產中的勞働數量之變遷，為其原因。他澈底地運用了客觀勞働價值的觀點。(3)斯密以為勞働價值的公律，(在他客觀的公式中的)只有在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才能發生效力。而李加圖則為此公律，即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中，也是合于實際的(有些差異)，不與利潤及地租諸現象相衝突。(4)李加圖認為勞働生產力之發展，是他在經濟現象中所研究之最後原因。勞働生產力之發展，一般說，決定了商品價值，部分說，決定了工人生活資料的價值。亦即是決定了工資以及與工資相攸關的利潤。在各種不同土地上的勞働生產力之發展，創造了等差地租，——李加圖看來，這是地租之唯一的形態。價值量變遷公律之嚴格的數學公式(工資，利潤，地租等亦在內)是依賴于生產中勞働量之數量變遷的，這是一方面的，他方面，對於生產的社會形式，則僅有區別——這是李加圖價值論之兩個基本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為馬克思的前輩；第二個特點告訴了我們，何為李加圖的價值論之所無，而何者為馬克思所新帶入于經濟學的理論。

若是李加圖不注意價值的社會性質或價值形式及勞働的現存的社會形式，那末，他是明白地了解價值量之變遷，(他的基礎中，已存在有勞働生產力之變遷)實質上是社

會現象的，他是研究這些現象的，即研究這有規律的，客觀的，（獨立于人的意志以外的）集團的，或為聖彼爾所說（註1），特異的，中等的現象。價值量變遷之最後原因，他是從社會生產變遷求得之，雖然他不是從他的社會形式去探討，而是從他的物質技術過程去觀察，雖然他不是從生產關係之總和中去揭發，而是從技術的，具體的勞働行為去觀察的。然只是這一個生產的社會過程中去指出價值的澈底指明，已是李加圖為馬克思開路之偉大功績了。（所以，我們不能同意羅遜白格的見解，以為馬克思與李加圖之基本區別，是在于李氏研究價值現象是從個別經濟着手，而非從國民經濟着手。（187, 172, 123, —124）。若是說，實際上就是如此的，那末，以個別經濟為出發的李加圖，却何至能有像羅遜白爾所說的那種的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分析的理論來，——羅遜白格說：“馬克思在其價值論上，完全是站在李加圖的立場之上”的，真的，這對於我們，只有覺得驚奇，在實際上，只有國民經濟的觀點，才使李加圖有建立其理論之可能。他雖是沒有研究國民經濟的社會形式，然而他是以國民經濟為其研究之對象的。

（注一）聖彼爾：李加圖與考爾馬克思 P82

（注二）

（e）相對價值與絕對價值

還有我們不能同意羅遜白格的，就在于他以爲李加圖與馬克思之第二個基本區別，是在于李加圖對於絕對價值之輕視，188,185,116,118)。此種意見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界中及在非馬克思的著作界中，都是在廣佈着的。自然，我們是以爲馬克思與李加圖之原則上區別，不能從這一點着眼的。馬克思在一個地方指出說：“相對價值，第一是指價值量，而別之一般的價值之質量……第二，是指表現于他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中的商品價值。(Theorien III, P. 156—157)。換言之，此有三種不同的概念：(1)表現于他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中的商品價值，例如一雙長靴等於三碼羅紗；2)消耗在他的生產中的勞働量所決定的商品價值量，例如一雙的長靴是由九點鐘的勞働所決定的，或：一雙長靴的價值量，等于一碼羅紗價值量即九點鐘的勞働是等于三點鐘的勞働；3)一般說，價值的質量，是不由他的數量決定的，例如，一雙長靴具有一般的社會形式。第一種概念，是叫做相對價值，第二個概念，有時亦做叫相對價值，然而常是絕對的(見Theorien II P. 14—17)。第三種概念，是絕對的。不用此不很顯然的名辭，而由下列的三種概念來表現的，更見正確些，(1)兩種商品之交換比例2)商品之一定的在數量上的勞働價值或價值量及(3)一般的價值之質或價值形式而爲他的量所決定者。

我們能夠說李加圖研究只研究了在第一種概念意義中的相對價值嗎？即只研究不依賴于商品生產中勞働的商品之交換比例嗎？只要是讀過李加圖著作之第一章，即足以承認：李加圖當他研究任何商品的交換比例及其變遷時，即要提出這樣的問題：該商品生產所消耗的勞働量變遷了沒有？（註）李加圖是從我們所說的現象，即從勞働價值及其數量方面來研究第二個的概念，而其所忽略的，只第三個問題：一般價值之質，或正確些說，價值的社會形式。把這個“價值形式”名為絕對價值，則表示其濫用名辭吧了。我自己屢次所說的李加圖只注意到價值量，而馬克思主要是指出李加圖論勞働的社會形式或價值形式學之付厥如。（Theorien III, P. 154）。李加圖與馬克思之間的基本區別，是在于此，而不是在論絕對價值的學說。

由此基本的區別，而產生了貨幣論之不同的立場。只有從論價值形式的學說中，馬克思發揭他的貨幣論，才能成功。至于李加圖，則不能解釋貨幣形式之必然性，貨幣在李加圖看來，是外在的，過渡的，而不是從商品經濟性質中必然性而發生來的。故羅遜白格之以為他們分歧見解之根本來源，在于他們對於貨幣性質之不同見解中，（P179, 188）而這樣極端的接近李加圖與馬克思的價值論，我們是不能同意的。李加圖與馬克思之貨幣理論之不同，不是基本的

（註）見李加圖：“政治經濟初步”。

區別，而是從價值論之不同立場中而產生出來的。

(f) 資本與剩餘價值

若是在李加圖的價值論中，因他沒有價值之明顯的社會性質——人的生產關係，而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則他對於資本及剩餘價值的理論，將更有甚於此。

我們已知，馬克思的方法，是在於資本主義經濟中人的生產關係之各種型式，加以分別和順序的研究，並從最簡單的方面開始的。他先把人的關係看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關係（價值論與貨幣），進而分析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關係（資本及剩餘價值說），俾能在此分析以後，再進而研究各生產部門中工業資本家間之相互關係，（平均利潤率及生產價值的理論）。工廠主把自己工廠的製造的羅紗出賣，看起來，是否這個結合，就是如此簡單的呢？但從馬克思看來，這種場合，是一個極複雜的社會現象，在這個現象中，工廠主的關係，是和下列各方面交雜起來的（1）購買者（2）他的工人（3）別個業工資本家。馬克思運用他的輯遞分析的力量，把這些人的生產關係之各種型式分別起來，在他的複雜體中之順序中去研究它。至于李加圖，他的注意力，便不注意人的生產關係上面來，而注意到物價的運動，此時只看見到羅紗出賣這一場合而已，而且開始就預先以為：賣主是資本家，該資本家是在與別個資本家競爭之下，由出賣中取得由自

已資本而來的中等利潤。李加圖是老早就預想像到人的生產關係之諸形式，是已同時並存在了的。“李加圖之錯誤恰就在於此：就在于他在他的論價值之第一章中已預想一切可能的範疇，是固定的”。（註）馬克思已把這些範疇置於一定的科學前途之上，而李加圖是把它閉塞在彼此游離而互相衝突之沾洞中。

（註）馬克思給恩格斯的書信。

在馬克思的體系中。資本論是在價值論之後，而先於生產價格及平均利潤說。因為李加圖以為這些範疇一開始就已是同時並存的，所以，（1）一方面，資本的範疇，常與最簡單的價值範疇，混淆起來（2）他方面，剩餘價值又與最複雜的利潤範疇混合起來。

所以，李加圖是不能夠懂得“商品及資本之特殊的區別”。（資本論第二卷 P. 91），就是他不能夠懂得由商品（價值）到資本之轉變，是設想着：人的生產關係除是商品生產者的關係外，尚存在有人與人關係之新形式——資本家與工人。

（1）在馬克思看來，以資本是資本家與工人間生產關係之物的表現，在李加圖看來，資本之物的或技術的定義，在廣義說，是生產工具，在狹義說，是工人生活資料。（李加圖，P. 53, 13及其他）。羅遜自格氏完全忽略了這個決絕點。

（2）李加圖以為資本是簡單的“積累勞働”而與活的勞

働，或“直接的勞働”相對立的。(第二卷P 86—87)。資本及勞働的對立性，却變成了積累勞働與直接勞働之技術的對立了。資本主義經濟之兩個基本範疇——資本與勞働力(僱傭勞働)——都溶解于“勞働”之中——簡單的商品經濟之範疇了。

(3)資本對勞働力之交換，——這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基本的生產關係，——李加圖若是把它看成了是積累勞働和直接勞働簡單交換的性質，那末，他對於剩餘價值之形成，是不了解的，從價值形式的見解來說，直接勞働與積累勞働之作用，完全是一樣的。(第二卷 P.87)而他們間之交換，從價值律來說，則相等物的交換，是無論什麼地方，都是沒有剩餘價值可剩的。

(4)爲要解決這個剩餘價值形成問題，則積累勞働及直接勞働必須帶有一定的社會性質。操在少數人(資本家階級)手裏的“積累勞働”，應是用爲工人的勞働剝削及社會統治之工具，即是“資本”。各個由資本家所壟斷爲生產工具的“直接勞働”，變成了由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特殊商品——變成了“勞働力”(僱傭勞働)。只有資本家與工人間的社會關係，“資本”與“勞働力”間的社會關係，才能說明形式上的對等物的交換，即事實上是非對等物的交換。

恩格斯在第二卷資本論序言上說，馬克思用下列這一

理論：“資本並非與勞働交換，而是與勞働力”，來“解決李加圖學派所以破產的難關之一”(K.II.P.XXVI)。羅遜白格以下列的根據：“李加圖在自己理論中，事實上常是分別勞働與勞働力之兩概念”(119)(註一)，修改了恩格斯上述的觀點。然而一切問題是在於此：李加圖亦于二者間，看到技術與社會之區別嗎？李加圖是應把勞働力來代替勞働的。然而這樣他便應以資本當為勞働之物的條件，和獨立的勞働“力”相對立了，而資本即刻也就馬上會成為一定的社會關係了。所以，李加圖僅僅只把他分成為“積累勞働”與“直接勞働”。而它只不過是物的東西，只不過是勞働過程的要素吧了，無論何時都不能從這去找出勞働與資本，工資與利潤間之關係的。”(第二卷 P.88)馬克思這些話，是充分發揮了他的這樣的思想：當李加圖說：資本和勞働相交換時，自然他的了解，在這個交換中，是活的，直接勞働，在技術意義上說的勞働力，然而沒有看到這個“直接勞働”之特別的社會階級的形式，不當作生產工具而把牠看成商品的性質——勞働力(在社會意義方面講的勞働力或僱傭勞働)。“勞働”與“勞働力”之間的區別，是帶有社會的性質，而不是帶有技術

(註一)羅遜白格氏的主張，好像馬克思對於李加圖價值論這方面的估量，是和恩格斯不同的，這是完全不對的。見 Zur Kritik P. 45

Theoren II P 87 Theoren III, P 127, 212及其他。

的性質。(註二)如果，一方面，李加圖把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概念——資本及勞働力與簡單商品經濟的基本概念，價值的創造者——勞働相混淆了，則他方面，他也是把剩餘價值和極複雜的利潤範疇混淆了。“李加圖從來沒有從獨立于剩餘價值的特殊形式：利潤，地租等而來研究剩餘價值”(資本論。第一卷，P 504)。這是說明：他是沒有分別出和沒有從事過在資本家階級及僱傭勞働者階級之間的人的生產關係的特殊研究，而獨立之于存在資本家各團間或資本家與地主間的生產關係之外。李加圖“把剩餘價值和利潤同一化起來”，並把剩餘價值律及利潤律相混淆起來，是不對的。(第二卷P 109,74及其他)。

若說李加圖的剩餘價值說的劣點，是在于人的生產關係及社會形式之忽視，則它的優點，即在于剩餘價值的數量變遷及剩餘價值量之研究中。(此地剩餘價值是與利潤相混合的)。根據這樣的規律，工資及剩餘價值是在相反方面起變遷的。(雖然是形式上，但是在于極絕對的形式中)。勞働生產力變遷之影響，及于工資量之大小，由此而又影響及于剩餘價值量——這是李加圖研究之基本現象。此地和價值論一樣，我們應指出李加圖之主要注意力是在於勞働生產

(註二)關於這點的詳細分析。請參看我著的：馬克思的價值論

力之變遷，認為是剩餘價值量變遷之基本原因，換句話說，他的主要興趣，是在於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剩餘價值。（第二卷P 93,95,95,99,102）。至於影響剩餘價值量之社會性質的因素，例如，工作日的長度，勞働的緊張性，工人的數目——李加圖是置而不顧的。“在他看來，工作日的長度及勞働的緊張性，是無關於任何變遷的，只是勞働本身的生產力，在他看來，才是變遷之唯一的因素”。（資本論，第一卷P.504）。

(g) 生產價格

馬克思在研究了商品生產者間的生產關係（價值論）及資本家與工人間的生產關係（資本論）以後，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便開始研究各生產部門間各工業資本家的生產關係。（生產價格論）。（注）各生產部門中資本之競爭，形成了平均利潤率，及按生產價格之商品出賣，——這個生產價格是等於生產成本費加上平均利潤其在數量上是不與商品的勞働價值相適合的）。然生產成本費及中等利潤的大小以及他的變遷，是以勞働生產力及商品的勞働價值的變遷而變遷的。這就是說，生產價格變遷的規律，是只有從價值的公律出發，才能了解的。他方面，利潤及生產價格的平均率是各生產部門間資本分配之調節者。而間接地——經過資本之分配——亦即是各生產部門間社會勞働分配之調節

者，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在資本之均衡的運動中的分配制度，然同時牠亦就是一個在勞働之均衡的運動中的勞働分配制度。——凡一切分工經濟，也是一樣。只有從資本分配的明顯過程中，去觀察出社會勞働分配的不明顯過程。馬克思之能指示出此二過程間之關連，是在於明白解釋出此二過程間，作為連環作用的概念，這概念即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概念。我們在知道把資本劃分成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率以後則從資本分配找出勞働分配，是輕而易舉的了。今試令有國民經濟的兩個部門中投入了同等的資本，都是100。資本的有機構成，在第一部門，是 $80c + 20v$ ，在第二部門，是 $70c + 30v$ （ c 是指不變資本， v 是可變資本）。如果剩餘價值率是等100%，則我們知道：投入生產中勞働量之總量（死的勞働與活的勞働在第一部門中是120，而第二部門中是130。而活的勞働量在第一部門中是40，而第二部門中是60，這是我們從資本分配中，找出了勞働分配。

如此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提出的生產價格，是資本分配的調節者這一理論，是和價值論連繫起來之二環：一方面，生產價格是從勞働價值來的；他方面，資本分配找出了社會勞働的分配。以簡單商品經濟的格式“勞働生產力——勞働價值——社會勞働之分配”，遂代以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之更複雜的格式：“勞働生產力——勞働價值——

生產價格——資本分配——社會勞働分配”了，馬克。生產價格的理論，是不與勞働價值說相矛盾，她是建立在勞働價值說基礎之上的，並把生產價格的理論，包含于勞働價值說之中，而為他的一部分。若是我們還曉得勞働價值說，是研究人與人間生產關係之一種形式（商品生產者間），則生產價格的理論，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中三個生產關係的基本形式（商品生產者間，資本家與工人間，工業資本與各集團間），那我們對於上述這些，就很瞭然了。若是我們是以這三個生產關係的形式為限，像我們上述所分析的，則資本主義經濟是可以把這三方面幅員同一化起來，欲以指出，必須借助于三方面幅員的測量。因這三方面幅員，不能把他歸納在一個測量範圍以內，所以，資本主義經濟理論，是不能都歸納到勞働價值論一個範圍之內。然而要指出他的幅員，那又必須指定這三個幅員中出發點之每一種和該定點（勞働價值說——譯者）之距離是多遠，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已是包容有論商品生產者間的生產關係之理論了，即是說，已包含有勞働價值說了。淺薄的馬克思的反對者們，以為馬克思的價值論及生產價格論之間，是互為矛盾，而不了解馬克思的方法，是在于各種生產關係的形式，或在于各種社會測量之次第的研究。（註）

（註）馬克思生產價格的理論之詳細分析，請見于第二版拙著‘馬克

的價值論”中

馬克思是在不同的測量之（雖然是統一的，科學的測量）去處理上述三種的生產關係的形式，而以此三者之中，是互相對立的；而李嘉圖，如我們所已知的，是在一個測量之中去處理一切現象，而以一切現象是面面相合的，李氏在他論價值的著作中的第一章，他已是把一般的資本主義經濟及中等利潤率，是看成固定的東西，李嘉圖是第一個了解和指示了勞働價值說以及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率之平均化的特有傾向間的矛盾。（亞丹斯密實用勞働價值說的規律于資本主義前期，以避免此矛盾），然因他的研究方法，直接把各種不同的經濟範疇對立起來，而忽略去其間之中間一環，所以他在他的全書中，不能把問題建立起來。因為李嘉圖一開始了解平均利潤率，即對於按價格比例而出賣商品的了解，並非從勞働價值着眼，而是從生產價格着眼，這樣他就已越出中等利潤率之形成及價值變為生產價格之基本問題了。它的注意力因此是集中在部分問題上面：即工資之增加與減少，不依于勞働價值之變遷對於資本不一致的有機構成（此地李嘉圖是指固定資本及流通資本間之不同的關係，而這關係是資本家所應先行拿出的資本的時間之長短的不同結果）所生產的商品之相對價格有無影響這一問題。這個部分問題消滅了李嘉圖所論剩餘價值變為中等利潤，

價值變為生產價格這一個總的基本的問題。至于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價格，和價值比較起來，是和更複雜的人的生產關係的型式相適應之新的‘形式’定性。(Theory II. P. 20)，而李嘉圖却認為是勞働價值規律之“例外”者。自然，因為他要保持勞働價值說的見解，所以他安於這樣的意見：即上述的“例外”，只是起次要作用的，而由這個例外所引起的價格對於價值之偏差，其對於“商品價值是表現商品生產必需勞働量”這一事的影響，是很不大的。

總結本章的結論時，我們認為必要知道，本章並沒有對於馬克思與李嘉圖之關係的問題，作詳細之分析，其目的只在指出了總觀點，應由這個總觀點，按我們意見說來，再去繼續加以研究。對於馬克思與李嘉圖各部分理論的分析，他們同異兩方面的比較分析，只有在他們對於兩方面理論之基本的方法論的特點，有明白之了解時，才足以言充分。我們認為，馬克思的學說與李嘉圖的理論之原則上的區別，是在於馬克思所指出的生產物質技術過程及其社會形式間之區別，這個區別，對於人的生產關係之變遷之對於生產力發展之依賴的原因及其相互影響如何，都沒有例外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的社會形式，——這個馬克思的理論，是在一切的經濟現象上，——古典派所已研究的也在內——放了空前之新光明。馬克思告訴我們，一切經濟現象之新前

途，用新的觀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於經濟現象性質的見解，從經濟範疇之物的性質到採取物的形態之人的生產關係之轉變，這是馬克思在價值論，貨幣論，資本論等諸學說中，所澈底指示出之總的邏輯方法的觀點。而在價值論中，此種社會學的觀點，首先即是論社會的“價值形式”的學說；以價值為勞働生產物之社會形式，並且是從勞働組織之一定的社會形式中生產出來的。——這一理論是馬克思在價值論中所獨創的，新的學說，完成古典派理論之未竟者，並為新經濟學說之基礎。

(完)

世界股票行情低落問題— 世界經濟大恐慌的信號

高 峯

幾個月來，在世界的一切金融中心，股票行情日日低落，有增無已。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國已達到低落行情的終點（Times 報，十二月三十日）。

依布哈林的理論，以為世界已發生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矛盾可以漸次調和等等，這幻夢，現在被美國的事實所打破了！據美國各雜誌所載，數月來紐約交易所股票價格的損失達25,000,000,000金元以上。在三藩市只大美銀行（Pan America Bank）一家在一天內的損失也有1,000,000,000金元。

我們在那些世界著名的股份公司中，可以看見以下的

情形：

	1929年最 高行情	1926年 十月的 行情	1929年 十月的 行情	比較行程 低落的百 分數
電力總公司……	403	296	250	38
汽車公司……	97 $\frac{3}{4}$	54 $\frac{1}{8}$	47 $\frac{1}{2}$	51
北美合衆國 鋼鐵托辣斯……	261 $\frac{3}{4}$	203 $\frac{3}{4}$	185 $\frac{1}{2}$	29
自動耕具公司…	142	101 $\frac{1}{4}$	85 $\frac{1}{2}$	40
美和加 熔鐵公司	130 $\frac{1}{4}$	97 $\frac{1}{4}$	80	40
Dupon de Ne- mur公司…	231	166 $\frac{1}{2}$	150	35
克萊斯雷爾…	135	44 $\frac{3}{4}$	39 $\frac{3}{4}$	71
汽車公司				
美孚火油公司…	87	72 $\frac{5}{8}$	64	23
無線電公司……	114 $\frac{3}{4}$	59	40	65
西門電器公司…	292 $\frac{5}{8}$	179	145	50

這材料告訴我們的是：美國那些不特在國民經濟而且在世界經濟上佔領導地位之企業，在一天之內可以損失到20—30%的價值，這是表示資本主義的生產不特沒有減輕了牠的無政府狀態，而且在托辣斯新狄加卡托爾等組織之下，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影響，更犀利起來了。

自然，股票價格的低落。并不是表明整個企業的財產的價格之低落，這種低落不過表示“想像資本”(Fictitious Capital)的損失而已，而實際資本也許沒有絲毫的損失。(註)然

世界股票行情低落問題——世界經濟大恐慌的信號 3

而不論如何，這種事實使得那些股票的特有者受到損失，尤其是那些小資本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與有力購買股票的工人等。他們在平常的時候，希望能得到經常可靠的收入，于是把他們僅有的金錢去購買大公司的股票，到了現在，他們的金錢一聲不響地跑到企業大王們的荷包中去了。所以股票行情低落的意義是剝奪中等資產階級與比較富有的工人的金錢，使牠更加緊的集中到那些“大王”的荷包裏頭。

股票行情低落，一方面加深了社會階級的矛盾，別方面，中等階級破產的結果，更縮小了國內市場，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更凶惡的去爭取國外市場，與其他帝國主義者衝突，更積極的準備戰爭。在這裏，布哈林“資本主義穩定”的理論就完全破產，因為資本主義進展的行程，一如戰前的形

(註)“想像資本”是指股票行情超過票面規定額以上的價格。譬如某公司發出股票一張額面書明股本一百元，假設市面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而這張股票能從公司得到十元的股息，則這張股票在交易所的市場上不賣一百元而賣二百元，這樣一來，這張股票出售的價格比額面書明的多出一百元，這一百元在公司方面我們就叫他做“發起利潤”(established profit)整個股票“發起利潤”的總額就叫“想像資本”。那些大資本家往往故意增加他的公司的股息，他們因此可以得到更大的“發起利潤”

狀，經過生產的恢復引到恐慌與大戰。並沒有如布哈林所說的，大戰後的資本主義已改變了他的性質，有幾十年穩定的可能等等。

不特美國，一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都有相同的命運，金融恐慌與大企業的倒閉相繼。（法蘭西總公司，維也納土地信托公司，倫敦海德利公司）這些證明現在資本主義的恐慌是不可避免的。

爲什麼股票的價格低落？

我們要明瞭股票行情低落的原因，就先要明瞭股票行情是怎樣構成的。馬克思對此問題有很詳細的分析：

“股票……既然變成了商品，則牠們的價格將隨市場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牠們的市場的價值與票面的價值完全分離，與實際資本的價值也沒有關係了。（當然，與實際資本的價值增殖的速度是有關係的）一方面，股票的市價隨股票所能得的收入的高低與有無保障而變更。如果股票的額面價值——即開始時所投下的實際資本——是一百鎊，而股息由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且當時利息率也只有百分之五，則在平常條件之下，此股票的價值提高爲二百金鎊，因爲由於百分之五的利息率之資本化，牠的“想像資本”已變成二百金鎊了，而花了二百金鎊購買此股票的人仍然可以得到百分之五的利息。若股票所得的收入減少，股票的價格也依

同樣的比例低落。所以，這種證券的買賣同時俱有投機的性質，牠的價格不特為現在可以取得的收入所決定，而且被將來的希望所決定，在事先估量牠們的行情。我們如假定實際資本增殖的強度不變，則股票的價值將與利息率的運動成反比例”。（資本論第三本第二部第五頁——斯結巴諾夫譯本）

近年來股票行情中的投機性更為明顯，在市面上除了平常的股票外，還有許多不具額面股本的股票出現，這些東西成為股份公司的發起人最普遍的漁利方法，因此，在這些股份公司中實際參加生產的資本額與支付股息的資本額就不能一致了。

為什麼美國股票的行情低落？因為美國的經濟恐慌就要到來，各大股份公司已覺得沒有能力來支付股息了。

美國股票行情的轉變中可以看出股票投機的情形：

股票行情的指數（華爾街雜誌 *Wall Street Journal*）：

	1926年	1267年	1928年	1929年
正月	158.5	155.2	203.3	——
八月	161.8	184.2	216.8	338.0
九月	163.8	191.6	240.4	381.2
十月	159.2	198.4	240.0	230.1

在這些數目中我們可以看出：1929年前四年間股票行情只提高了四倍即由129提高至469；而1929年二月至九月半年之內股票行情提高了二倍，即百分之五十。過此以後又一落萬丈。很明顯的，股票價格的提高并不只是因為股息的提高，即使在市場興旺的時候，企業的利潤之增殖非常迅速，同時那些獨佔性的企業有許多“潛伏的”預備金去支付非常股息（bonus）來提高自己的股票行情，然而不論如何股息的提高是沒有這樣利害的。事實上，在最高行情的時候，購買股票者可能得到的收入，遠在平均利息率之下，他們如果用他們的金錢去購買公債票或放在銀行中支取利息還能得到更大的收入。在行情最高的時候，股票所能得收入只有2—4%，同一時間紐約銀行的利息率有6%，短期公債的利息達8—20%。因此，股票價值的提高大半是投機者競爭的原因。

投機熱是沒法可以停止的了，許多公司曾經停止股息的支付，金融的專門家巴布沙（Babson）也曾大聲疾呼的警告過那些投機者：“股票行情的高漲終有破裂之一日，若不急事收手，到時悔之已晚了”！（Financial & Commercial Chronicle）。然而注意這警告的只有那些大資本家，他們才有可能來明瞭企業中營業的實在情形，因此，他們馬上把多餘的股票在高價時出賣，只留下所以操縱該企業的最低限

度的股票。同時，他們吩咐他們的走狗，經濟學博士，大學教授等等，用他們的“科學”去欺騙那些小資本家，一位大資本家的走狗，愛爾文飛霞 (Erving Fisher) 教授曾這樣說：“股票價格的高漲完全是因為將來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之可靠所衝動……在不久以前已有很高的股息支付，而且牠將更要提高；那些以為股票價格行情將低落的人們未免神經過敏了。依我的意見，購買股票者，將來可以得到更大的收入，但必非由于股票行情的低落，而是由于股息之提高”。

這是愛爾文飛霞先生代表美國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在1929年九月初旬寫的，當時華爾街的指數還是381；但是到了十月末，這指數已降到230,3！無慮萬數的投機者相信這位“科學的威權者”的話，以致在行情高漲的時候未能將他的股票賣出，而那些“大王們”的荷包又加重許多了。

在美國股票行情高漲的時候，資產階級對於產業前途異常樂觀，他們十月以前還未能而且不願看出自己的危險，譬如美國首屈一指的保險公司的一位經理奧斯 (Ous) 先生就這樣說：

“幾個禮拜以前在水平線上發生了陰沈的雲霧，這倒是事實，然不久這些雲霧就消散了。現在，除了那些有季候性的企業外，其他產業部們都有很大的進步。那些與鋼鐵，煤油，煤鐵礦，氣電等主要企業有關的人們都認為：在最近將

來，一切企業一定要更形發達。(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Chronicle 雜誌)

事實并不是這樣，在1929年十月以後生活的實際已把那“美國永久繁盛”的觀念打得粉碎了。其實，在十月以前，我們就早已知道美國金融行情的高漲必然不能持久，因為美國金融行情的高漲只是投機的結果，沒有與世界的金融趨勢相適應。世界的金融情形除了加拿大與美國有同一的現象外，歐洲大陸的國家如法蘭西，及其鄰國瑞士，比利時，荷蘭等，正處于金融低落的形勢。在英國，金融行市的低落更是非常明顯。在德國則因外資輸入的減縮防礙了市場行情的提高，德國以東，波斯，澳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恐慌的形勢都漸漸的明顯起來；這樣，我們何以看見，美國金融行情的高漲完全沒有與世界的經濟趨勢相應，所以很快的就結束了。

在幾種主要貨物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出賣市場的減縮，這也就是股票行情低降的最大原因：

1, 麥子 麥子的價格雖沒有降低，然而已不得不用人工的方法來維持麥子的價格了。主要的是向外國購出麥子，在最近一個禮拜祇向加拿大一地就購出麥子共值100,000,000金元。然而麥子仍然堆滿倉庫，發售不出，在去年八月末，各貨倉中儲藏着的未能出賣的麥子計值240,500,000金

元，而在1928年同日只有100,400,000金元，在1927年同日只有98,100,000金元。這可見麥子出賣的困難情形。在最近，美國參議員麥克馬士特(W. H. Macmaster)又向政府提議，以價值25,000,000金元的麥子輸運來華以賑濟(不是無代價的)!中國陝甘一帶的饑饉。(Shanghai evening past 上海大美晚報)

2, 棉花 因歐洲紡織工業的衰落，美國棉花的價格也就一落萬丈，如果把現在的價格與三月間的最高價格相比，則棉花價值低落了百分之二十，同時，棉花的收成也并非良好，全年收穫的棉花只有15,000,000細。

其他的農產物如麻，糖，咖啡等也是遭着生產過剩的厄運，致使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不絕的低落。

現在說到礦業：原來在國際的範圍內，煤業的恐慌是每年一次的，美國自然也是如此。至于探銅業，我們只要讀：(Analyst)就可以知道：美國的探鋼業正遭着生產過剩的厄運，不管世界探銅“嘉特爾”Cartel的威權如何偉大，而銅的價格還是繼續的低降。石油業的生產過剩更是利害，現在儲藏着賣不出的石油有145,200,000,000桶。

其次，我們要說：建築工業，牠是美國市情一個很主要的因素。在美國東方三十七個聯邦中，成議的建築合同有以下的數目：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四月	六六八	六四二
五月	六五〇	五八八
六月	五八三	五四六
七月	五一七	六五二
八月	五八八	四八九
九月	五九七	四四五

在這表內我們可以看見，從七月起建築的工事就開始嚴重的低降，只在九月一個月中，一九二九年建築工事的價值總額比一九二八年同月的價值總額減少了 150,000,000 金元。這樣一來，鐵的市情也便隨着降低，因為鐵的出脫容易與否和建築業有密切的關係的。

汽車工業是美國最主要的一項工業，牠的生產在這幾年間過量的擴大了，大約每年可以造成汽車一千萬輛左右。而出售的數量則只有日漸減少。

北美合衆國與加拿大的汽車生產(一千輛爲單位)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一九二六	四六一	四五〇	四〇八	三七五	四四二	四一六
一九二八	四三四	四六〇	四二五	四一七	四九三	四三七
一九二九	六六三	六三六	五七六	五一八	五-四	四一七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在半年內產量降低到百分之三

世界股票行情低落問題—世界經濟大恐慌的信號¹¹

十三，到九月後，汽車的產額降低到一九二六年的平線。

要知道市場的整個形勢最好是看物品價格的總指數，在Analist 雜誌上載着：

一九二九年經濟市情的總指數：(見一九二九年十月四號的 Analist)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一〇九.八	一〇七.五	一〇八.五	一〇六.五	一〇五.九

在這裏可以看見，五月以後，物品價格的總指數不絕的低降，同時對原料品的定單也是不絕的減少：

每月原料品定單的百分比(一九二九)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一一七	一〇一	九一	九六	八八	六七(!)

在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美國股票行情低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股息與股票價格的不平行，在經濟稍為繁盛的時候，股息只稍微的提高一點，而股票的價格就過分的高漲，這顯然是投機的結果。因此，當發覺一般市情向下低降的時候，股票的行情也自然一落萬丈了。

歐州的股票行情低降與金融恐慌：

美國的股票行情低降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牠與世界金融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美國本來就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美國行情低落的前後，歐洲各國也發生同樣的現象，而牠

與美國金融的低落多少都有聯繫。我們知到，因為美國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以前，股息之提高，使歐洲的投機家都把他們的金錢帶到美國去，參加股票的投機事業，結果，歐洲國家就不得不向美國輸出現金，（在九個月中歐洲向美國輸出的現金值230,000,000金元）。而歐洲國家中的現金缺乏，外匯高漲，巨大的企業不絕的傾閉，而股票的行情也因之而低落了。現在我們且看看德國的情形：

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之股票指數：（德國國家統計局發表）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四十二個重工業的工廠的股票	一二三	一二九	一三〇	一二六	一二八	一三二
一百六十六個輕工業的股票	一三六	一三〇	一二八	一二七	一二六	一四九
一百一十家商行與交通業的股票	一六三	一五七	一五五	一五三	一五二	一六七
三百二十九個其他企業的股票……	一四一	一三五	一三六	一三四	一三二	一四九

世界股票行情低落問題——世界經濟大恐慌的信號¹³

這裏指示出德國股票行情不絕的低落。因為歐洲現金的缺乏，使德票的企業家沒有可能多發股票。除此以外，還有許多企業倒閉的事件發生，最著名的就是柏林法蘭府保險公司的破產，這事件引起柏林市的金融恐慌，迫着柏林的大資本家在去年九月召集了一個聯席會議去討論應付此事的方策，結果只是沒有辦法！

在美國，海得利銀行的破產引起了整個倫敦的金融恐慌，海得利本來是一個賣空買空的最滑頭的銀行家，他自己只有很小數的基本資本，然而他的信用非常之好，他利用他的信用發出了八百萬鎊的空頭股票，因而操縱了許多重工業的企業。在金融流轉順利的時候，他的破綻完全看不出來。然因貨幣資本向紐約市場投機的增加，歐洲現金短少，兌現與出賣股票的事情日日增長，海得爾公司沒法應付債權者的要求，只得把企業倒閉下來了。然而在倒閉中海得爾先生騙下來的孽錢已不少了！

英國的股票額面價值多是一鎊至五鎊，這種股票的購買者多是些中產之家，這樣一來，受害的人更多。

此外，維也納（奧國）亞姆士德丹（荷蘭）受着美國的影響也引起了金融恐慌，在維也納那些地產公司紛紛倒閉，在亞姆士德丹則十二家最有信用的商號在二十四小時內損失了二萬萬二千萬弗羅蘭（荷幣價二先令）。

大資本家掠奪小有產者的詭計。

在一九二九年夏天，那些大資本家就感覺企業內部的空虛，在股票行情還未低落的時候就趕快的把“多餘”的股票售出；這樣一來，更加速了股票行情低落的過程。然而那些大資本家“多餘”的股票一時還未能完全賣出，于是大資本家的詭計又表演起來了。

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初旬二十六個大銀行家在摩爾根先生的住宅裏開會，討論應付金融市場的方略，他們在開會的時候說得很堂皇，他們說，他們要去“救濟”那些股票的持有者。他們怎樣去“救濟”？“救濟”的方法就是指定一定的資本去收買股票，使股票的價格又重新提高，于是乎他們乘股票價格提高的時候，好盡量的賣完所有的“多餘”的股票。大資本家的走狗大學教授經濟家專家如愛爾文飛霞之流就繼續鼓吹着行情高漲的空氣，直至摩爾根先生們的“多餘”股票完全賣盡為止。而且，當大資本家要提高票股的價格的時候，還用人工的方法去增加羣衆的投機熱，故意的臨時提高股息，減低銀行存款的利息率（按銀行存款利率減低則無人存款於銀行而盡將所有貨幣資本購買股票）等等，譬如摩爾根公司故意向摩爾根公司有關係的鑄鐵公司定造大批的鐵條，使羣衆沒有看見製鐵公司衰落的形態；倫敦的發行銀行一致的減低存款的利息率；而且那些大資本家收買股票的

世界股票行情低落問題——世界經濟大恐慌的信號15

時候都沒有給現款。他們的目的只是等到股票價格用人工的方法提高到於當的程度，他們就好出賣他們的“多餘”股票，而那些窮人沒有曉得內幕就大上其當了。

我們要知到這些“救濟家”怎樣的去救濟金融：當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號摩爾根先生以最低價格去收買股票，到十月三十號（二十四個鐘頭之久）！電氣股份公司的股票價格就增加了百分之十，馬達公司股票的價格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無線電合作公司的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到這天的下午，摩爾根就把所有的股票（當然保留能操縱該企業的最底數量的股票）出賣，而一萬萬餘金元的純利就跑進摩爾根的荷包去了。過幾天股票的價格重新低落，比十月二十九號時還要利害。這就是那些大資本家救濟金融的方法！

總結一句，股票低落的過程中大資本家不特沒有損失，而且乘機漁利，受損失的只是窮人與小有產者。

股票行情低落是世界經濟大恐慌的信號：

本來，在股票行情低落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損失的並不是真實的資本，牠不過是“想像資本”的損失罷了。這就是說，股票行情低落的結果，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財富並沒有受到損害。所以股票行情低落的本身並不即是經濟恐慌，第三國際那些吹牛專家如史達林莫羅多夫輩說現在世界經濟已到了革命公開爆發的前夕，到了所謂“第三時期”，

這顯然是沒有根據的妄語，比方在十點鐘的時候他們偏要說是正午，這就令到革命的羣衆沒有可能來認清自己所處的地位。然而股票行情的低落是經濟恐慌的信號，股票行情低落的結果也可以間接的引起經濟恐慌。我們現在專就美國來說明此點：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前半年中美國的股票價格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此時，那些持有股票的人憑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收入，這種“儻來的”財富對他們的慾望不能沒有影響，於是他們開始提高自己的生活，他們將購買新的汽車，——有些人竟是除來的——家具，服裝等等，一句話，他們變成了新的購買者，所以股票行情高漲使市場的收容力一時擴大了。然而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以後，股票的行情驟然低降，那些小有產者不特失去了購買的資格，而且要開始把他們的汽車家具與裝飾品等向市場出賣，這樣，市場的收容力就受到大大的打擊，股票行情低落首先就縮減了國內的市場，這是毫無疑義的。除此以外，還有那些手工廠主人與小資本家因股票行情低落而破產，將他們的商品廉價出賣。僅此二種因素已足夠使那些還沒有顯着的生產過剩更顯着的爆發出來。

在股票行情低落後，美國的汽車業馬上就受到影響，著名的福特汽車公司就減少工人三萬餘名，而汽車的產額減少了一半。克里士里汽車公司也減少數千名工人。而汽車業

世界股票行情低落問題——世界經濟大恐慌的信號17

的恐慌同時也影響到製鋼業與鐵業的生產。

自然，我們並不是說，經濟恐慌馬上就要來到。在短時期內大資本家還可以用人工的方法延遲這過程，然而如果股票低落的現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種質物“實現”(出賣)困難的總表現，則大資本家的能力不論如何偉大，不能改變經濟的法則。而且這恐慌的到來不是限于一個國家，而是全世界的總爆發。

教育類

社會主義之教育政策

塔尼著
葉啓芳譯

實價大洋三角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羅斯的教育，是列強中最落後的；可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它的教育上的制度及設施，却成了世界的最先進的國家。它們在一切方面，都曾被入視作惡意的，惟有教育方面，却得了無論甚麼旅行者，視察者的多大敬意。它由教育最落後的國家，一躍而為最進步的國家的過程是怎樣的呢？這本書給我們有最好的回答。

在現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一切制度都資本化。教育制度為現代社會制度之一種，自然也脫不了這一個漩渦。但這個資本化教育制度下生出來的弊端是很利害的。塔尼先生這一本小書，就是要打破資本化的教育制度，而代之以社會化的教育制度。英國的教育總長忒雷維揚的序文說：「書中好些意見，我正打算實施。一這已可見內容的價值。」

關於所謂“左翼作家”

托洛斯基

我們覺得這篇文章不僅是西歐“左翼作家”的一面照妖鏡；並且借來批評中國的左翼聯盟亦十分恰當——自然，這些先生能比西歐的“左翼作家”來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編者。

親愛的朋友：

我收到一期紐約的報紙新羣衆，其中有幾篇論文關於我的自傳和馬野哥夫斯基（Mayakovsky）的自殺。我並不惋惜爲頌教美國左翼作家的這些言論而耗費了一刻鐘時間。現在在許多國家都有這一類報紙出版。人們將“擁護”蘇聯當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這本是一件十分值得褒獎的事情。——不管這些“擁護家”先生們實行時候永遠是別有作圖或根據於較不高明的動機。但如果誇大了這種“擁護”的

將是一種可笑的錯誤。這一類集團包含很複雜的分一方面腐聚於資產階級營壘，他方面又腐聚於無產者，但他們從來不曉得他們的“明天”是怎樣。大多數者祇是在和平時代反對戰爭，同樣這些左翼的蘇家這些文氓(La bohème)出身的蘇聯“朋友”，實至多也祇能夠到一個時期，過此時期以後人們就正勇氣和對革命的真正忠誠了，而這些，他們是沒有正說，他們怎能夠有呢？他們的左傾是需要一種保護以這種左傾之主要表現就是“擁護”蘇聯，換一句話護一個具有實力和權威的政府。這裏人們祇是擁護那已經存在的，那已經獲得的。實行這種擁護工作，并不需要革命家，甚至無政府派而兼保守派的人都可以做到；雖然如此，但人們還可以冒充革命家來欺騙別人，一部分并欺騙自己。這種情形，我們從巴比塞(Barbusse)及與新羣衆同類的法文報紙世界，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左傾，就時間而言，主要是朝向於過去的；就空間而言，則與政治事變舞台距離之平方成正比例。這些英雄對於他們的本國，比起對於別國尤其東方國家來，永遠是聰明得多和油滑得多。

這類分子之最優秀的代表者，無疑是高爾基(Maxime Gorki)；他的天才和品性比起其他分子都高明得多，他曾經好多年對多數派表同情，將多數派的敵人當作自己的敵人。

這并不能阻止他當無產階級革命時候跑到革命敵人營壘方面去，而且革命勝利以後他還長久站在那個營壘。一直到他自己也認為蘇維埃共和國已經根基深厚不可動搖時候，即人們可以同這個國家調和而不至損害自己固有的保守性的世界觀時候，——他才走過蘇維埃國家方面來。

何等滑稽的事情！高爾基當列甯主義最偉大的創造時期拚命攻擊列甯，而現在則與史大林妥協并親善了。高爾基尚且如此，其他那些小高爾基，更可不言而喻。

這些資產階級文氓的左翼分子之本性，祇是在革命已經成功并表現根基深固以後，才能夠擁護革命的。他們擁護革命的“過去”，同時又以保守性的仇恨對待一切為革命的“將來”開闢道路的人。人們祇能夠拿革命的方法去準備“將來”，但這種方法是這些保守派文氓所反對的，好像一九一七年前夜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和口號遭受他們仇視一樣。這些先生們，可見是忠實於他們自己并忠實於產生并豢養他們的那些社會條件的。還有一層，這些“新羣衆”（！）形式上無論如何站在左翼，但事實上其保守性是一天比一天加增的，因為他們并不是依靠在十月革命之上——不是！——而是依靠在一個政府“機關”之上，且不管這個政府之主義和政策如何。他們擁護過列甯和托洛斯基（但非全數），隨後又擁護過季諾維埃夫布哈林賴可夫，現在則擁護史大林。明

天呢？他們必須等到“將來”變成“過去”以後，才能答覆這個問題。他們每次接受新改的政治路線，好像愛國官吏每次接受新改的制服樣式一樣，——文氓中本來也包含有一些操持大權的官吏。這是蘇維埃政府的侍臣，而非無產階級的戰士。

在偶然的情況之下，工人政府也可以需要這類分子，——雖然我總認為近視的不肖門徒們過於誇大了這類分子的作用，好像他們過於誇大斐塞爾(Purcell)的“擁護”和

的“友誼”一樣。至於這類分子本身，則我還是無條件認為他們充當蘇維埃政府的侍臣，究竟比較充當煤油大王或“Intelligence Service”的侍臣還好些。但如果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使這類無希望而動搖的分子與自己行伍混雜起來，則將不成其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了。

*

*

*

當他們以“家庭的朋友”資格來干涉共產主義內部問題時候，他們精神上的輕薄性又帶上了一重無恥的甚至令人噁心的形式。我收到的一期新羣衆就是一個新證據。(文氓的報紙用新羣衆為名，也是一件奇怪事情)。你試看，這些先生們認為我的自傳是供給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的，而新羣衆世界及其他同類刊物則似乎是供給無產階級來反對資產階級的。這種胡說是完全可以解釋的：各國的巴比塞派

本來是廬聚在幾個對敵階級之界線上的，因此他們容易錯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各自立場。他們的判斷是很簡單的。左派反對派工作既然是嚴格批評蘇聯的國內政策和第三國際的世界政策，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既然含惡意的企圖利用這種批評，問題於是自然而然的解決了：根據這個事實，侍臣們就是站在革命的營壘，而我們左派共產主義者就是站在革命敵人的營壘。這裏，文氓的無聊和虛偽就達到古代滑稽戲所扮演的那樣明顯程度。

資產階級如果不企圖利用革命營壘內部糾紛，那將是很愚蠢的。但難道是我的自傳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嗎？

第三國際主席季諾維埃夫和蘇維埃政府主席之一嘉門涅夫兩人被開除出黨這件事情，難道不是給資產階級的一件禮物嗎？托洛斯基的放逐及出國難道不給世界資產階級報紙一個最好的宣傳機會來反對十月革命嗎？政府領袖賴可夫和第三國際領袖布哈林兩人贊助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宣言，難道不給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利用去嗎？這些世人所共知的事實，比起托洛斯基之理論分析和歷史解釋，對於資產階級更有用得多。但無政府派兼保守派的文氓，對此又怎樣呢？他們將以上那些經過官僚關防蓋印的事實，都看作是確定無疑的。他們的賬目是每天重新算起的。對於史大林政制之批評，在他們看來，是不能容許的，——這并非因為史

大林主義不錯，而是因為史大林派現在掌握着政權。我再說一遍：這是蘇維埃制度的倖臣，而不是革命家。

因為在革命家看來，解決問題必須根據階級的路線，思想的底基，理論的立場，歷史的前途，每個政黨在鬥爭中所用的政治方法。如果人們像我們所估量的一樣，像我們根據最近六年來世界經驗所證明的一樣，認為史大林派小組織削弱了十月革命，葬送了中國革命，準備了印度革命的失敗并腐蝕了第三國際，那麼在這個情形之下——而且僅僅在這個情形之下——我們的政策就被證明是正確的了。資產階級撫拾我們正確的和不可避免的批評之唾餘嗎？自然。但這是否就改變了主要的歷史問題之要點呢？革命的思想難道不是在反動派時時刻刻想利用的那種激烈的內部鬥爭中更加向前發展嗎？我附帶還指出一點，即一切資產階級報紙從新羣衆起至奧國派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新聞止，在其對於左派反對派鬥爭之政治估量上，都是站在史大林中派一邊，而無可限量的更接近於中派而離遠左派反對派。——這是他們所從來不隱瞞的。

由此可見，除開別的不說，革命的這些“朋友”和“擁護家”是無恥的遮掩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對中派和左派反對派鬥爭之真實態度的。造謠本是倖臣們之慣技。在新羣衆上一篇關於馬野哥夫斯基的論文提到拉可夫斯基（Racov-

sky) 名字。我讀了十幾行，雖然我已習見他們的技倆，但也使我吃驚不小：人們敘述馬野哥夫斯基怎樣“厭惡戰爭”，（“厭惡戰爭”是何等卑賤的辭句，竟用來表示革命家對戰爭的態度！）以及反之拉可夫斯基怎樣在齊美瓦（Zimmervald）“捏着拳頭去打”列甯和季諾維埃夫（因為他們的革命鬥爭）。這裏提到拉可夫斯基，是沒有一點理由的，除非為故意造出這個謠言。而這是要造謠的，因為拉可夫斯基正被充軍，而他的充軍必須拿種種理由證明是毫無冤枉。於此可見倖臣們怎樣變成了可鄙的奴才。他們既然提到拉可夫斯基與戰爭問題，竟造出這麼一個愚蠢謠言，而不肯敘說：拉可夫斯基以何等的革命勇氣於報紙謠言和警察壓迫之下拚命反對戰爭；就因為他這種奮鬥，他才被羅馬尼亞的寡頭政治監禁於耶西（Jassy），直至俄國革命軍隊到來才使他避免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所走的命運。

現在不必從下說了。如果十月革命要依賴這些未來倖臣，則永遠不會實現。如果十月革命未來命運要依賴他們，則也註定要破產。無產階級惟有拿正確的政策，才能保障蘇聯的未來命運并替世界革命開闢道路。這個政策應該確定下來，應該從理論上鍛鍊起來，應該用盡種種力量去擁護，以反對一切，如不可免還要反對那建立在（或降落在）十月革命背上的“高等機關”。

.....

托洛斯基

現代土耳其的經濟狀況

丹 齊 各

自洛桑會議（一九二三年七月廿四日）到莫索爾協定（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與自莫索爾協定到土耳其國會一九二八年十月所批准的關於土耳其帝國債務的支付協定，——這便是土耳其經濟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階段，其自身發展的整個行程，完全預定了其與外資協妥的必然。自洛桑和議到莫索爾協定的這個階段，是與土耳其內部生活中經濟方面的許多改革相並行，牠自身帶有恢復過程的一切特徵，主要的表現於國民經濟各部門之相對迅速的發展。這個過程，很迅速的在兩三年中即行過去，而在其主要的特徵上，於一九二五底業已完結。一九二五年底財政狀況的緊

迫，銷售恐慌的加厲，與土耳其各種主要輸出的跌價，乃是簽訂莫索爾協定的有力前提之一。這個協定，使土耳其與歐洲列強——首先是協約國——的關係趨於和緩，消除了戰爭的恐怖，使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得以安然進行。

對外資的急需——但在消除戰爭恐怖之前牠在拒絕走進土耳其的國土，與在莫索爾問題消除後外資即將流入土耳其的希望，在土耳其一些國家要人的意志中實具有不少的作用，推動他們來解決久持不下的關於莫索爾的爭議。但是土耳其這個在歐洲資本前的第一次投降，在歐洲列強方面則未曾給與牠一點任何實際的財政幫助。第一個階段中所表現的對外資關係上政策的轉變與攻勢的放棄，未曾給予國家一點實際的東西。

外國資本家異常堅決的表示其在舊債問題未清理前之不願踏入土耳其的疆土。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的階段中，經過了長期談判，終於在巴黎簽訂了協定，這第二個階段是表現於某種程度的隱定，而臨終則繼之以土耳其經濟狀況的大大惡化；這是起於二度的歉收，輸出縮減與輸入增加，工業建設速度的遲滯，以及一般的國內資本的缺乏。這個經濟狀況惡化的外表指標，則是利拉（一個紙利拉大約等於一個盧布）市價的跌落與層出不窮的破產。

巴黎談判，是進行於惡化的土耳其經濟狀況的基礎之

上，因此無論如何必須要設法由於這個談判而為國家吸收一點必須的資本，以使用以救濟國內的經濟恐慌。自然的，談判是在對土耳其極其不利的局面下進行的，而土耳其在這個局面之下遂不得不在較之其前幾年所能達到的——甚至可以無別於其在洛桑會議中提出的要求，——更為吃虧的條件下簽訂協定。本篇論文的任務便是在於精確的認識土耳其的經濟狀況與負責的說明土耳其在西歐列強前作這個二次投降時的局面。

論到土耳其的經濟，則由於正式的與一般可靠的材料的缺乏，正式統計的不足與夫各種經濟統計材料的編製多依據各機關主觀的和客觀的肉眼觀察，因而使研究異常困難，並且往往易於得出不正確的結論。一九二七年底土耳其年鑑的發表（是由一九二六年所組織的統計局印行的，出版於一九二七年底），農業的調查與人口的調查，使我們在本文中得能有可靠的（假若不是完全的）材料足供應用。這個彙刊在某種程度上是替基馬爾主義的經濟活動作了個總結，雖然牠有意的將社會生活的許多部分略而不論。

農 業

一九二七年的調查，確定了關於土耳其的一個概念，亦即牠乃是一個農業國家。在13,660,000的人口，居住於農

業區域的有10,534,000人(經營農業的人民有9,145,000,約當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業實為土耳其經濟的基礎。土耳其的農民實為幼稚的土耳其資產階級用以與帝國主義國家作戰和為獨立作戰的基本力量,這種情形,使土耳其的國民黨在土耳其革命發展的某個階段中,必須行許許多多農村改革,這些改革自身帶有充分的不徹底性,一點也不能根本變更土耳其農村方面的社會關係。在這方面的主要設施是:廢除什一稅(一九二五年),改革直接稅制,轉嫁稅收負擔於間接稅,以及提高麵粉與小麥的進口稅等。在這些設施之中,更加之以對農民的少許貨幣資助,退伍農民的重返於生產勞動,在與希臘和議後的將及五十萬的熟練農作者(主要的是烟草種植業方面的)的移入土耳其,——這一切,給了土耳其農業發展一個很大的推動。根據一九二七年的農業調查,土耳其的開墾的土地異常有限,總共不過是43,637,727特諾(每特諾——919,3平方米特。43,637,727特諾約合40,103基羅米特,401,1000赫克塔爾),或者是反之相當土耳其全面積的百分之5,5。

無疑義的,調查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因為在人民農業委員會以前所發表的報告中,估計耕地的面積要遠過於此。但是,我們既然沒有絕對的根據來假定一九二七年的穀物種植的耕田較之前幾年有特別大的縮減,那麼便只有

認為以前發展的數字是不正確的。

	1925年 (農業部的統計)	1926年	1927年 (調查的統計)
穀物種植			
小麥……	31,296,400特諾	35,417,718特諾	22,383,714特諾
大麥……	8,629,880特諾	15,292,581特諾	10,103,598特諾
玉米……	4,748,348特諾	3,467,797特諾	1,749,135特諾
各種穀物種植 包括未曾 指出的……	49,194,135特諾	61,300,000特諾	39,093,220特諾

耕地面積方面的誤計，自然的要反映到收穫量與國家穀產富源的誤計。縱是在豐稔之年，土耳其也很難於自給。一九二五與一九二六兩年的半收，加之以許多提高本國麵包應用的手段(進口稅的提高，烤製麵包必須應用百分之五十的本國麵粉的強制要求，(結果減少了外國小麥的輸入，並暗示出一種土耳其能夠以其自己的富源給養自己的自信。近年來食品的輸入為：

1923年……	161,408噸
1924年……	207,801噸
1925年……	154,918噸
1926年……	40,793噸
1927年之前四月……	7,925噸
1928年之前四月……	12,045噸

後兩年的完全統計，刻下我們還沒有得到。根據調查，

一九二七年的穀物收穫總量爲2,400,397噸，其中小麥爲——1,335,150噸；按土耳其銀行的統計，一九二七年的穀物收穫要比上一年減少百分之三十。一九二八的收穫，則因爲旱災，無論在數量與質量方面都更劣於一九二七年的收穫（見伊斯麥特與基馬爾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與八日的演詞，商業總長拉哈姆倍伊的演詞），這對於土耳其簡直是一個絕大的不幸。有時報張上發表的一些消息，也表明外國食品進口的突飛猛進的增加。在這種關係上君士坦丁堡食品的進口尤爲顯見，因爲牠乃是國內主要的消費中心。君士坦丁堡每月食品的消費量爲一萬二千噸。在一九二六年中，君士坦丁堡幾乎完全是由土耳其的食品來供給（自福蘭克與安那托里（即東土耳其）輸入的每月平均額約爲一萬噸）。在一九二七年，每月平均輸入額則降至八千五百噸；在一九二八年之前四月中更降至四千噸。自一九二八年秋季始，在報紙上開始刊布外國食品大批輸入的消息：自八月初至十月末輸入君士坦丁堡的小麥共爲三萬二千噸，在十二月爲二萬噸。在十一月與十二月期中，自安那托里運入君士坦丁堡的食品則完全停止。由此，我們可以推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在一九二九年中不可免的要有幾十萬噸食品的進口，所以在報紙上也開始在爭論暫時取消麵粉進口稅的問題。食品的輸入，大大的惡了土耳其國家商業的平衡，更進而反映

利拉市價之繼續跌落。

烟草種植與穀類種植並列爲土耳其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之一，並且是現在土耳其最重要的輸出品。（約當全部輸出百分之三十六）。但是，此項種植業，現在正陷於東方烟草在世界市場中所遭受的一般銷售恐慌的厄運中。在大戰之前，烟草種植從沒有在土耳其的經濟中演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如像最近幾年來的一樣。烟草的耕地與收穫爲：

1913年(註)……	590,092特諾	……	49,048噸
1923年……	351,521特諾	……	26,090噸
1924年……	670,170特諾	……	54,059噸
1925年……	663,650特諾	……	56,348噸
1926年……	493,475特諾	……	49,934噸
1927年……	790,765特諾	……	47,531
1928年……	—— 特諾	……	32,000

} 約數

自一九二五年起，土耳其的烟草於希臘及保加利亞的烟草豐收之餘即開始遇到絕大困難的原因，是由於世界對東方烟草的需要之有限（每年約有十二萬噸）。這種情形，反映到耕地的數量，同樣也反映到種植的數量：自一九二七年起，土耳其政府開始採用許多辦法以限制烟草的生產——

（註：是當時整個土耳其的數字；若依現在土耳其的噸士計算，則一九一三年的收穫當爲二萬五千噸）。

在許多地方完全禁止煙草的種植。煙草銷售的困難，重重的壓迫了土耳其的市場：在一九二七年末，先前的煙草收穫的存貨共為三萬二千噸。到一九二八年九月末減為二萬噸。隨着大量存貨的形式，銀行所供給煙草所有人的借貸的利率的百多數則自十五提高到二十一。只是一九二八年秋季始，煙草市場的情況才慢慢變好起來，因為當時限定收穫的總量至多不得超過三萬二千噸；大家都曉得，是年保加利亞與希臘的收穫量都比較上年減少了一倍有半。土耳其國內每年煙草的銷費大約為一萬到一萬二千噸，其餘的則概行輸出海外。

每年出口量如下：

	噸數	價值 (千利拉)	對總出口之%
1923年……	24,524	20,482	24,2
1924年……	26,874	46,581	29,35
1925年……	34,488	60,986	31,5
1926年……	41,562	67,590	36,
1927年(前四月)	7,893	12,455	25,7
1928年(前四月)	11,330	16,920	32,5

在其他的一些農業部門中，必須對果木種植，棉花，橄欖油，麻和鴉片加以研究。

土耳其各種園藝種植的耕地，約計有三千一百萬特諾

(根據農業部的統計)。在國家經濟與出口事業中佔有重大意義的乃是葡萄與無花果的種植。士麥拿附近的一些區域，是水果的輸出地，因此在沒有關於各區域的完全統計時，通常便引用士麥拿的統計，其歷年之葡萄，無花果的收穫以及其輸出在國家出口中的地位，如以下兩表所示：

士麥拿之葡萄收穫 輸出 士麥拿之無花果收穫 輸出
(以噸計算)

1913年……	62,500	—	—	30,569
1923年……	36,608	20,800	20,480	19,110
1924年……	49,280	47,800	29,450	23,430
1925年……	30,009	24,500	22,500	22,094
1926年……	35,500	28,800	27,200	24,916
1926年……	48,000	39,100	28,500	18,212
1928年……	45,000	—	—	—

土耳其各種果品的輸出

	噸數	價值 (千利拉)	對總輸出之%
1913年……	—	—	20,2
1923年……	77,460	20,833	24,6
1924年……	105,062	39,477	24,8
1925年……	82,954	37,617	19,4
1926年……	83,533	34,687	18,5

10	動	力	
1927年……	{ 19,087	9,045	18.7
	{ ———	9,184	———
1928年……	30,836	——	1,76

上面引用的數字，說明葡萄與無花果的收穫還沒有達到戰前的水平。世界市場之對土耳其果產之不利的行情，顯然的呈現在我們眼前：在一九二七與一九二八兩年中，數量雖然加多，但價值則依然如故。鴉片生產在一九二七年為18,000奧考對一九二六年的252奧考（一奧考約合三磅）

橡實的收穫與甘草的生產在近幾年來也很快的提高起來。

	橡實	甘草
1924……年	27,466噸	300噸
1625年……	30,718噸	2,688噸
1626年……	22,013噸	1,109噸
1927年……	34,888噸	3,152噸

棉花的收穫：一九二五年——76,011噸(?)；一九二六年——27,341噸；一九二七年——38,905噸。在一九二八年中，棉產區遭受了嚴重的旱災，這當要異常有力的影響到輸出的數量。在國家總的輸出中，出花與棉製品大約佔有百分之八（後者的的數量極其有限）：

棉花與棉製品的輸出：

	重量(噸)	價值(千利拉)
1923年……	9,915	6,701
1924年……	12,694	11,948
1925年……	17,665	15,476
1926年……	17,051	12,012
1927年……	5,778	2,014
1928年……	4,646	3,361

}前四月

爲了結束土耳其農業狀況的敘述，我們最後來簡略的說一說牧畜業的狀況，特別是小牲畜(牲畜稅收的主要對象的數量)，——牠乃是大量商品生產(羊毛)的源泉。

	絨羊與山羊	昂哥拉羊
調查 { 1913年……	23,910,985	2,776,503
1927年……	16,597,365	2,571,584

一九二七年的調查的數字，表明牲畜的數量比戰前還差得很多；但是這個數字和財政部的統計有很大的分歧。根據後者，則稅收所及的絨羊與山羊的數目共爲21,918,169頭，冒格爾羊爲3,110,728頭。應當承認財政部的統計要比較近似些，牠所指出的小牲畜牧羣的發展(在一九二三年絨羊與山羊——1,519,1920頭，冒格爾羊——2,042,052頭)在土耳其羊其與毛製品(毛氈)輸出的發展上也同樣的得到了證明。羊毛輸出達到土耳其全部輸出的百分之十，其歷年數字

如下：

	噸數	價值(亨利拉)
1923年……	6,730	8,214
1924年……	8,534	13,170
1925年……	5,896	11,170
1926年……	10,173	16,057
1927年……	2,504	4,852
1928年……		
} 前四月		

最爲有趣的，而我們還幾乎完全未曾語到的乃是土耳其農民狀況的問題與土耳其農村中發展的過程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異常複雜的。土耳其土地關係的特殊情形（土地過剩，許多爲國家所有的土地和許多全未墾殖的土地可以隨時給予任何一個願意耕作的人）——使許多土耳其的要人們都肯定在土耳其根本無土地問題之可言。本文的任務不在於研究土耳其的土地關係以及其歷史發展，所以在這裏我們只簡要的指出，在土耳其土地關係的基礎上的不是缺乏土地和土地集中於少數大地主手中的問題，而是在於農民之缺乏耕作土地的工具，缺乏種子與牲畜。由於工具的缺乏，遂形成了租借與工役——在最苛重的形式之下。在土耳其土地關係的基礎上的，實爲國庫之“專注於農村”（這是土耳其帝國時代的賦稅制度，建築在盡量徵斂農民的

基礎上)的關係,這種關係若是在廢除什一稅之後而有所變動,那麼基馬爾主義在政府的政策,——牠無疑的是建築在富庶的富農的利益上的,依然是絲毫不能改善整個農民的地位。

在我們手頭沒有任何關於各種私有者(地主,富農)間耕地分配的可靠材料。有時在我們報張上遇到的一些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都很不確實。土耳其官廳的統計,則略過了這個問題,——或者是有意。但是我們根據官廳的統計,還是可以作出幾個結論,證明土耳其農民所處情形的困難。一九二七年的調查,規定農村經濟單位的總數為9,751,239家,人口總數為9,145,008人(亦即每家平均人數為5,1);每家耕地的平均數為二十五特諾。就這個數字本身,當然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但除了這些數字之外,調查更作了一個關於土耳其所有的農業機器,工具與器械的統計。無疑義的,調查是將機器(耕種機)和器械(犁和耙)混為一談,——農業機器與器械的總數共計為1,413,509;換句話說,就是337,730個農家沒有任何耕作的工具;若是計算到有許多農家(已經不說臨地中海一帶的和克里克島的地主經濟)佔有幾個工具的情形,那麼沒有農作工具的農家大約可以假定為六十萬到七十萬。從這個隊伍中遂徵集出了農業僱工;大量的租借者亦由此而生——他們必須支付很高的代價去租

借農業工具和耕畜。這種情形，便決定了農村中的奴役關係。

在牲畜方面的情形猛一看去彷彿要稍稍好一點。在土耳其，大小牲畜合計為28,671,859頭，若是從這個數字中減除191,119,000頭小牲畜（山羊，綿羊），減除1,096頭小驢子和178,100頭小馬，那麼所餘的可以在經濟中像人工一樣應用的大牲畜還有7,728,000頭，亦即每家平均可以得到4 $\frac{1}{2}$ 頭。調查沒有說明各種私有者間耕地的分配，同樣牠也沒有說明各種私有者牲畜的分配，——但是根據我們上面所說的，可以想到很大一部分農民是完全沒有耕作牲畜的。

若是來研究國家（經過農業銀行）對農民所施的幫助的統計，則如下所示：在一八二三年——4,807,604利拉；在一九二六年——16,294,210利拉，亦即每個經濟單位每年的平均借款額不出十個利拉。當然的，有許多經濟單位自然是得不到一點借款，因為銀行主要的只是貸與那些深耕的（烟草與棉花）和最有保證的經濟（關於每次所發的借款額，同樣也沒有任何的統計）。這樣，銀行對於多數的農民，未曾給予任何的幫助，而把他們交到高利貸者的手中。這些高利貸者只是在很高的利率下才肯發出借款；他們在收穫尚未長成時便預約了去。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國家銀行的烟草種植借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廿一；無怪乎個別高利貸者之私人

清算利息通常總要達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在一九二八年中安那托里中部的凶荒，引起了國家方面的一點幫助，無疑的，這是完全不夠的。農業銀行為購買種子而支出了2,310,000利拉，隨後則以借款的形式分子農民；同時又不取息的支出了59,000利拉(?)為購買麵粉與草料之用；此外，紅十字會又支出了500,000利拉(見伊斯麥特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號的演詞)

對外的與國內的商品流轉

我們沒有國內商品流轉總額的統計材料，交換曠大的間接指標乃是關於六條鐵路貨物運輸的統計。近年來貨物運輸量的數字如下：

	各路線的	其中安那托里路 線所佔的數量
1923年……	1,005,146噸	313,168噸
1924年……	1,246,370噸	372,948噸
1925年……	1,338,160噸	441,559噸
1926年……	1,455,090噸	415,878噸
1927年……	——	540,717噸

在這個圖表中所表現的各路貨物運輸量的增加，證明了國內交換的興旺。阿金——士麥拿鐵路公司的報告，則是一個相反的指標，牠表明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的貨物運輸

比較一九二七年同期的運輸減少了百分之10,57(食品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二,橄欖減少了百分之七十)。

對外貿易的指數,不成問題的是表示這方面情形的惡化,流轉速度的遲緩與消極的商業平衡的加勵。如像以下的統計所示的一樣(可惜我們只有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前四個月的統計),這個惡化是開始於一九二六年,而在後兩年中則依然繼續演進着。對外貿易流轉的一般結構,很顯然的在下面的圖表中表示了出來(以千利拉計算):

	進口	百分比	出口	百分比	入超
1923年.....	144,789	100	84,651	100	60,138
1924年.....	193,611	134	158,867	187	34,744
1925年.....	242,354	168	193,119	229	49,235
1926年.....	234,591	162	187,742	222	46,849
1927年 前四月	68,596	47	48,404	57	20,192
1928年 前四月	71,192	49	52,120	61	19,072

雖然輸出的發展速率經常的多少趕過輸入的發展速率,但是,在近兩年來流轉中輸入與輸出的相互關係和前幾年已經稍有不同,也就是多少變壞了些。關於這點,可以由下面的數字中看出來:

百分比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流轉中的輸入…… 63,1 55 54,5 55,5 59 57,7

流轉中的輸出…… 36,9 45 45,5 54,5 41 42,3

若是一九二七與一九二八兩年的流轉是依着各該年之前四月的速度進行（通常前四月的流轉等於常年的三分之一），那麼在我們面前便呈現出一幅對外貿易流轉急劇惡化的圖形，這種情形大半是由於我們在敘述業農情形中我們所指出的國際市場中土耳其商品之不利的行情。

關於土耳其輸出的成份，我們在前面已經相當詳盡的說過了，所以在本章將不再重提。現在我們只限於對土耳其輸入的成份，亦即對其輸入中各重要商品之比重作一圖解：

商品	1923	1924	1925	1926
食品……	10,1	11,8	9,3	2,6
殖民地商品與糖……	10,3	9,2	8,6	7,8
棉製品……	37,1	32,9	30,6	30,9
毛製品……	6,7	6,8	7,3	8,9
金屬品……	5,3	8,3	8,9	9,5
機器與器械……	0,9	2,9	3,2	4,3

金屬品與機器之比重的增高，證明工業建設（首先是鐵路建築）的稍俱端倪。但是就整個說來，土耳其的進口顯然的帶着消費的性質。

在各列強之參預土耳其的對外貿易流轉上，首先表現出的便是任何國家都沒有特別的優越作用。

國家	1923	1924	1925	1926
	輸 入			
意大利	19,57	21,17	17,92	15,83
英吉利	17,31	17,71	15,62	14,08
法蘭西	9,14	9,45	10,76	13,61
德意志	6,37	9,87	11,32	13,78
蘇聯	2,10	3,29	2,52	3,64
合衆國	7,64	5,88	8,11	3,49
比利時	5,12	4,53	4,94	5,76
	輸 出			
意大利	17,96	21,96	26,15	27,56
英吉利	18,61	10,32	9,3	11,35
法蘭西	12,41	14,83	12,52	11,22
德意志	9,01	14,66	14,32	12,56
蘇聯	2,05	2,35	2,54	2,80
合衆國	7,97	12,94	13,00	13,22
比利時	—	—	—	—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指出英吉利之作用的顯著的減弱，意大利之作用的漸形降低，與德意志之作用的逐年增強。

工 業

我們以前曾及時很詳盡的闡明過土耳其政府在擴大其本國工業基礎方面的一切設施(請參閱一九二六年的“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十二號)。前面所說的年鑑中發表的總的統計，使我們有可能為基馬爾主義經濟方面的活動作一個總結。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牠在建設本國製糖工業上的設施之無疑的成效。根據一九二五年四月五號保護製糖工業法令而組織的兩個企業(在阿波爾，佛蘭克及烏沙克。均有外資之部分的參加)，在一九二六年底業已開工。土耳其一九二七年的糖產總額為5,180噸，約當其全國總消費量的百分之十。投資的總額，大約有3,200,000利拉。

在採掘工業方面，應該指出愛列格松布拉達地方石炭採掘量的顯著的增加，大約比較戰前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大部分的石炭被運輸出口，因而隨着減少了石炭的進口。現在全國幾乎是純粹使用本國的石炭，不過牠的採掘則三分之二是握在外國公司的手中(法蘭西公司，大希臘，以及意大利的邊吉爾愛列格)。

年代	煤產(噸)	出口(噸)	入口(噸)
1913年…	826,899	—	—

20	動	力	
1923年…	870,820	100,356	50,926
1924年…	1,088,583	168,499	96,259
1925年…	703,443	154,416	66,656
1926年…	1,222,387	200,000(約數)	50,000(約數)

其地採掘工業部門的情形和戰前比較起來，如下圖所示。根據這個圖表，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有鉛（法蘭西的企業——巴利—卡拉金）和銅（顯然是在克福爾次干）的開採得到相當的發展；換句話說，也就是在與蘇聯結訂卡爾斯克協約之後所歸併於土耳其的一些區域中。

	1913年	1926年
磺酸鹽……………	29,126噸	6,445噸
硝石……………	42,488噸	6,060噸
磷砂……………	21,535噸	17,360噸
鉛……………	14,200噸	17,673噸
鋅……………	4,524噸	——
鐵……………	6,146噸	——
銅……………	87噸	7,534噸
銻……………	1,142噸	600噸
水銀……………	41噸	161噸
鹽……………	100,000噸	——

如上面的圖表所顯示的一般，因為資本的不足，而使發

展採掘工業與開發礦藏的偉大計劃無從實現(銅,五金企業)。

開發煤油產地的提案(一九二六年的法令),因為除了割讓於伊拉克的莫索爾之外更無豐富的蘊藏而作罷。

關於土耳其製造工業的生產量,我們沒有總的統計材料。在一九二七年的調查中,只包含國內現有的企業數目,其中僱用工人的數目與應用發動機的數目。所發表的關於土耳其工業狀況的統計中,有許多可貴的條款,給了土耳其工業一副一般的明確圖形。

到一九二七年止,土耳其登記的企業數等於65,245,工人的數目等於256,855;由此可以斷定,一切手工業作業都被算入工業企業的數字中。若是對這個調查的統計加以詳細的研究,那末就可以看出,在上述的65,245家企業中間,有23,316家就只有一個人作工,有4,914家一個工人之外更有他的家族共同作工。這樣就有28,230家工業企業(也有等量的工人)應該摒除於計算之外:在剩下的37,015家企業中,一共有288,655個工人作工;因為土耳其的統計常是把業主也當作工人,所以我們假定土耳其產業工人的數目為191,650人(其中職員佔7,817人)想不致有大的錯誤。規模較大的企業數目,很是有限。使用發動機的企業數目2,822,其發動力總量為163,548馬力,僱用十個人以上的企業計為

2,061家；僱用一百個人以上的企業計為155家。各部門工業間企業數與發動機數的分配則如下所示：

工業部門	企業數	摩托機數	馬力數
採掘工業·····	45	298	14,326
農產品製造業·····	1,276	1,795	37,251
紡織工業·····	244	520	15,855
木材工業·····	380	708	8,664
製紙工業·····	117	222	558
五金工業·····	427	691	7,427
建築工業·····	31	91	5,502
化學工業·····	94	151	3,942
混合形式的工業·····	10	18	562
其他部門·····	195	356	69,621
	2,822	4,850	163,548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圖表中最後一項未曾指名的工業部門——其他部門。牠的企業數目不多(195)，發動機的數目也很有限(356)，可是牠的發動力馬力數目却最高——69,621匹馬力，其中屬於電動機的為59,062馬力。大概是一切市政方面的企業機關(電車，電站)都列入在這個最後的項目中。

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們不能斷定土耳其全國工業的生

產總量（尤其是製造品的生產）和牠在國家經濟中的比重；（註）同樣我們也不能斷定國內市場的某一種需要和多大的數量是由本國的生產來供給。根據土耳其的進口統計看來，牠本國所有的紡織工業遠不能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因為，即如在一九二五與一九二六兩年中的棉製品與棉織品的進口，相當為29,441噸與31,747噸，其總價值則相當為74,204,000 利拉與 7,198,000利拉。同此兩年中的毛品的進口則相當為3,953 噸與17,636,000利拉，4,438噸與20,952,000 利拉。製成的衣著的進口價值為4,526,000利拉與3,030,000利拉。絲製品的進口為4,675,000利拉與5,696,000利拉。紡織品進口的總和（包括麻製品）當在一萬萬利拉以上，相當進口總和的百分之四十五。糖的生產（只是在一九二七年）大概可以供給全國消費量的百分之十。熟皮的輸入在進口中也佔有很大的位置，由此可以證明本國皮革生產的不足，土耳其輕工業的情形大致如此；至於重工業，則在土耳其還完全沒有。

我們不敘那為人所共知的土耳其工業落後的歷史原因，但必須指出，國家一般的貧乏，資本不足，投資商業較優於投資工業，——凡此種種，都是建設本國工業事業中的決

註二無論如何工業生產的比重總是很小的。按土耳其銀行的統計，在八萬萬利拉的民族收入中，歸於農業的份量達到百分之八十。

定原素。

但是，假如認為基馬爾主義者之政府在國家工業化這個領域內毫無所成，那便是一個不正確的論斷。新出現的大量的小手工企業，發動機數目的加多，手工業生產相當的發展與新工業部門的出現（製糖，水門汀，編織，罐頭），——這一切，都應視為新統治者的成績。在土耳其相當豐富的原料基礎上，若是具備資本和正確的關稅政策（自一九二九年起土耳其得到了關稅自主，因為一九二三年在洛桑會議上所訂的通商條約的有效期到此完結），就能夠漸漸的樹立並發展土耳其的輕工業。在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乃是吸收外資的問題，因為無疑義的國內資本積壘是完全不敷的。

投入土耳其工業中的是什麼人的資本呢？這個問題非常難於答覆。根據年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號的統計，在土耳其有四十五個無名的工業會社，其資本為8,044,050利拉；有八個從事於探礦的公司，其資本為6,450,000利拉。這個數字，無疑的是過分縮小了些。同時，這個統計依然不能使我們得知土耳其資本與外國資本的數量，因為在“土耳其無名會社”這個商號名稱之下，包藏着部分的與純粹的外國企業。所發表的關於土耳其外國企業與會社的統計，有兩個絕大的缺陷：第一，沒有按照營業種類的分類（工業，商業）；第二，關於這些會社的資本額是依其組織地的法定資本計算，

而未曾把牠在土耳其登記的資本劃分出來。例如在說明十二個在土耳其營業的美國企業的資本數量時，得出如此駭人所聞的數字——285,000,000美金。

我們根據土耳其雜誌上所發表的一些在土耳其營業的許多會社的報告，關於工業方面的外資數量大約可以作出如下的計算：在礦業方面的投資為16,429,000紙利拉，在製造工業方面的投資為16,392,000紙利拉。

在市政工業企業方面（電車，電燈，電話，自來水，瓦斯等）的外資數量約為二千八百萬紙利拉。這些資本的絕大多數是戰前投下的（在計算中，資本額則按照現在利拉的市價折算）。

在完結了土耳其工業狀況的敘述之後，我們要簡略的說一說工人階級的狀況，但是在這方面可以為我們應用的材料，更是特別的貧乏。我們在前面曾根據調查而假定土耳其的工人數目為190,000人。在這個數字上，還應該加上15,403個鐵路人員（工人和職員）和一些海上運輸的與鐵路建築上的工人。這樣，土耳其工業無產階級（包括手工業者）的數目，大約可以計算到卅萬人以上。

直到現在土耳其還沒有勞動法。工人與企業主的關係，工作時間的長度，童工與女工的保護，社會保證問題，——都沒有絲毫的規定。形式上，根據一九〇九年七月廿七號的

古法，在土耳其根本禁止社會公用企業中的罷工；根據這個法令，更禁止一些企業中職工會的組織（未曾規定某種企業應屬此類），禁止普及於全部土耳其範圍內的組織之創立。土耳其的職業組合，在形式上是根據所謂結社法（一九〇九年八月三號頒佈的，在這上面完全沒有提到工人組織）而限定其行動範圍為不得存心破壞社會秩序與作非法要求（任何一個罷工都可以適用此項保留）。當一九二五年三月四號的枯爾特暴動時所頒佈的社會秩序保護法，在形式上是反對反動勢力的，但實際其全部的鋒銜都是著目在工人組織，而工人組織也正是遭了這個法令的破壞。土耳其工人階級的狀況異常悲慘。無論土耳其官場統計如何的隱飾一切有關於社會關係的問題（例如年鑑在發表結婚的統計時，不發表生殖與死亡的統計），無論土耳其的一些政論家如何的描寫國家的一般幸福與沒有階級鬥爭，但是我們總可以根據一些零星的材料而說明工人階級一般的狀況。所發表的工業調查的統計，說明在165,886個登記的工人中，有14,577個男孩與8,107個女孩（十四歲以下的），也就是說有百分之十四的童工。很可惜，我們沒有14—17歲的青年工人數目的統計，和不知道十四歲以下的童工中的年齡分配。

工作日的長度沒有規定【在有些工廠中往往達起十六點鐘），免費的療治制未曾行施。（免費療治是一九二八年末

電車罷工時所提的要求之一)。工資異常低微：按年鑑的統計，煤產區的工人在一九二六年中平均每天得到109皮斯特（一利拉等於一百皮斯特）。每噸煤的平均工資為2,91利拉。根據士麥拿商會的統計，煙業工人每天得到：男工——從1利拉到2利拉，女工——從80皮斯特到1利拉；農業工人——從1利拉到2利拉；工廠中的學徒——每天從50—80皮斯特。土耳其的生活程度是很高的。在利拉市價較之戰前跌落8—8½倍中，生活程度在一九二七年提高了14,52倍。土耳其“生活程度指數”（在斯塔布爾）在一九一四年值235皮斯特，而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則值3,488皮斯特。（亦即增高13,88倍）。至於指數中的食品部分，則在一九一三年值149皮斯特，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則值2,254皮斯特（增高14,05倍），在昂哥拉更要高些（增高17,17倍）。

在這種情形下，亦即在生活程度日益上升，工資低微，工資增加落後的情形下，工人階級的狀況是十分困難的。

運輸與鐵路建築

鐵路建築，是基馬爾主義者政府得到最大成績的一個領域。土耳其共和國由舊帝國的手中只得到了極其有限的鐵路線（4,243基羅米特，或每平方基羅米特土地中為0,6基羅米特），大半是分布於安那托都的西部和西南角，同時

在安那托里的中部和東部，則幾乎完全沒有。發展國內商品交換和連絡農民市場（中部與東部之安那托里）與國家主要中樞的任務，開發礦藏的任務，最後，戰略方面的問題與保護國內治安的問題（大家總還記得，當一九二六年塞旦酋長暴動時，掌握巴格達鐵路南段管理權的法蘭西當局，不允許運輸土耳其的軍隊）——都迫切的要求基馬爾政府來從速發展鐵路的建築。

在這裏我們不來敘述土耳其鐵路建築的歷史，只是指出，自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的時期中，土耳其經過了四個階段。從終歸失敗的吸收中立國的資本之企圖（一九二三年契斯特爾的租借）進到依賴國家預算的經費而獨立建築（自一九二四年起），又企圖吸收外資，（一九二六年）又歸失敗，——重新回轉到自行築路。關於第二次吸收中立國資本的企圖我們須要稍為詳細的解釋（比利時與瑞典的）。

在一九二六年末與一九二七年初，與瑞典的集團尼得克維斯塔和浩爾馬，同樣也與比利時的集團（運輸工業協會簽訂了昂哥拉——愛來格拉（580基羅米特），鳩來爾——甲爾別克爾（500 基羅米特）與卡薩利亞——土爾沙爾的築路合同。此外，更同德意志集團簽訂了自烏魯克什爾到卡薩利亞的築路合同。合同的要點在於只將鐵路的建築權，——而不是管理權，交與各該集團，同時，建築者在建築中應使用

在安那托里的中部和東部，則幾乎完全沒有。發展國內商品交換和連絡農民市場（中部與東部之安那托里）與國家主要中樞的任務，開發礦藏的任務，最後，戰略方面的問題與保護國內治安的問題（大家總還記得，當一九二六年塞旦酋長暴動時，掌握巴格達鐵路南段管理權的法蘭西當局，不允許運輸土耳其的軍隊）——都迫切的要求基馬爾政府來從速發展鐵路的建築。

在這裏我們不來敘述土耳其鐵路建築的歷史，只是指出，自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的時期中，土耳其經過了四個階段。從終歸失敗的吸收中立國的資本之企圖（一九二三年契斯特爾的租借）進到依賴國家預算的經費而獨立建築（自一九二四年起），又企圖吸收外資，（一九二六年）又歸失敗，——重新回轉到自行築路。關於第二次吸收中立國資本的企圖我們須要稍為詳細的解釋（比利時與瑞典的）。

在一九二六年末與一九二七年初，與瑞典的集團尼得克維斯塔和浩爾馬，同樣也與比利時的集團（運輸工業協會簽訂了昂哥拉——愛來格拉（580基羅米特），鳩來爾——甲爾別克爾（500 基羅米特）與卡薩利亞——士爾沙爾的築路合同。此外，更同德意志集團簽訂了自烏魯克什爾到卡薩利亞的築路合同。合同的要點在於只將鐵路的建築權，——而不是管理權，交與各該集團，同時，建築者在建築中應使用

自己的資本，以後則由土耳其政府在一定的限期償還。合同豫定建築期為五年，償還期為十年。瑞典的集團更約定供給行駛方面的材料。雖然商業方面說來此項合同是完全不利的，但是土耳其政府為了取得借款與加速建築起見還是同意了。

但是，取得借款的希望還是未曾如願。外國資本家在債務問題未曾清理前不心願把自己的資本投進土耳其：在比利時集團方面，不肯出資，合同因之作廢；至於瑞典的集團，則到一九二八年中止，所表現的不是瑞典人貸與土耳其人，却恰恰相反。瑞典人從土耳其入手中拿到了15,000,000利拉，但是所進行的各種工程總共不過值3,000,000利拉，此外更將原來55,000,000利拉的豫算案增加為115,000,000利拉。結果合同變更了，土耳其政府拒絕了這個太貴的借貸，而瑞典集團反而變作了土耳其政府所支出的工程費的債務人。建築費以及預約的機車與車輛的費用的平均利率還是很高(百分之十六)。

鐵路的建築費對於土耳其的國家預算(社會工程部)是十分繁重的負擔，其額數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為25,723,000利拉，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為32,717,000利拉，亦即相當其預算的百分之十五；馬路的建築費在社會工程部的預算中為2,169,000利拉，在地方預算中為7,803,000

利拉。社會工程部自一九二四年來的支出總額為115,000,000利拉，按照預定的建築程序，還必須200,000,000利拉的投資；此項投資的結果，將使土耳其的鐵路網增加2,500基羅米特。在現在很難豫言這種支出的經濟效能和將來鐵路收入能以如何的程度來補償這種支出（並且在多長的時期）。土耳其各幹路每年的純益額在一九二七年為：安那托里鐵路——每基羅米特2,562利拉；土麥拿——卡薩巴鐵路1,425利拉；土麥拿——阿丹鐵路2,506利拉。無疑義的，新鐵路在前幾年的收入不能達到這樣的數目；但是縱然按照安那托里——巴格達鐵路的收入計算，新鐵路每年的淨益至多也不過是 $2,500 \times 2,500 = 6,250,000$ 利拉，相當其建築資本（約為三萬萬利拉）的百分之二——這種利潤率要算是很低的了。自然的，鐵路建築的效能當然不只單純的表現於鐵路營業的本身，並且應該計算到在落後區域中由新鐵路建築而引起的經濟結果。

在一九二七年底完成了幾段以前開始建築的路線——安哥拉——卡薩利亞（380基羅米特），薩姆蓀——土耳其（133基羅米特）——在連接安哥拉與薩姆蓀中還剩有自土爾沙爾——錫伐斯與錫自伐斯——卡薩利亞的兩段；此外更完成了薩姆蓀——察爾沙姆（37基羅米特）與亞得利亞灣之伊利治——帕爾姆特里加（28基羅米特）的狹軌鐵道——總計

自一九二四年來完成了580基羅米特鐵路。一九二八年，更開始了苦塔赫亞——塔夫陝拉路線的進行(23基羅米特)。業已開始的安哥拉——愛來格拉，鳩來爾——甲爾布克甫，烏拉克什爾——卡薩里亞等路線的建築工程，則進行得非常遲緩。

在一些新的計劃之中，應該特別指出錫伐新——愛爾謝龍的建築計劃，牠將自高加索邊境到愛爾謝龍龍的狹軌鐵道連而為一。費用大約是一萬萬利拉。一個美國的公司“福克斯”也進而作這條路線建築的逐鹿者。

銀行財政預算

土耳其正遭受異常的金錢窮迫。民族進款總共不過八萬萬利拉(預算吞佔三分之一)，而國內的資本積壘又非常有限。

在土耳其活動的一切土耳其銀行的資本額如下(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號發表的報告)：

銀行	資本
實業銀行 (與國家信託銀行相合).....	4,000,000利拉
阿克色拉之手工業銀行.....	1,000,000利拉
礦業銀行.....	6,167,000利拉
阿克色拉之煙草貿易銀行.....	500,000利拉

農業銀行·····	30,000,000利拉
浩治伊雷之國民銀行·····	500,000利拉
赫底福阿巴斯赫爾姆之工商銀行·····	1,000,000利拉
	42,000,000利拉

若是除了專為農業借貸而設的農業銀行和經費幾乎完全用於國家工廠建設中的礦業銀行，那麼可以為工商業信託事業之用的純粹土耳其銀行的資本總共只有 6,500,000 利拉。除農業銀行與礦業銀行外之各銀行徵集的經費(存款)共為230,000,000利拉，亦即可以轉用於信託事業的總資本不出三千萬利拉。這一些銀行營業的總出支額為六千萬利拉。

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經濟之依賴外國銀行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尤其是土耳其銀行，牠乃是土耳其最古的財政機關，在一八六三年，根據特殊的讓與權而組成，有效時期至一九二五年為滿，今則延長至一九三五年。

土耳其借款的全部歷史，都與土耳其銀行這個名稱有關，牠不只在土耳其營業，並且廣佈其分行與近來各國及波斯(在土耳其有三十處分行，在其他各國則有二十九處)；我們無從斷定牠直接在土耳其作些什麼營業，也無從得知牠在土耳其的支行中有好大財力。銀行的資本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號為五百萬金磅，準備金——1,250,000金磅，存

款與流水帳13,533,000金磅，也就是說資本和存款總額（21,864,208金磅）大大超過了土耳其全國各銀行財政力的總和。銀行直到今日還是土耳其實際的會計處，牠積蓄了全國大部分貨幣財富；同時牠將自己的資本和以前一樣的積爲現金與各種貴重物品，只靠所吸收的資本活動，並且在活動中完全依牠自己的視線爲轉移，絕少顧及到國家的利益。

除土耳其銀行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外國銀行的支店營業（十六個），但是無論是這些支店的資本額或是營業範圍我們都無從判定，因爲所發表的只是該行的營業總額和法定資本的統計——不管牠在土耳其領域內只作很少的營業，——有時甚至連這一點都不完全。在這些銀行之中只有薩郎尼克銀行在君士坦丁堡有牠自己的經理處，但是牠的營業（主要的是煙草貿易）又不限於土耳其，並且遠及於希臘各地。

外國銀行的主要營業是集中在與各國的信託事業的經營（數目很大）。

假若除去德國的銀行不計外，那麼沒有一個外國銀行肯把牠的財力用之於發展國家的生產力中，而僅僅作一點商業營業的信託事業——就這也不充分。信託的不足，無疑的是國家現代經濟中一個最惹人注目的事實。

國家銀行的建立早已成熟，尤其是國家貨幣資本經常

因爲一些極偶然的原因而發生動搖（雖然利拉跌價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嚴重的經濟混亂），要使貨幣本位穩定，國家銀行更成爲絕對必須；但是由於財力的不足而直到現在還未曾實現。

現在我們來開始研究土耳其的國家預算，在這裏應該記起我們報張上多次指出的此領域中之大的成功和一九二六——二七年由於改革稅制，擴大專賣及節減支出而達到的預算平衡。預算平衡乃是最大努力和斷然加重賦稅負擔的代價換來的。這種負擔，首先是落於國民中經濟能力最薄弱的一些層級。

近幾年來的預算，可由下表觀之（以千利拉計算）：

	1926 27年	1927 28年	1928 29年
收入……	190,158	194,580	207,173
支出……	189,407	194,454	207,169

關於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預算執行過程的統計，表明出超過了預算的計算——七百萬利拉（204,167,000利拉）。本年度也有少許的超出。

在取消什一稅實行新稅制之後，土耳其共和國的預算是由三個主要的部分集合而成——直接稅，間接稅與專賣；所謂專賣，實際上大半是變形的海關稅與消費稅的提高，也就是說等於間接稅。賦稅收入和專賣在預算中的比重在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八十六，其中直接稅——23,3%，間接稅——35,2%，專賣——27,5%，這三種收入的總數爲176,308,000利拉。

直接稅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中預定爲 46,398,000利拉，在這個數目中直接落於農民身上的只有土地稅（大約一千萬利拉）和牲畜稅（13,003,000利拉）。很有趣的；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的土地稅較之上年減少了一百五十萬利拉；這是由於在上年中實際上短收了三百五十萬的緣故。此外農民並不再繳納任何的直接稅。在未取消什一稅時，農民每年大概要繳納四千萬利拉（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

在其餘的稅收中還有所得稅——13,300,000利拉，牠是根據算術的累進法和對高級收入之無比例的減徵。遺產稅也是應用這個原則。須要說明，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中所得稅定爲一千萬利拉，實際收入則爲12,664,000利拉，也就是說，國家在預算中過低的估量資產階級的稅收可能性，過高的估量農民的稅收可能性，在其他直接徵收之中，我們更指出城市建築物稅與森林，礦山稅。

間接稅的收入爲71,580,000利拉，其中海關稅爲31,400,000利拉，消費稅與流轉稅（商品價值由甲方轉於乙方的徵收）爲38,850,000利拉。海關收入比較上年（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減少三百萬利拉,由此可以證明對外貿易流轉的縮減。

其餘各種間接稅收入爲16,20,000利拉(海上徵收,狩獵,漁業,衛生捐)。

專賣的收入爲50,040,000利拉,其中煙草專賣——22,000,000利拉,食鹽——10,000,000利拉,糖——5,500,000利拉,煤油與汽油——5,500,000利拉,火柴——1,760,000利拉,酒——7,284,000利拉。此外,郵政,電報,電話與無線電的收入(7,284,000利拉),以及彈藥專賣的收入(967,000利拉)也都應該加於專賣稅上。除了後者屬於國家專利外,其餘的都應歸於間接稅之列。對農民直接課稅的減少,自然要靠提高間接稅來補償,這樣第一便加重了城市的負擔(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中間接稅爲47,000,000利拉,專賣——20,000,000利拉,共爲67,000,000利拉,在現在則共爲120,000,000利拉)。

我們無從斷定城市和鄉村二者對間接稅的繳納數目;但是,因爲許多農產品流通的免稅,因爲土耳其農民以許多手工製品代替了舶來品,(以葡萄代糖,以植物油代煤油,以自製的粗布代洋布),所以我們可以推測,間接稅收的負擔首先是壓在城市中一些貧弱人民的身上——手工業者,僱員與工人。

預算中其餘的收入種類則為印花稅和訴訟稅——10,786,000利拉；國家財產與企業的收入——870,000利拉；雜項——13,213,000利拉。國民每人對預算的平均担負為十五利拉，單單對稅收的担負為十三利拉，同時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不過五十八利拉，這證明國民賦稅負擔的苛重（亦即達到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

我們已經分別敘述了預算中的個個項目，現在來論一論國債的問題。自一九二四——二五年起，每次預算中都列入了清償債務的費用：一九二四——二五年——14,016,000利拉，一九二五——二六年——15,750,000利拉，一九二六——二七年——10,136,000利拉，一九二七——二八年——9,874,000利拉，一九二八——二九年——13,486,000利拉。

在這個數字中並未包含外債，而後限於對內債的清償。

土耳其的資產階級政府在洛桑和會上承認了土耳其帝國的債務。所剩下的只是支付數目與支付本位的問題（伊斯麥特在洛桑拒絕支付現金）。這個問題一直等持了五年沒有解決，因為土耳其還沒有達到非與其債權人妥協不可的地步。但是，顯然的，沒有外資的幫助，土耳其資本主義的發展簡直是不可能，這便是推動基馬爾主義者政府終於妥協的唯一動力。

凱馬爾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號國會最後一次會議開幕時的演說中毫無二意的指出，爲了國際的信託和德道的義務我們不能不簽定巴黎協定，據他的說話，現在還很難預言土耳其在執行其所負債務中能夠達到如何的程度。實則，協定所加於土耳其的負擔真是太重了。

我們不能敘述協定中十分複雜的財政條款，現在後只說明，土耳其在巴黎承認了牠在洛桑所沒有承認的，亦即承認了支付現金，同時也沒有達到按名義法郎支付的要求，這就是說在支付中還要計算到法郎的跌價（只有一八七〇年的借款是例外，許可按名義上的數目清償），支付的總額規定爲84,597,495利拉，每年繳納分配如下：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2,000,000金利拉，一九三六——四二年——2,380,000金利拉，一九四二——四七年——3,780,000金利拉，一九四七——五二年——3,180,000金利拉，一九五二年之後則爲3,400,000金利拉，直至償清爲止。

支付自一九二九年六月開始。每年支付額的担保是關稅收入與消費稅——斯塔姆布爾，哈達爾與哈拉塔的關稅局，自一九四二年起更加上薩姆蓀的，假如不足，則缺額應由他項國家收入擬付。這一切收入都應當以債務委員會的名義存放於斯塔姆布爾的土耳其銀行中，土耳其的利拉應當折爲金磅。爲了保障債權人的利益，在巴黎組織了兩個機

關——債務委員會與債權人委員會，——可是，這兩個機關自然一點也不像以前的土耳其財政監督委員會。

在一九二八年末除了簽訂了帝國債務支付協定外更與安那托里——巴格達鐵路的股東簽訂了協定，關於這條鐵路的收買遠在一九二四年便決定（實際上鐵路一直在基馬爾主義者的手中）。按照這個協定，土耳其爲了安那托里路線，米爾新路線，阿丹和哈達爾港，應當支付528,000,000瑞典的法郎，亦即211,000,000紙利拉。

關於安那托里鐵路的支付，限期爲七十二年，每年約爲六百萬法郎。米爾新——阿丹路——二十九年，港口——七十三年。

在最近的四年半中，應當爲股東支付四千五百萬法郎。這樣在最近四年半中，這種支付以及與買路有關的支付，每年應爲一千六百萬法郎（在以後每年則約爲七百萬法郎），或者是六百五十萬紙利拉。

在這兩種清償土耳其帝國債務的手續中，近幾年內的支付額應爲24—25百萬利拉，這一切負擔都要落在納稅人的身上。交款的手續無疑的要影響到利拉的市價，隨着協定的批准，牠立刻大大的跌落了。

除此種協定之外，我們更可預測到新借款的舉行（穩定利拉市價與建立國家銀行）和外資的大批流入，因爲這裏的

條件對於外資的活動現在變為完全順適的了，阻礙外資流入土耳其的障害不再存在了。對外資的渴望，在基馬爾的演說中充分的流露出來，他說道：“我敢於希望我們的犧牲將換得應有代價，因為這個協定的簽訂，我們把一個絕大的義務加在了自己的身上”。

最近的將來將會告訴我們，土耳其資產階級的希望到底能否如願以償。

這一篇東西雖然只說到1928年上，對於最近一年多來的土耳其經濟情形沒有說到，但由此我們亦可以得一個關於土耳其經濟狀況的概念。並且可以看出資產階級的基馬爾政府之一般的經濟政策及其對於帝國主義之妥協的傾向，和基馬爾統治下的民衆尤其工人之生活困苦的漫畫寫真——編者

皮袍子引起的話

清 獨

朋友B君是第一次和我見面，但是我們却談得已經很是投契了。

冬天午後底太陽由窗外射了進來，我們都在圍着一個日本式的火盆，彼此都感着一種適暖的快感。

——此刻倒好，不像早晨那樣冷了。B君說。

——其實早晨也不算十分冷呢。

——那兒底話！你因為穿的有皮袍子，所以不覺得冷。

啊，我確是穿了一件皮袍子！這使我一注意到B君底身上時，我纔看見他穿的是一件不十分厚的棉袍。——啊，我真慚愧！但是我這件袍子也還不能算是我的，這是去年一個朋友送給我的一件皮馬褂的料子，我又由別一個朋友處要了約略二尺的他沒有地方可以用的狗皮，纔集攆來縫成的。

但是這有甚麼辦法呢？就是說得再沒有用，總是一件皮袍子，總沒有方法可以打消穿棉袍的B君底反感。我不覺帶着一種自我辯護的口氣反問着B君說：

——難道你沒有皮袍子嗎？

——有的，但是已經送到當舖裏去了。

B君說這句話時，態度非常憂鬱，他把眼臉低了下來，好像不願意看到我底臉上的樣子。我突然發現B君和我一位已經死了的朋友H很是相像，我立地便覺得有一種深沉的悲抑走上了心頭，我也不自禁地把眼臉低了下去了。

提起我那位亡友H來，真要算是我向來敬佩的友人中之一，他底努力，至少在我底眼中是很少見的。他是死在幾年前C城政變的時候，據說他死的以前，還受了不少的慘刑。當他在德國留學的時候，便得了肺病，一直到他死的時候，肺病是已經到了第二期了。他在C城所任的職務是非常忙碌，他負着那樣已經絕望的惡疾，卻還是白天做着實際工作，晚間整夜地從事於著述。但是他底肺病終於沒有把他弄死，卻被那比肺病還要厲害的惡勢力把他弄死了。

提起那位亡友H來，還有一件事情最足以使我們痛心。在他未被害的以前，他曾把伊里基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翻譯了出來，並且他還要我給他做了一篇序文。他那部書距他被害的前一個禮拜，校樣都已經完全印好，只等他自

已校好以後，便可以立地出書。但是不料一個恐怖的惡潮襲來，不但使他死於非命，並且他那部書底原稿和校樣都被人用火燒掉，不消說我那篇不值錢的序文也作了那場劫火中的幾點火星，跟着那部名著底譯本同歸於盡，而且底幾個月的心血也就那樣隨着他底生命化爲灰燼了。

那位H便是這樣的一個朋友，他死後算是已經有兩年多的時光了。但是不料今天我卻在突然之間發現這位新認識的朋友B君底面貌有些和他相像，這竟使我沉在了回憶的境界中，默默地靜坐了半天，但是終於被B君打斷了我底思路，他好像自言自語似的忽然說道：

——唉，沒有辦法！所以我現在正在翻譯着一本書。

這話當然是接着他前一句話講出來的。B君大概誤會了我底態度，他以爲我這樣半天沉思着的是因爲他說他當了他底皮袍子的緣故罷。

——你現在翻譯着書嗎？

——是的。

——甚麼書呢？

——當然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書。“Materialisme et Empiriocriticisme”。

啊，這真奇怪！B君大概因爲我是到過法國的緣故，所以特意把他翻譯的書底名字用法文講了出來，但是我知道

他底俄文是很好，他要是翻譯這部書時，一定根據的是俄文原本的。可是這個真使我有點驚訝了：

——你說你翻譯的是“Materialisme et Empirio-criticisme”嗎？可就是伊里基底那本？

——那里還再有第二個人著的呢？

——唉，奇怪！你也再……

——甚麼？我也？……

B君自然不能明白我驚異的原因，但是我也不好就直講出來。

——因為從前我底一個朋友曾翻譯過這本書，卻未曾得出版。

——是不是在C城被害的H君？

啊，這真又奇怪了！不料他竟知道他呢！

——唉，奇怪！你認識他嗎？

——認識是不認識的，不過我由別一個朋友間接地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聽說他被害時的情形很慘，他底夫人是一個德國人，因為他底被害，幾乎發了瘋，幸而以後有許多同志纔設法把她送回了德國去。

不料B君知道H，竟然比我還要詳細。他接着說：

——你說他翻譯那本書，我也聽說過的。他那本譯稿不但遭了火劫，並且那家預備出他那本書的書店也被當局認

爲宣傳反動學說的機關給封閉了。但是這只是他在G城時所譯的那本書的譯稿底結局，他在德國時所譯的那本書的譯稿卻是早已不知道下落了。

——怎麼？他在德國的時候已經把那部書翻譯過一次嗎？

這真是出乎我底意想之外，B君知道H竟能這樣的詳細，並且還說出了我連影子也不知道的一件H過去的事迹，我十分好奇地看着B君，等候他說明日這段事迹底經過。

——哦！B君先嘆了一聲，然後說道：H君對於文化工作底努力真是不容易多得的。他自從在德國信從了馬克西斯姆以後，便着手編譯了許多書籍寄回中國出版，不過那些書籍都沒有用過他底真名。隨後他廢了很久的時間，纔把伊里基那本書譯了出來，託了一位由德國回國的留學生帶回，但是不知道那位留學生是因爲思想上的不同，把那部譯稿藏了起來，還是因爲別有原故，將那部譯稿失落，竟至使那部譯稿不曾和中國人見面。H君第一次的心血就那樣白白地廢了一場，沒有得到結果。後來他對他在德國的朋友說，他要把那本書再譯一次。他這計劃總算等到他回國以後在G城實行了，但是不料又落了那樣的一個下場。

B君底話突然止住了。這使我又沈在了情緒翻騰的沉默裏，我底喉中好像被甚麼塞住，竟至抽不出一句話來。

唉唉，可憐的H！他費了兩次的苦心，總算把那部不朽的名著送到中國，但卻兩次都是遭了同樣的不幸，這到底是怎樣弄成的呢？難道我們這個東方的老大民族，想去接受那部名著，就是這樣的不容易嗎？

唉唉，可敬的H！他在G城着手譯那部書時，他簡直沒有對人說過他從前已經譯過一次，那種不灰心不計功的態度直是令人要佩服到五體投地。他在德國還編譯了許多書籍，都不曾用過他底真名，他是只知道從事於真理的傳播而不顧及個人底名位的。他那種態度，不是革命家底態度還是甚麼呢？

我心中儘管這樣想着的時候，B君忽然把我底肩頭一拍，用很沈鬱的語調說道：

——你看！這正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那雖然只是一本書，但是不妨用來比成我們工程底全部。H君把那本書譯了一次，未得出版，於是他又從新譯過；第二次是因為連他底性命都一齊失掉了，假使不是這樣時，我相信他還要譯第三次呢，現在他是再不能繼續他底工作了，所以我又來着手。一時的失敗，或挫折，決不能停頓我們永遠的工程，我們要相信革命就是不在我們手中成功，我們死後必定有人還要繼續我們底工作，革命是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我們要有這種信仰，我們纔不至動搖，我們纔不會在惡勢力面前軟

化。

B君忽然站起來了。他底臉上露出了一種堅強的神色，他在抖擻他那穿着薄棉袍的身裁。

這時火盆中的火已經熄去大半，但是B君卻站在窗前，沒有一點感着天冷的樣子，真好像是信仰的火在煖着他的一樣。

我辭別了B君走到街上時，已經是黃昏時候了。冬天晚上的風不停地向人吹來，我底一件半狗皮的皮袍子也有些抵禦不住的光景。但是我心中總還不停地在想着B君最後的一句話：“我們要有這種信仰，我們纔不至動搖，我們纔不會在惡勢力面前軟化”。——我這樣想着，竟忘記了向我身上吹來的北風，我好像是不覺得冷了。

一羣工人由我底身旁走過，大概是纔由工廠中回來的。他們都冷得縮成了一團，有些口中還露出了些呻吟的聲息。風是越吹越緊了。

我只想把我心中想的那句話也去告訴他們。

一月，一九三〇。

社會科學名著叢刊

財政學史

阿部實一著
鄭敬芳譯

實價大洋八角

本唯物史觀的立場而研究財政學史的，阿部實一算是東方絕無僅有的一個人。他是日本的財政學專家，著有財政學，租稅論等書，頂著名的，還是他最近所著的這一部財政學史。他將歷史上有名的財政學家，分爲下列六章來研究：第一章。近世新興資產階級財政思想的發生。第二章。基於個人的自由主義底財政思想。第三章。社會政策的財政學理論。第四章。經濟學底財政學。第五章。社會學的財政學。第六章。社會主義的財政學說底發展。在第一章上面，將財政學說發生的由來，敘述詳盡，在其他各章下面，將各家的學說，作本源的介紹。同時，并寓客觀的批評於紹介之中。凡想要研究資本主義的國家的財政和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期的國家的財政不同之點在那裏的人們，不可不人手一編。譯者也是研究財政學的專家，譯筆非常流暢。譯這冊書，又曾經字斟句酌，斷不會有誤譯及生吞活剝的地方。這是本社可敬保護的。

戰鬥的唯物論

樸列塞諾夫著
杜畏之譯

實價大洋五角五分

這一本戰鬥的唯物論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最激烈的哲學論戰。在本書的前頁傑波林的序文中說，「樸列塞諾夫用其平白易懂又細緻的文筆，在其精巧透關中顯示了內容的豐富，實在論戰術中最光芒射人的模範」。傑氏的話是不錯的，我想每個讀者讀過本書之後，都會覺得這書的美妙，而且還可以看到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哲學論戰是激烈到何等田地。

社會主義社會學

藍羅斯原著
汪駿泉譯

實價大洋五角五分

本書從社會主義的立場，敘述社會學的起源及發達，與關於現在的位置的一般的概念，敘述簡賅平明，採用爲中等學校社會學教本，最爲適宜，坊間有兩本與本書書名相同的著作，然而與本書却不同的。

絕望女

徐霞村譯

實價大洋六角

本書為世界諸名家的傑作集，含有「法朗士」，「高爾基」，「皮藍得婁」，「果戈理」，「托思退益夫司基」，「柴霍甫」，「布甯」，「阿左林」，「比爾路易」。諸人的作品，可為研究世界文學者之入門書，至於譯者徐霞村先生的譯筆之清新雋永，凡讀過他的作品的人都知道的。

蘆管

趙景深譯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趙景深先生的小說向來以流暢生動著稱，凡讀過他的譯文的人莫不稱道，以為可與創作相混。現在敝社又將他的翻譯小說十篇貢獻給讀者諸君，凡代表俄法英美意大利愛爾蘭瑞典等七國，其中諸家作風各有不同，有王爾德和史特林堡漂亮的對話，康珊南和樊達克神祕的描寫，卜西里和戴麗黛愛戀的抒情，莫泊桑和巴比塞簡捷的文筆；閱之不但可陶冶性靈，兼可作為小說範本。

歸雁

黃慮隱女士著

實價大洋六角

這一本日記體的小說在讀者讀過以後，定會驚嘆海濱故人的作者的作品，竟有這樣的造詣。它簡直像茶花女一樣的讀了會使你感動得落淚。

在世界盡頭

王魯彥譯

實價大洋七角

本書內容包含九個短篇，都是世界聞名的作家的著作。王魯彥先生用他的神妙整潔的筆調翻譯出來，使我們讀着，更會加添了無限的興味。

中國文學論叢

鈴木虎雄著
汪馥泉譯

實價大洋五角五分

本書是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專家鈴木虎雄著的。而譯者的選譯，也是有系統的選譯，先是論騷賦，其次論五言詩及絕句，再次論詞，末則青木正兒氏論詞的一文。凡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是不可不讀的。

大學及專門學校教科參考書類

四政治學綱要

高一涵著

實價 平裝一元五角 精裝二元二角

高一涵先生實在北京大學，北京中國大學，及近在上海中國公學，法政大學教授政治學有年。本書乃高先生幾經修改之作。內容極其豐富；凡關於國家主權，國權範圍，民權種類，議會制度，以及創制制，複決制，罷免制，內閣制，總統制，委員制，監察制，考試制等均徵引中外名家著作，詳細討論，洵為各大學最真好教本，并為研究或教授政治學者之最好參考書。

再政治制度淺說

張慰慈著

實價 平裝二元四角 精裝三元

本書完全以敘述各國的實際政治為主，即有理論也是從實際的政治制度中抽出來的理論。絕不是不談理論的著作，也不是專談理論的著作。在近來國人傾向理論，忽略實際的當中，這本書實在最重要。胡適之先生和高一涵先生看過本書後，都認為最有價值的一本。高先生在本書的序文中，還有愛不忍釋的話，用為大學校及專門學校的教本或參考書，這是沒有更好的了。

國際政治概論

周鯨生著

實價 平裝一元 精裝一元五角

國際政治是歐戰後各國大學新的科學，是現代國民應有的政治常識。在周鯨生先生這本概論裏面，所有關於近數十年國際政局的變遷。歐戰後國際政治的新發展，國際社會的新組織，如：國際聯盟，國際法庭等，及強制仲裁，國際裁軍，秘密外交，國際主義等題目，日常見諸報章而不得要領者，都有系統的說明和批判。不獨大學專科可採為教本，凡是留心世界政治的，均不可不讀。

中外貨幣政策

彭學沛著

實價一元五角

專就政策方面來考察貨幣問題的理論和實際，這是世界最初的嘗試。這書上卷敘述并批評戰前戰後的貨幣政策理論，并時時拿中國情形來比較參照。中卷歷述美，英，德，法，蘇俄各國的貨幣政策。下卷把中國貨幣政策沿革，貨幣制度現狀，加以極明晰的分析和解釋，并推論到中國貨幣政策的前途。關於貨幣政策，祇要一讀這本書，便可以得到基本的確實的知識。

文 學 類

辛克萊評傳

孫席珍編譯

實價大洋七角

辛克萊是現存的美國的最傑出的作家，不獨在大陸劃一新時代，即在全世界也佔極重要的地位。對於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上猛烈的攻擊，竭力替被壓迫階級說話。這種反抗精神是為全世界任何著名作家所不及的。他的作品，最近已有了許多漢譯，他的生平也有人零星介紹過。但關於他的整個研究，卻還未曾有過。本書是孫先生根據戴爾氏的辛克萊評傳，再參考好幾種書籍編譯而成，是國內第一本研究辛氏的專著。

敗北

沈端先譯

實價大洋五角五分

沈端先先生是最近譯書界裏一個很知名的，他的譯筆的通達流麗，深刻動人更為人人所深愛，這本小書內包含四個短篇，都是極有意義和含蓄的故事，令你看完之後，也會愛不釋手。

物觀文學史
李長吉評傳

王禮錫著

實價大洋五角

用唯物史觀的眼光來分析中國的文學史，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在這書中為研究文學史的人開闢一條正確的新路。李長吉從來被人稱為鬼才，其詩被人稱為鬼語，作者就在這怪險而短命的鬼才詩人開始去嘗試這新的方法。六朝詩歌史綱，唐代詩歌史綱，及陸晶清女士的唐代女詩人，與宋代女詞人，都會陸續與讀者相見。

西萬提斯的未婚妻

戴望舒
徐霞村合譯

實價六角五分

本書為阿左林的小說選集，阿左林為當代西班牙文壇巨子，作風清淡蘊藉，清新而雋永，使人有觀荷蘭派畫，讀唐人作品之感。譯者尤能時時將原著者之作風的長處充分地表出，故不但可供愛好現代文學者欣賞，且可作散文之模範，尤宜人手一篇也。

國際運動史

張雲伏著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本書是張雲伏教授在上海各大學教授此課的結晶，雖經修正，然後完成。內容以四個國為綱。各國社會黨運動為緯，更以馬克思主義貫澈全書，有如精神之於肉體，上自馬氏學說之發生，下迄一九二九年為止。舉凡歐美日本及各國所發生之各次運動，及其理論的基礎，靡不詳述，誠國內論社會主義者最完備最新穎之著作。全書約二十餘萬言，一切史料，均採自英俄日三國名著，觀點正確，考據詳實。凡注意現代社會主義運動者，尤宜人手一冊。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

考茨基著
汪鶴泉譯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五分

本書是「馬克思底經濟學說」的「通俗的敘述及解說」，曾經由昂格思氏的校閱，是這一類書籍中的最好的一部。如果不研究社會科學則已，倘研究的，非先閱過這一部書不可。卷首附有「譯者序言」中載福本和夫氏「經濟學批判的體系與資本論的體系」很有助於馬氏經濟學說的把握。譯者對於翻譯時，尤其是句辭字酌，比坊間任何一個譯本都較為忠實而且暢達；研究社會科學——經濟學者都應一讀。

資本論概要

石川準十郎著
洪濤譯

實價大洋八角

這一本書是日人石川準十郎根據考茨基所著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改編而成。考茨基這部著作的價值如何，想久已為讀者所知。不過考茨基對於這部著作中，祇對於資本論第一卷加以詳細的說明，而對於第二卷簡直沒有提起。第三卷也祇說得一點點。石川準十郎有見於此，特費了許多工夫重新改編，不特把考茨基所遺漏的，通通補上進去，並有許多部份是直接引用資本論的原文來說明的，所以這本書是介紹馬氏資本論全三卷最完善的一本書，無論對於已看考茨基那部著作，或是想研究資本論而不得其門而入的人，都是很

史的唯物論概說

波哈特原著
汪鶴泉譯

實價大洋四角

本書是通俗資本論的著者波哈特氏從純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說明史的唯物論的真諦。先講解精神的史觀，次指摘經濟狀態說的謬誤。然後敘述社會的變革之概念，及史的唯物論如何說明社會的變革等，本書簡而綜其要，賅而約其博。是一部最好的入門書。

第四卷是：

……近代農民鬥爭及社會思想……

實價七角

這一冊是分析工業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社會革命運動是怎樣的在這個時期孕育，和這個時期思想的敘述。

第一國際史

Sakoff 著
吳樹仁 譯

實價大洋二元

全書約二十萬言，材料豐富，條理清晰，論點正確，書尾附有第一國際的各種重要文獻，是一部研究革命史者不可不看的書。在俄文本序及英譯本序中均稱：「在所有第一國際的歷史中，這是最精確的一本」。其價值於此可以想見。

法蘭西內戰

實價

卡爾馬克斯著
陳新吾譯

歷史上曾有兩個城市變為兩個敵對的營壘而互相仇殺的，這就是法蘭西內戰時代的巴黎與凡爾塞。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兩個城市所代表的是甚麼？巴黎公社又是甚麼？關於這個問題解答得最詳盡的，祇有這本書。這本書是馬克思所著，由恩格斯校訂而成，內容除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完美的分析外，更有對普法戰爭描寫最優美的歷史材料一束，凡研究社會科學諸君，真不可不讀也。

人類婚姻史

Westermarck 著
王亞南 譯

實價一元

衛司特馬克是全世界婚姻史的權威作家，所以這部書是婚姻史中的權威著作。其徵引的博洽，殊為驚人，乃至中國的「換妻」等等風俗，無不應有盡有。敘述又極提要精警的，寫為二十萬言，其精采當可想見。

社會問題研究叢書

農業問題論

實價大洋六角

英考基著
章子建譯

考茨基的學說，對於目前的中國是比較其他任何版來的學說為適合，大概是誰都不會否認的。這一部考茨基的名著，也是久經震動全世界的，用不著詳細介紹。而本書裏面在考茨基的普遍的理論解說之後，更系以荷佛氏的許多實際的辯證的說明，那更便於讀者的研究。

父母之道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Richardson 著
張曉桃譯

如果準備做父母的，希望他們有一個活潑潑而健康的小寶寶，如果做丈夫的希望他的愛妻很快樂而適度地過他的最危險的孕娠時期，已婚或未婚的少女，想減少她將來的孕娠時期的恐怖，不可不讀這本書。這本書包含一個醫生寫給青年男女們的十八封信，這書可以減少青年男女們在孕娠期中的生理上和心裏上的痛苦。好像在第一封信裏教給你們怎樣去決定是否受孕？怎樣可以決定你的小寶寶降生的日期？怎樣去問醫生？怎樣去注意自己的健康？怎樣去減除你的心理上的不安？你看，第一封信已經包含了這樣多的智識可知道十八封信是如何地有利於你的愛妻和將來的小寶寶的。

婦女論

實價大洋五角

張慰慈譯

張慰慈先生是國內一個有名的大學教授，他的著作，風行於時，用不著我們再來介紹。這本婦女論，我們單就他的內容的幾個標題來看，我們就可以曉得這是一本怎樣有趣，怎樣美飾的書了。

- 內 叔本華的婦女論
- 夫妻交戰時的妻黨
- 夫妻的政治手腕
- 巴爾沙克論婚姻
- 容 婦女的詭計

- 床的研究
- 靈理思論婦女的智力
- 夫妻間的戰略
- 家庭警察

世界貨幣問題

實價大洋五角

古斯特布·加塞耳著
王希夷譯

這本書雖然是研究歐戰後世界各國的貨幣問題，但內亂連年的中國，有許多貨幣問題很像歐戰後之參戰各國。這本書很能夠給我們以良好的參攷。尤其是現在金價暴漲，我國金融紊亂的時候，這本書有許多地方，更能作我們的南針。

中國國民經濟概況

何漢民著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實在是一切問題中的最主要者。中國的經濟問題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也決不能得到完滿的解決。但是我們要想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最重要的，便是對中國目前經濟實現的明瞭；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侵略的程度，究竟怎樣？內地經濟目前的實現，究竟怎樣？這都是我們應該澈底明瞭的。這一本中國國民經濟概況便是給我們解決上項的問題的一本最好的書。它的內容，把中國的工業狀況，農業狀況，貿易狀況，財政金融狀況，交通狀況，以及列強在中國經濟侵略的實況，都很詳盡地指示出來。它的材料是很詳盡確實的。它的敘述是很明晰簡賅的。實在是一本研究經濟問題者必讀之書。

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

馬札亞爾著

陳代青
彭桂秋合譯

實價大洋

中國原來為農業國，農民問題在今日已成為最重要的問題。雖然這本「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是著名的中國土地問題的物觀的研究的一個努力的嘗試，而其中內容的豐富，實在是驚人。無論站在任何的觀點來研究中國農業經濟，這是一部很好的書，全書約四十萬字，現已出版。

婦女與兒童

康陶父編

實價大洋七角五分

這是本論婦女問題與兒童問題的書，關於婦女問題的中文書，雖算已有幾種出版；但能根據物觀的立場，對這問題與以敘述并解答者，實難看到，本書却有三篇長文，根據物觀立場以說明婦女問題的；尤以赤戀的著名柯倫泰女士的論社會主義與本來的家族制度一文為更具有卓見，能使我們想到社會主義中的婦女生活及家族制度究竟要變成個模樣。至於兒童問題。在中國更未有人提起。本書對於兒童的地位，「是家庭所有，還是社會所有」。和教育，養護，勞動等等的問題，却都是要提綱挈領的說明，并暗示解決兒童問題途徑所在。未附蘇俄的婦女與兒童之地位，改變生活及待遇種種實際情形，足供我們留心是項問題者之參攷。

文藝批評集

錢杏邨著

實價大洋一元

本書內容將近有三十篇文字，主要的是包括六個國度十五個作家的批評與介紹。著者是站在普羅的立場來發聲，在普羅文學的高潮中，這本書是很值得一看的。而且本書對於中國新興文藝更有特殊的注意和介紹，這尤其是研究文藝的均不可不人手一冊。

寒夜集

彭芳草著

實價大洋四角

本集的作者向以冷峭而緊張的作風見稱。其態度之勇進、思想之深刻，尤為馳譽華北文壇。本集所收，為苦酒集發行後之短篇作品精華，其中之「愛與仇」諸篇，均為作者在戀愛流中，情感激越時期所在，不特表示作者對戀愛之勇往直前精神，且能具體表出作者對人生之真實態度，作者自本集以後，其寫作將轉於第二時期，努力於革命文藝之創作，讀者欲知由浪漫主義如何趨向革命文藝之過渡橋樑，不可不讀此書。

厄運

彭芳草著

實價大洋四角

厄運是描寫封建勢力壓榨之下的一個農家子怎樣參加革命的經過，對於土豪劣紳軍閥的罪惡，描寫得淋漓盡致，尤其餘事，而在這個時代中，革命的民眾們，有了革命的客觀需要，而其生活為幾個奴隸的傳統觀念所支配，不曉得起來反抗，直至革命的潮流把他們推上前線纔猛然的覺醒，這中間演變的經過，在這篇小說內尤其是描寫得深刻，至於作者文筆的痛快而又幽默，凡讀過他的作品的都欣賞過，用不着再介紹。

戲劇論文集

藝術劇社編

實價大洋七角

本書包括有十一篇論文，作者都是現時研究戲劇的專家，及在文學上負有盛名的。對於新戲劇運動的意義，及戲劇改革的根本問題，有極詳細的討論。尤其是對於中國戲劇運動的進路有很好的研究。他如近代舞臺的裝置，化裝和音樂，均有極詳細的解答，這是研究戲劇者所必讀的。

國際法概論

泉香原著
彭學沛編譯

實價一元二角

取材繁簡適中的國際法教本，不但在中國沒有，在外國文中亦是很少。有的偏於一部，有的過於簡略，有的一瀉千里，夾敘夾論的寫法，章節不分，不便于查考和記憶，泉哲氏這本書別的不論，單在取材均勻，應有應有，和章節分明各點，已具特色。初學者看了這冊，便能得到關於國際法的一般應有的智識。查考時亦極便利，所以特為譯出，其中譯者認為有補充必要的地方，如關於中國國籍法，國際聯盟組織，領海港灣的概念，無害通過權，繼續航海主義等，都已

進化論證

William Berryman Scott 著
馮景崗 譯

實價六角

自達爾文驚世名著物種原始刊行後，一切學術都起了一個大變動，它的偉大的勢力，一直支配到現在，這本進化論證是 William Berryman Scott 教授的名著，給進化論以切實的，充分的證據。內容分六章：(一)進化論的現狀。(二)分類營養及比較解剖上的證據。(三)發生學上及血液試驗上的證據。(四)古生物學上的證據。(五)地理分佈上的證據。(六)試驗上的證據及結論。無論研究那一門學問的人，不可不讀這本基本的書。

修辭學通詮

王易著

實價八角

這本修辭學是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王易先生幾經修改之名著。條理分明，舉例詳簡得要。在高中以上之學校，無論用為教科或自修書都極相宜。

政治思想史

戴克光著

實價

清華大學戴克光先生因感於國內沒有一部較完備的政治思想史，因以七個月之力，謹慎的翻譯這部吉達爾的政治思想史。吉氏此書，從遠古以至現代，搜羅百家的學說，汎論各國之大師，以時代為經，以國別為緯。首尾貫注，取材均勻。各大學高中用為教科，最為適宜。又各大學用此本原文為教科書甚多，得此中文本為參考書，則研習便利多矣。

西洋哲學的發展

瞿世英著

實價大洋九角

這是瞿世英先生最近的傑作，敘述明瞭。舉例詳晰，用為高中以上學校的課本或參考書，那是再好沒有。現在已有許多著名學校採用為參考書。

世界歷史名著叢刊

社會鬥爭通史

Max Beer著
葉啓芳譯

站在鬥爭唯物論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來分析自古代以至現代的社會鬥爭，這是唯一的權威著作！這部書中不但供給了許多歷史的材料，並且供給我們以分析歷史的方法。

第一冊是：

○……………○
古代社會鬥爭史……………○

實價七角五分

內容包括古代的伯勒斯廷，希臘，羅馬。的社會歷史背景，及近代社會主義理論和實施。他引證古代的出版物多至一百餘種，真是取精用博，但他同時把這無數的材料，凝鍊在一本八萬字的小書中，更見他的剪裁的嚴刻。而傾於研究。

第二冊是：

○……………○
中世紀社會鬥爭史……………○

實價七角

這本書所敘述的時期是從第四世紀到十四世紀適當中世紀時期。本書詳細討論基督教所謂異端運動，這些運動，從十一世紀以來，便吸引著當時國家和社會的極大注意。這本書裏面，有很詳晰的敘述和說明。

第三卷是：

代近農民鬥爭及烏托邦社會主義

實價七角

此書共八章，前四章一方面繼續著第二卷，討論中世紀教會和異教徒之社會鬥爭，而一方面則敘述英法德俄國的農民運動。後四章則完全敘述英德意三國之烏托邦社會思想。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初版

動力 第二期 實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動力編輯社

發行者 動力雜誌社

代售者 各大書局

本誌預定價目表

期數	價目	郵費	
		本埠及國內	國外各埠
每月一期	六元	五分	二角
半年六期	三元四角	三角	一元二角
全年主期	六元	六角	二元四角

郵費掛號照加